纪念辛亥革命　弘扬华侨传统

——团结联系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文 万立骏（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纵观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我们不难发现，华侨与辛亥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华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每一个阶段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贡献，孙中山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

华侨是革命团体的积极参与者。早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起之时，海外华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积极为社会变革奔走，呼吁参加革命组织、建立革命基地、传播革命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1894年，第一个以海外华侨为主要成员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之后发展到300多名会员，其中有200多人为华侨。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此后，华侨革命者利用有利条件，广泛结交各埠华侨，吸收他们参加革命，形成了“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的局面。

华侨是革命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约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奔走于海外华侨社团、留学生和侨领之间，在海外华侨中做教育启蒙、宣传鼓动、组织策划的革命工作。在孙中山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海外华侨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创办革命报刊杂志，在东南亚、北美等地，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造就了“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的大好局面，“华侨受其感化者日众”，使革命党人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为推进民主共和作了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华侨是革命运动的有力支持者。辛亥革命中，华侨社团组织动员和积极参与捐款助饷，华侨群体中各阶层、各行业人士为支持孙中山可谓“解囊相助，不遗余力”，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数额巨大、源源不断的经费资助。不论是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组建、日常活动的开支及同盟会在国内外组建分会的活动经费，还是革命党人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不论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奔走世界各地宣传革命，领导革命的旅费、生活费，还是历次起义的巨额军饷，大都由海外华侨鼎力资助，为辛亥革命运动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相关数据显示，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仅华侨捐款就有700万—800万元。孙中山先生由衷慨叹：“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华侨是革命起义的英勇献身者。许多海外华侨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义无反顾，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多次参加武装起义，碧血丹心，捐躯为国。他们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世代传扬。从 1895 年至 1911 年，同盟会、兴中会、华兴会等各种革命团体，联合会党力量，共同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华侨 31 人。虽然这些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反动统治秩序再无法稳定下来，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垮台。

抚今追昔，历史照亮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这为新时代的侨联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回顾历史，我们将更加坚定“四个自信”。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未能根本改变，华侨当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在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时积极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武昌起义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前进方向。海外华侨与国内人民一样，在历史的进程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就要切实把握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动，坚定信念、开拓进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回顾历史，我们将更加努力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辛亥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传承、共同追求的目标。孙中山先生曾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1912 年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还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我们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就要更加真切地意识到，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我们相信，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扬光荣传统，在一个中国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回顾历史，我们将更加广泛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上各民族平等相处，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追求。我们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就要更加注重海外侨胞的生存与发展，鼓励和支持广大海外侨胞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自觉遵守住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社会风俗和民族习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应对疫情对人类的挑战，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华优秀文化，介绍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真实情况，帮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广东侨联工作 文化交流品牌

风韵南粤

弘扬中华文化，支持海外传承，以文化人，以韵感人，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助推人类共同发展。



华夏 / 拥抱世界的港湾
HUA XIA 连接天下的彩虹 /



要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爱国爱民的中国共产党，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人民苦难深重，不容我袖手旁观。

——司徒美堂

侨歌晓唱
QIAOGE XIAOCHANG

001 纪念辛亥革命 弘扬华侨传统 / 万立骏

独家策划
DUJIA CEHUA

文化交流基地里的中国故事

008 从千年珠玑启程 / 祝顺祥
013 根在五邑 / 钟敏仪
021 在凤岗品味客侨文化 / 祥子
025 大鹏所城的百年沧桑史 / 赵阳欢
029 探访客家千年古镇 / 祥子
033 清晖园：因孝而园起 / 赵阳欢
039 锦绣中华，怎一个妙字了得 / 何尚
043 花山小镇故事多 / 乔萱
048 侨韵悠悠满大江 / 子言
052 冯如故里 / 梁健生

侨海时政
QIAOHAI SHIZHENG

056 广东省侨联纪事 / 林辅毫
060 牢记嘱托担当使命 做好新时代“侨”文章 / 林辅毫
063 “为侨服务·一呼必应” / 墨池

百年风华·赤子侨心
BAINIAN FENGHUA•CHIZI QIAOXIN

066 我的爷爷司徒美堂 / 司徒月桂 梁小恩
073 赤子丹心归来 怀真抱素归去 / 刘铁梅

目 录

2021 年 10 月总 222 期

079 吕健：“五色时空”的追梦者 / 钟敏仪

侨批往事
QIAOPI WANGSHI

086 新兴侨批寻踪纪事 / 李柏达



史话随笔
SHIHUA SUIBI

093 海外潮侨与中国红色革命概述 / 黄晓坚
100 解放战争时期的广东革命 / 苏昕宇

人文中国
RENWEN ZHONGGUO

108 《远道苍苍》：一部非虚构的虚构小说佳作 / 刘艳
111 《故园月明》里的拳拳赤子心 / 李非
113 最后的枕水人家 / 卢锡铭
118 福建百年鱼牙行简史 / 王心悦

中国与世界
ZHONGGUO YU SHIJIE

122 香山人的世博缘 / 丘树宏

《华夏》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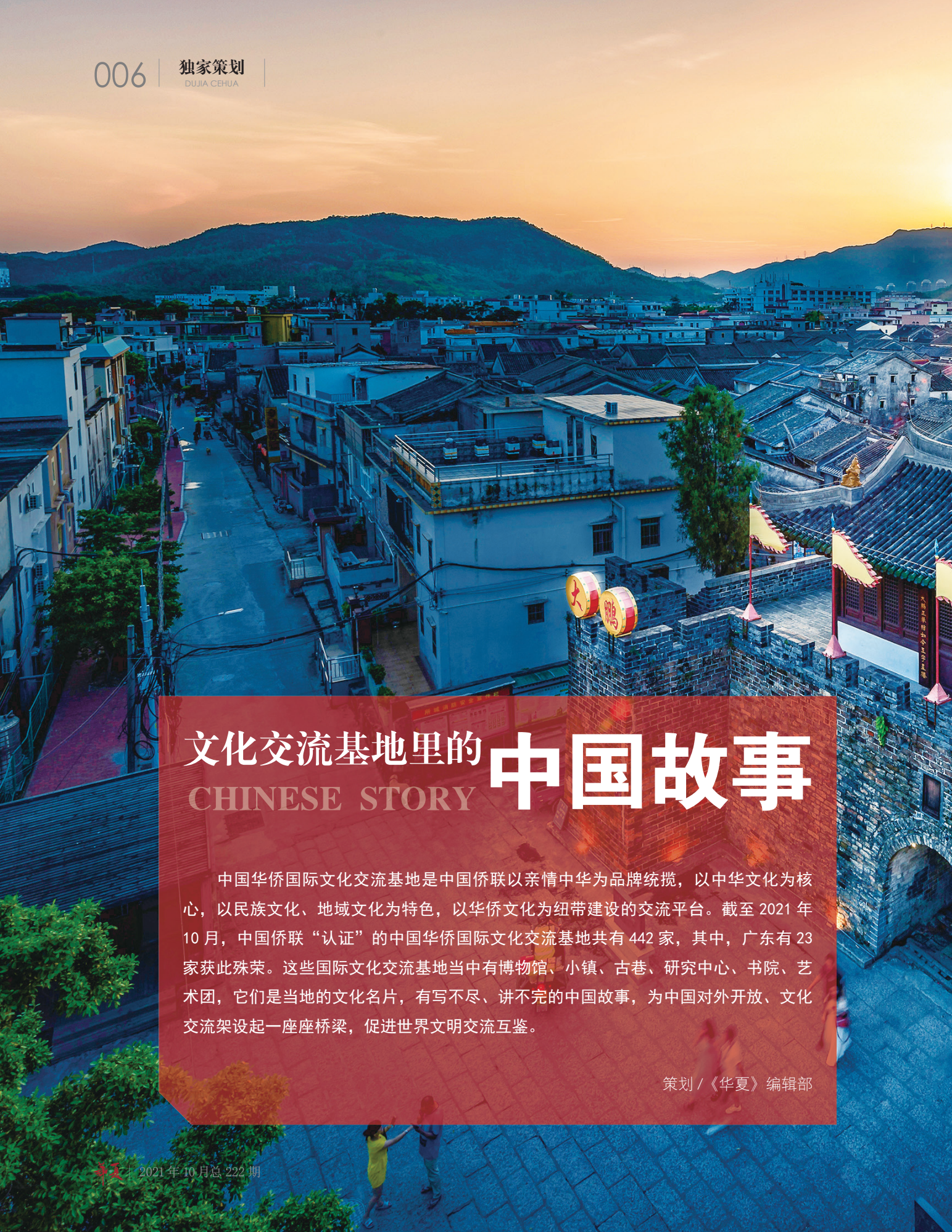
编委会名誉主任： 颜 珂 黎 静
编 委 会 主 任： 邵 瑾 曹堪宏
编委会副主任： 杨春华
总 编 辑： 刘迪生
副 总 编 辑： 钟敏仪
总编辑助理： 赵阳欢
美 术 编 辑： 莫晓丹

社 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40-148 号省侨联大厦 6 楼
邮 编： 510620
电 话： 020-38879808
邮 箱： gdqlhx@163. 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000100021
版式设计： 东莞市潇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帧： 东莞市比比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30 HK$40 NT$128 $20

《华夏》杂志微信公众号

省侨联微信公众号



文化交流基地里的中国故事
CHINESE STORY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是中国侨联以亲情中华为品牌统揽，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为特色，以华侨文化为纽带建设的交流平台。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侨联“认证”的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共有 442 家，其中，广东有 23 家获此殊荣。这些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当中有博物馆、小镇、古巷、研究中心、书院、艺术团，它们是当地的文化名片，有写不尽、讲不完的中国故事，为中国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架设起一座座桥梁，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策划 /《华夏》编辑部


所
城

从千年珠玑启程

文 祝顺祥

梅岭，是南岭山脉五岭之一的大庾岭一段，故又称大庾岭。在梅岭之巅，有一座古老的关楼叫梅关，关楼所处的位置正是江西与广东的交会点，它的一侧是岭北，另一侧就是岭南。

公元 716 年，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把一条崎岖难行的山径开通为车马通行的大道，使南北交通顿时通畅，成为岭南最重要的通道。一千多年来，梅关古道不仅是岭南最重要的商道和官道，也是一条文化大走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还是兵家必争的兵道，同时也是普通老百姓南迁避乱的生命通道。

岭南荒蛮之地，自古以来都是流放的首选地，梅关古道见证了这一幕历史：官场失



珠玑古巷

意的文人踽踽独行，翻越五岭进入岭南。“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站在梅岭的关楼下，一步之遥，天各一方，令人唏嘘感慨。举目回望，连绵的山峦在身后截开，曾经人们长途跋涉的艰辛便越加清晰，翻过梅岭，继续南下，珠玑巷就在昏黄的暮光里，以袅袅炊烟向远方的客人招手。

珠玑巷被众多珠三角居民和海外广府人称为“一千年前的桑梓乡”。珠玑巷地理环境良好，是南下北上的绝佳歇脚处。南下的赶路人过梅关到珠玑巷正好是一日脚程，恰好在日薄西山时抵达珠玑巷。北上的赶路人从南雄起程到珠玑巷，如果当日上梅关，在天黑前不一定能翻过大庾岭，因而也暂住下来。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经过或停留，有的就地落户，在这片土地上耕作，在古道边的繁华市镇上开店设铺，繁衍生息；有的以此为中转，再向南迁入珠三角地区。千百年的迁进迁出，先民们像网一样撒开，远至海外落叶生根，形成了如今的根系一脉、叶茂全球的景象。作为翻越梅关进入岭南第一站的珠玑巷成为华夏文明开拓南疆的中转站，数十万人从珠玑巷迁出，后裔达千万之众。

历史上大规模的北方人南迁入粤从秦朝开始，秦始皇两次派大军向南进军，平定了南越，把岭南归纳入版图。很多南征的秦兵在当地留守落户，成为岭南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一部分人在珠玑巷附近安家落户。北方人大举南下是由于中原战乱，而为了躲避战乱珠玑巷人又不得不再次南迁，进入珠三角等地。珠玑巷先民的大举南迁发生过三次，分别发生在南宋末年、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朝局动荡之时。南宋末年的珠玑巷移民，是岭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宋末，元军从大庾岭进入广东，遭到福建、江西、广东军民反抗，南雄等地正好处在战区中心，双方互相争夺，战争惨烈。在珠玑巷学廪贡生罗贵的带领下，包括珠玑巷在内的牛田坊 58 村 97 户村民几乎全体南下，走避一空。他们扎竹排沿浈水一路南下，到清远直至三水等处上岸，继而通达南海、新会、中山等地。在此后的多次南迁中，仅在南宋由珠玑巷和周围村落迁出的村民就有近 10 万人。

明清时期，南来北往路过珠玑巷的商旅、挑夫“日有数千”，直到清末粤汉铁路修筑之前，梅关古道承载着珠玑巷兴旺千年。那时珠玑巷酒肆林立，客栈繁多，逐渐演变为通往岭南道上的一个商业重镇，朝廷曾在此设立金沙巡检。缙绅流寓日益增多，才子佳人也活跃起来，珠玑巷发展成为诸姓杂居的繁荣之地，极盛时期的珠玑巷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活脱脱一幅岭南版的《清明上河图》。许多流传下来的古诗词也记载了当时珠玑巷的繁华，明万历年间的进士黄公辅就曾写道：“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

随着几次珠玑居民的大举南迁和新的交通要道诞生，珠玑巷的商业失去了依存的母体，逐渐萎缩。曾经，珠玑巷西侧的小巷打铁生意兴隆，炼铁炉林立，有铁炉巷之称。然而，如今的珠玑巷已无法再寻到一个铁铺，代表传统农业的铁匠行当在现代社会里没落，折射出珠玑巷的发展轨迹。

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走在珠玑巷的鹅卵石路上，令人感喟这条自唐起就扼交通要道、终日车水马龙的古巷，几乎被现代文明遗忘，巷里风物依旧，只是曾经的繁华与喧嚣随岁月的长河如烟淡逝。有“广东

第一巷”之誉的珠玑巷北起凤凰桥，南至驷马桥，全长 1500 多米，是广东目前仅有的宋代古巷古道。珠玑巷有三街四巷，即珠玑街、棋盘街、马仔街和洙泗巷、黄茅巷、铁炉巷、腊巷。两旁民宅祠堂、店铺商号鳞次栉比。巷道曲直有致，古朴清悠。巷内现仍保留着不同朝代的古楼、古塔、古榕树和古建筑遗址等一批文物古迹、观光景点，诸如驷马桥、牌坊、南门楼、双龙桥、千年古榕、中门楼、北门楼和祖居纪念区等。

珠玑巷原名敬宗巷，后因唐代张昌改名为珠玑巷。张昌祖先张兴，七世同居于敬宗巷，唐敬宗宝历元年，朝廷闻其孝义，赐张兴珠玑绦环，因为巷名要避敬宗的庙讳，所以改名为珠玑巷。张兴的孝德故事，不但感染了栖居巷道的先民，而且绵延至今，泽被一代又一代的珠玑后人。在张昌故居，一副对联吸引人驻足观看，上联写着“愿天下翁姑舍三分爱女之情而爱媳”，下联是“望世间人子以七分顺妻之意而顺亲”，很具有人生哲理。在巷道深处的张昌纪念馆，墙上壁立的众多现当代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无不表达了后人对那个时代作为孝德典范的张兴的深深缅怀与敬佩之情。

从珠玑巷南门进去数十米，便能看到一座石塔——贵妃塔，这里流传着一段因胡妃而引起的南迁传说，也称胡妃之祸。相传南宋咸淳年间，胡妃因为被奸臣贾似道陷害而逃出宫，流落江湖，走到钱塘江畔恰遇珠玑巷商人黄贮万，两人定下终生之事，双双回到珠玑巷生活。后来家仆对黄贮万不满，到官府告发。朝廷诏令血洗珠玑巷，捉拿胡妃



2013 年，首届“世广会”乡亲到南雄珠玑古巷寻根问祖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堂。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改所居为珠玑巷。

——《直隶南雄州志》

问罪，众乡邻为逃胡妃之祸，大批南迁，胡妃为了不牵连四乡居民，投井自尽。后人为纪念她在井上放上石塔，也称胡妃塔。后来，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倡议重建了胡妃纪念馆，馆内设有大厅堂、梳妆楼，两侧房屋为展室，分别有“胡妃的故事”“胡妃传播江南文化”等内容的民俗旧物陈列室，展出古代生产农具如水车、木犁、风车、鸡公车等，还有日常生活用具如纺车、笼谷磨、大小石磨、石碓等。

小小的珠玑巷，已成为中国姓氏展览的大舞台，千百年来，从珠玑巷迁播出去的姓氏有百余个，其后裔遍布海内外，许多幸存的家谱上，仍然可以看到珠玑巷的名字，他们把这里看作宗族的发源地。珠玑巷沿路簇拥着各姓氏的祖居，王姓、谭氏、翁氏……几乎每一扇大门的门额都张贴书写着各种姓氏祖居字样的红纸，一些姓氏的后人还筹资修建了宗族新的祠堂。每个姓氏宗祠都是一座“姓氏博物馆”，展示姓氏独特的历史源流、迁徙分布、家谱派系、家规家训、名人典故等资料。《百家姓》列出的姓氏，基本上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这里姓氏之多，恐怕在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

一度繁华的珠玑巷逐渐脱离现代化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有幸保存原貌至今，留下今人凭吊的古巷，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使它重添活力，开始复兴。今天的珠玑巷，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舞狮舞龙、珠玑飘色、春牛闹耕、菩萨巡游，各种地方小吃、土特产品，以



胡妃塔



珠玑巷祖居纪念区牌坊

及许多流传于民间的动人传说、传奇故事等，融合成为灿烂的珠玑文化。而张昌家族的孝德典范、罗贵南迁的拓荒精神、胡妃殉难的大义善举，则深蕴了中华民族创业进取和舍生取义的民族文化精髓。

在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珠玑巷注定是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节点。千年珠玑孕育了岭南文化兼收包容、开放多元的品格与特质，成为中国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衔接点，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

一千多年前，珠玑先民从珠玑巷启程，不畏艰难开拓创业，孕育了以“异姓一家、同舟共济、勤劳勇敢、开拓创新”为内核的珠玑精神，成为时代发展的恒久动力。

一千多年来，珠玑后裔团结睦族、聚谊襄助的乡土情结，是激励几千万珠玑后裔努力奋斗的宝贵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源泉，汇成了爱国爱乡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如今，珠玑后裔遍布全球各大洲，慎终追远、寻根溯源的重根意识，把海内外珠玑后裔紧紧联系在一起，站在新时代的路口，他们将扬帆启程，为民族繁荣不懈努力！

根在五邑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在浩瀚的南海之滨，奔流的西江和潭江环拥着一座有“中国第一侨乡”美誉的城市——江门。江门几乎户户有华侨，家家有侨眷。“侨”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名片，也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基因。江门又称“五邑”，下辖开平、恩平、台山、鹤山、新会五个人文风俗基本一致的区县。“五邑”的称谓形成之前，江门在老一辈华侨中还有一个“四邑”的别称，因为鹤山过去是归佛山管辖的，20 世纪 80 年代鹤山才划归江门管辖。

五邑地区移民历史悠久。据有关史料记载，江门五邑人出洋史可追溯至唐代，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 879），已有新会人随阿拉伯商人前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大规模移民则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五邑地区经历了多次移民高潮。在这星移斗转的岁月变迁里，一代代五邑人走出国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扎根于世界各地，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移民奋斗史。

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以下简称五邑华博馆）通过固定陈列展《五邑华侨史》，以“根在五邑”为主题，分“金山寻梦”“海外创业”“碧血丹心”“侨乡崛起”“侨乡



“根在五邑”序厅（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供图）

新篇”“华人之光”六个部分，展现五邑华侨华人顽强奋斗、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侨乡文化，将这段为世界所称叹的历史“再现”。

一枕金山梦

走进五邑华博馆的大厅，一幅嵌刻于地面的五邑地图徐徐展开，地图尽头“根在五邑”四个大字撞入眼帘，犹如翘首盼儿归的母亲的深情守望，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

19 世纪中期起，中国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民不聊生。当时的五邑地区天灾频繁，人多地少，粮食短缺，租税沉重，土匪猖獗，民众生活愈加艰难。而此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先后发现金矿，在全世界掀起了“淘金热”。随后，又有大量劳工招募信息频频传来——美国、加拿大修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发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都需要大批劳动力。五邑华博馆内有一面招工墙上，贴满了来自花旗国（美国）等各种招工启事，大洋彼岸劳动力紧缺，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招工消息充满了诱惑，给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五邑乡民带来了希望，吸引着他们心生向往。当时五邑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家里贫穷去亚湾（古巴哈瓦那），为求出路走金山。”

早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就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容许自由移民为名，使得“苦力贸易”合法化。这一以朝廷名义打破的华工出洋禁令，开启了晚清华工出洋的血色浪潮。据统计，从 1840 ～ 1876 年移民到美国的华侨有 15 万～ 17 万人，其中五邑人士 12.4 万人；加上到加拿大、古巴、秘鲁、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五邑移民，估计超过 20 万人。五邑移民在这股血色浪潮中占据了极大比重。有材料如此描述当时五邑乡民奔赴“金山”的情景——“父携其子，兄挈其弟，几于无家无之。”青壮年男子“谋食外洋者，十之七八”。很多乡民卖地、卖房，或借债，为“金山梦”冒险背井离乡。除去极少数自由移民外，怀抱“金山梦”的五邑乡民大都以“契约”或“赊单”的方式出洋。“契约”俗称“猪仔”，虽有签订契约，但亦有不少被中介或雇主骗拐甚至绑架等暴力事件发生，也就是“卖猪仔”。“赊单”是指华工与雇主签订一个垫付船票和途中伙食经费的合同，抵埠后以工钱赎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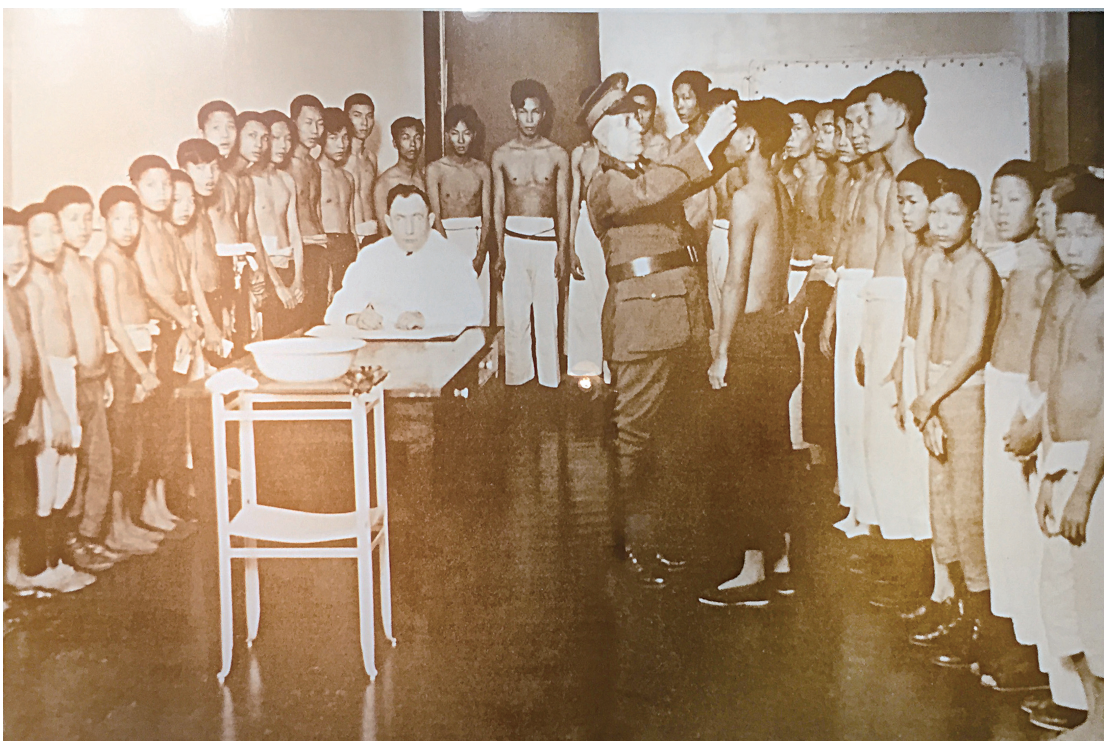
100 多年前，华工远渡重洋谋生，需经历九死一生的漫长航程。博物馆内有一节船舱模型，再现了早期五邑先侨乘船渡洋的情景：昏暗的船舱，华工挤坐成一团，在这逼仄的空间中忍受着风浪颠簸，要熬过一个多月不见天日的时光。这些装载华工出国的轮船被称为“海上浮动的地狱”。那些为养家糊口冒险出洋的先侨们在这“浮动的地狱”中，闷死的，饿死的，病死的，自杀身亡的，或被打致死的，不计其数。

那些幸存下来的先侨抵埠后，却又要面临另一场残酷。他们被“卖猪仔”，沦为矿山、铁路、种植园、渔场等苦力，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甚至还被收“人头税”。面对如此艰难境地，华工忍辱负重，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在艰难讨生活的同时，也为当地社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其中那条被誉为“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太平洋铁路，就是华工用生命铺就的——“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

有一具华人尸骨”。在华工立下汗马功劳后，却遭遇排华事件。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排华运动从美国开始向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蔓延。华工在海外的生存愈发艰难。

19 世纪 70 年代，清政府曾为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做过努力：建立驻外使领馆制度，给华侨颁发护照。五邑华博馆馆藏着 200 余份华侨护照，时间涵盖 19 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涉及美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其中有一份是迄今发现的国内最早的清代华侨护照——1882 年由中国清政府驻美国金山（今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签发的黄华饶护照。这份护照没有持护照者的照片，只用文字描述护照人的体貌特征：“姓名黄华饶，年岁三十二，身材五尺六寸半，面貌紫，异相无。”护照上还写有持护照者的籍贯、职业等，背面是对应的英文。

然而，当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在保护侨民方面已有心无力。美国《排华法案》让不少已经获得护照，甚至已在美国定居的华人遭受孤立。口供纸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排华政策的产物，是五邑侨乡特有的一种华侨文物。五邑华博馆馆藏着一份长达 2 米，记录了近 200 个问题和答案的口供纸。美国排华政策在当时没有禁止商人、学生、政府外交官等入境，但审查异常严格，需要接受移民官各种“奇葩”审问。移民官审问的问题琐碎难料，如：你奶奶有没有镶金牙？金牙镶在第几颗？你家门前有没有树？有没有养狗等等。回答一旦出现错误，就得被遣返。为了让申请来美的亲友顺利通过移民审



口供纸移民多以青少年男孩为主，在天使岛候审室接受体检只是他们漫长而严酷的审查、甄别的开始



旅美华工修筑太平洋铁路模拟场景（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供图）

问，海外华人将提供给移民当局的审问资料详细地记录下来，寄回家乡，让亲友背熟以应对审问。

“阿爸离家乡把家养，去到金山挨凄凉。阿妈日盼夜又想，梦里不是金山样，梦见阿爸泪沾裳。”看似绮丽的“金山梦”，背后却是满满的血泪辛酸。五邑华博馆的木墙上有这样一首诗，字字泣血：木楼永别返香江，从此兴邦志气扬。告我同胞谈梓里，稍余衣食莫漂洋。这是百余年前海外华人在美国“天使岛”木屋里刻下的血泪诗词，从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先侨漂洋过海的无奈与艰辛。

落地生根谋发展

海外谋生不容易，未及立足而客死他乡者无数。然而，纵使前途渺茫，境遇艰苦，先侨们都没有退却。他们卧薪尝胆般坚忍着，熬过一切艰辛，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才智，在大洋彼岸渐渐立稳了脚跟。“一把熨斗八磅重，十二小时手不闲。一周干满七天活。挣了一点血汗钱。拣到洗，烫到叠，为了一碗活命饭，辛苦劳累在金山。”这就是早年间先侨在北美洲、欧洲和澳洲等地谋生的真实写照。

淘金潮过后，铁路修筑也完毕了，熬过排华政策的五邑华侨纷纷寻找出路。制衣、洗衣、理发、餐馆和杂货销售等，他们从这些美国人不愿意干的行业做起。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行业成为“华人经济的生命线”。

勤劳的五邑华侨还为美国开垦出一片“粮仓”。他们出洋谋生前，多为农民出身，种地、养围、捕鱼等技术样样精通。有史料记载，当年五邑华工在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与美利坚河流域筑堤造田，用自己的农务技能开垦出一片超过 109 万顷的良田。从此，这块荒芜之地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菜。不擅种菜的美国人惊叹之余，在成为农场主后，纷纷雇请华工耕种。五邑华博馆内也展示了多幅反映当年五邑华侨在国外从事农业生产的照片。由此可见，华工对美国加州农业做出了不少贡献。

凭借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五邑华侨渐渐地在当地落地生根。不少华侨实现了创业梦，在异国他乡开设了工厂、百货公司、矿场、农场等，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金山橙”之父——来自台山的美国农业专家刘锦浓。他培育的“金山橙”等产品，促使当地农业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870 年，刘锦浓随叔父赴美，先在旧金山一家鞋厂做工，后去了马萨诸塞州亚当斯市谋生。不甘于现状的刘锦浓一边打工，一边学英文和阅读农科书籍，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小时候，他就常常跟着父亲栽培水果，学会了果树嫁接、人工授粉等技术。终于，他的刻苦和才能为一农场主赏识，聘用他管理果园。刘锦浓在这一片果园里发挥所长，培育出早熟苹果、良种西红柿、优质大白菜等。他将果园打理得有声有色，农场主很欣赏他的才华，帮助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在当时，华侨入籍美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后来，刘锦浓有了自己的果园，更加潜心研究果树种植。1888 年，他培育出“Lue Orange”——刘橙，这种橙美味多汁、易于贮存、抗霜冻性强，适于长途运输。这刘橙，就是“金山橙”，是水果中的上品。为此，美国果树栽培学会授予他银质奖章，表彰他的功绩。

还有很多五邑华侨在住在国艰苦拼搏，终于在各行各业站稳脚跟，成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慈善家，灿若星河。

早期，为守望相助，他们聚集而居，不断发展成为社区，“唐人街”由此逐渐形成。在这里，他们创会馆，建社团，办报纸，兴学校，祭神祀，使唐人街富有了鲜明的中华文化色彩，并培育出唐人街经济模式，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为推动住在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多元文化结构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广大华侨青年更是踊跃参军，与各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胜利，也为华侨在海外的创业争取到了合法的权利。

江门五邑华侨积极参加居住国的民族独立斗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突出，赢得赞誉，推动了美国、加拿大排华法案的废除，其生存境遇获得改变，政治权益逐渐落实，落叶归根逐渐向落地生根发展，很多华侨转变为华人。

从最初的艰苦拼搏到之后的顽强创业，再到为住在国做出诸多贡献，五邑华侨在异国他乡开启了新的篇章。

悠悠赤子心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评价“华

侨为革命之母”。近代以来，五邑华侨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些华侨直接投身革命和抗敌事业之中，而大多数华侨则慷慨捐输血汗金钱，甚至毁家纾难，资助救国事业。

为支援祖国抗日，海外华侨社团发起各种形式的募捐，有月捐、特别捐、献金、义卖和购债、侨汇等，还有各种物品捐赠，如飞机、汽车、医药和各种军需物资源源不断运回祖国。参与捐款救国活动的，有侨领，有富商，而更多的是普通的工人、店员、职员等，为抗日救国缩衣节食。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全中国共有侨汇捐款 13 亿国币，其中江门五邑地区的侨汇捐款就达 6.8 亿国币，占比过半。

五邑华博馆里有一个印有“远走天涯、为国效劳”字样的布袋。这个泛黄的布袋装着一段沉甸甸的家国情。布袋的主人是祖籍新会的郑潮炯。家境贫寒的郑潮炯在 17 岁那年跟随父亲到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山打根（现为沙巴州）从事小贩生意，艰难度日。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1939 年郑潮炯的父亲在广东被日军杀害，国仇、家恨激起了郑潮炯的爱国热情。身在南洋的他以义卖瓜子的方式为祖国抗日筹款。一介布衣的他肩跨义卖袋，背着义卖箱，从北婆罗洲的山打根，到千里之外的沙捞越的诗巫、古晋再到新加坡，无惧风雨烈日走遍了整个马来半岛。整整 5 年的时间里，他徒步走遍大街小巷，从早到晚、不辞劳苦地义卖瓜子，劝说大家抗日救国。最终，郑潮炯筹得 18 万余元，全数捐给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

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无疑是一笔巨款。郑潮炯将义卖的每一分钱都记录好，



博物馆内景：卖子救国义士郑潮炯（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供图）


交通部電報局
TELEGRAPH OFFIC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洛陽來
台山

张益民阵亡的通知电报

还给捐款达到1元及以上的捐款者开出收据，不辜负每一份情义。“没有国哪有家。”为民族大义，他甚至义卖亲儿。郑潮炯的义举轰动了当时整个南洋，掀起了南洋华侨捐款救国的热潮。

除了捐钱捐物，华侨青年甚至跨洋回国参战。据统计，广东空军从地勤到飞行员几乎全部是华侨，抗战期间中国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后来陈纳德成立飞虎队，地勤人员也以美国华裔为主。1941 年 8 月 1 日，飞虎队在昆明成立。飞虎队司令少尉余新贤来自台山，在他的感召发动下，数以千计的美籍华人应征加入飞虎队，回到祖国向日本侵略者宣战。当时，飞虎队中 95% 是华裔，大多是祖籍台山等地的青年。

五邑华博馆收藏有一系列“航空救国相关文物”，其中有飞虎队老兵捐赠的 300 多件文物。飞虎队员张益民的阵亡通知电报也在其中。《张益民阵亡的通知电报》是张益民所属的空军第十二队发出的讣告电报，收件人是张益民的父亲张炳联。张炳联是广东江门开平籍人氏，早年赴美国谋生。张益民生于 1913 年，1934 年毕业于美洲中华航空学校机械与航空飞行专业，毕业后回国在广东航空学校见习。抗战期间张益民奉命北上驻防太原。其间，张益民机智勇敢，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 年，张益民在洛阳龙门山的对敌空战中壮烈牺牲，年仅 24 岁。这份讣告，凝结了华侨华人立志航空救国、不惜英勇献身的壮烈情怀。

浓浓桑梓情

华侨华人素有念祖爱乡的传统，无论身在何处，他们始终情系故土。那一封封带着海水味道的侨批就是华侨华人桑梓情深的证明。

侨批又称银信，是海外华侨通过各种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2013 年，侨批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 16 万封侨批，其中有将近 5 万封出自江门，现存最早的侨批也来自江门。

银信纸短，家国情长。五邑华博馆里展出的那一张张泛黄的邮票、褪色的银信，承载着五邑华侨绵绵的乡愁，浓浓的爱国情，跨越山海，辗转归乡。

“喜鹊唱，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传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赚钱养家，是支撑五邑华侨在海外艰苦奋斗的信念。纵使囊中羞涩，食不果腹，他们还是想方设法筹措银钱，寄给故乡的家人买地盖房，改善故乡亲人的生活。五邑地区到处可见的一幢幢中西合璧碉楼建筑，大多是五邑华侨出钱建成的。

五邑华侨情系桑梓，造福的何止是故乡



1963 年，李云宏从古巴寄回家乡台山的银信

的亲人。他们或投资实业发展家乡经济，或兴办各种公益事业，为家乡建桥铺路、重教兴学、扶贫赈灾等。

五邑华博馆内“还原”了一段新宁铁路甯城火车站的场景，一列蒸汽火车静卧于铁轨之上，月台复刻了老火车站的模样。新宁铁路全长 133 公里，是当时中国最长的侨办民营铁路，由旅美华侨陈宜禧主持建造。1904 年，花甲之年的陈宜禧回到故乡，倡议修建新宁铁路：“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路；以中国人之学力，建中国人之工程；以中国人之力量，创中国史之奇功。”他的号召得到海外乡亲的热烈响应，他很快就募集到了 275 万元，超出原计划 4 倍。1906 年，新宁铁路分三期动工，直至 1920 年 5 月才全线建成通车。新宁铁路的通车，带动了周边地区交通、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全面发展，江门台山也赢得了“小广州”的美称。

在兴办家乡教育事业上，五邑华侨同样劳心劳力，曾为家乡捐资兴办了近千家学校。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有些侨捐学校早已闲置或另作他用，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些西洋建筑风格的学校里看到曾经的辉煌。当然，也有不少侨捐学校仍然续写着辉煌，台山市第一中学便是其中之一。有“园林式校园”之称的台山市第一中学就是由华侨、港澳同胞捐建的学校，周恩来、陶铸、雷洁琼、吴学谦、谷牧等曾亲临指导。如今，这所百年名校培育出了不少英才，桃李芬芳扬四海。

时代在变化，而五邑侨胞回馈乡梓的深情却从未改变。一代又一代五邑侨胞秉承“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的华侨精神，支持家乡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江门市侨资企业、华侨个人及基金捐款项目达 4.5 万个，金额超 75.5 亿港元，为家乡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和谐贡献卓著。

如今，居于闹市的五邑华博馆已成为华侨华人精神的寄托之所在，五邑华侨后人的寻根问祖之所。

在凤岗品味客侨文化

文 祥子

凤岗，一座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客侨魅力小镇，在东莞南端与深圳龙岗隔山相望，两地合称“龙凤呈祥”。

凤岗，古称塘沥洞，民国初期建凤岗新圩，才确立凤岗地名。凤岗人的祖先都是移民而来，主要讲白话和客家话，白话语系人口从粤北的南雄逐迁到广州地区，宋末元初再迁到凤岗，有 800 多年历史；而客家话语系人由福建和江西南迁到粤东，再迁来凤岗，至今有 400 多年历史。虽然客家人到凤岗开垦的时间稍晚，但是却凭借着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精神，后来居上，反客为主，现今凤岗客家人占大多数，从各村落众多的客家建筑可见一斑。

为了生存发展，凤岗的客家人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有凤岗客家人南渡到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地，称之为“走南洋”，后来还有不少凤岗客家



2010 年，广东省侨联等主办第二届八省优秀客家山歌邀请赛

人被“卖猪仔”到南美洲牙买加、苏里南等地，民国时期又有人陆续踏上北美洲、西欧各国。至今，凤岗当地有 3 万余人，同时有 3 万多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 36 个国家和地区。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凤岗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21 世纪初，凤岗邀请专家论证，整合本地客家文化与华侨文化资源，在全国首倡“客侨文化”品牌。

每个城镇都应该有承载历史的地方，凤岗也有。园龙山公园山顶广场上凤岗历史博物馆和城市展览馆就是展示当地文化与悠久历史的窗口，“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牌匾挂在大门口。这里两馆合一，资料翔实，馆藏丰富，用文字与照片作为宣传品，展示了凤岗多年来的发展变迁，特别是那些民国时期拍摄的黑白相片，更能让人深入了解凤岗从古到今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人文历史跟精英人物总是紧密相连，张友权、邓焜等华侨杰出代表对凤岗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象棋大师杨官璘为凤岗争取了许多荣誉，凤岗因他而成为“中国象棋之乡”，这些凤岗的传奇人物在博物馆都有详细的资料记载。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在不断迁徙过程中吸收其他文化而形成的。凤岗的客家文化，特别是建筑文化，不仅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就是在客家民系中也别具一格。在凤岗，随处可见耸立于排屋之上的碉楼，这种碉楼和排屋相结合的民居建筑称为排屋楼，既不同于福建土楼，又有别于梅州的围龙屋。排屋楼内外兼收、纵横有序，既彰显了客侨人厚德务实的精神，又显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和开放的心态。20 世纪 20 年代，凤岗兴起了华侨回乡建造房屋的热潮，广大海外华侨不仅带回巨额资金和建筑材料，还带回了异于传统农耕文化的海洋文明，有机融合在客家民居建筑中，排屋巷道相连方便结群而居，碉楼则具有防御功能，两者结合一体，中西文化交融，被形象地称之“上身着西装，下身穿唐装”。观合楼是最具代表性的排屋楼，楼体巍峨挺拔，气势宏伟，楼顶有壁画浮雕，美轮美奂，底层与其它排屋相连，构成一个整体，观合楼在屋群当中，如同巨人，傲视四方，镇守家园。

目前，凤岗遗存的排屋楼多达 120 处，“一处排屋一处村”，这些由排屋楼组成的客侨古村落是凤岗客侨文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的祖屋一般以祖宗姓名冠以楼名以示对先人的孝敬和纪念。凤岗排屋楼中有的沿袭礼制以先人命名，有的以自己的姓名来冠楼名，这并非是简单的张扬个性，而是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其骨子里蕴藏的仍然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基业永固、子孙永续”的中国传统文化，海外游子把热爱故乡传承祖业的情怀寄托于这屹立不倒的排屋楼，也是多元文化的互相包容。

“顺治九年，卫主肖君疏呈招耕，我辈先人蒙霜披露披荆斩棘巩居而数厥田焉，越十年人情翻复……今日者里居数百家烟火相连。”在凤岗黄洞村迴龙庵内有这样一块碑文，记载了当时客家人到此的情形，被称作当地客家的“历史图谱”。迴龙庵已有些破损，但还保存着一些精美的雕刻和几块完好的碑文。从各种残存的资料及口耳相传的传说考证，迴龙庵可能建于明洪武初年，距今大约有 600 年。庵内共有 17 篇 23 个 5 万余字的清代碑文，清晰记载了凤岗镇数百年来的人口兴替、风俗习惯等珍贵史料，“堪称



2014 年，广东省侨联等主办客家山歌（东莞·凤岗）邀请赛

凤岗客家人历史的活化石”。

除了历史文化建筑和自然美景之外，凤岗还有现代化的龙凤山庄，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拍艺术照或者婚纱照，中式、欧式、日式、大自然……各种风格的照片都可以在这里一次搞定。龙凤山庄是全国首个婚庆主题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这里蓝天白云、翠山碧水融为一体，风格各异的皇室古堡、西西里城堡、欧式罗马教堂、日式花园、荷兰风车、欧式长廊等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建筑风物，还有美丽的天鹅湖、芳香四溢的玫瑰园及薰衣草园等，吸引众人驻足留影。龙凤山庄还创办了春来文化会馆，将紫砂文化与当地特色客侨婚俗文化有机地融合，出版《客侨魅力小镇的婚庆之道》《客侨婚庆诗歌集》等书籍，大力传承发扬客侨婚庆文化。

凤岗的客侨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每两年一届的客侨文化节已成为展示客侨文化新发展的盛会。文化节既有客家山歌邀请赛、客侨文化论坛、客侨婚俗集体婚礼，又有客家麒麟邀请赛、客侨联谊会等，吸引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参与，数十万人次参加历届节日活动。还有“客侨好家风”评选表彰、“客侨寻根”摄影作品展、客侨古村跑等系列活动，不仅营造了浓郁的节日氛围，也擦亮了凤岗“客侨小镇”的文化品牌。凤岗客侨文化影响力逐年提升，辐射面逐渐扩大，让大家充分领略到客侨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体验到客侨文化传承发展的力量与希望。

凤岗客家山歌历史悠久，渊源极深，在数百年的流传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艺术特色，在凤岗甚至海外的影响甚广。多年来，广东省侨联、广东省文化厅等联合在凤岗举办的客家山歌邀请赛早已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弘扬客家文化的文化品牌活动，并让客家山歌随着海外华侨传唱到世界各地。凤岗建立了客家山歌创作基地，成立了客家山歌协会，编印了客家山歌教材，设置了客



2016 客侨文化节“两岸暨港澳地区”客家山歌（东莞·凤岗）邀请赛

家山歌第二课堂，举办了客家山歌“四季歌会”等活动。客家山歌传承基地有会员 300 多人，多年来坚持每年常态开展客家山歌沙龙、客家山歌进校园、客家山歌交流展演等系列文艺活动。客侨风艺术团致力于客侨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弘扬，创作了《舞麒麟》《客家妹》《侨乡恋歌》《幸福客家》等一批优秀客家新民歌，在广东省客家山歌擂台赛、梅州（国际）客家山歌擂台赛和中国（河源）客家文化节等活动中屡获大奖。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需要一代代人持续努力。为了让客侨文化不断流传，凤岗编纂了《客侨文化系列丛书》，包括《凤岗客家山歌欣赏》《凤岗排屋楼》《凤岗侨界精英》等，出版了《客侨》杂志和《客家第一珠巩巷》《凤岗客侨情》等书籍，从历史、建筑、山歌、华侨等多方面深度解读和展现凤岗客侨文化魅力。若干年后，新一代客家后裔将通过这些书籍和文字来了解、熟知先辈们的客侨文化。

如今，凤岗镇有 30 多万外来人口，很多来自海外，他们不少人住在排屋楼中，与当地文化融合，俨然是客家先祖迁徙时的生活再现。他们既传承着原有的客家文化，又带来了其居住国或祖居地的特色文化，不同文化交织在一起，对生活在凤岗的人来说，他们可以被称为新客家人。新客家人与当地客家人和睦相处，既在文化上各显异彩，又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客侨文化。

凤岗，几百年的岁月沧桑，道不尽的时光飞逝，传承着别具特色的客侨文化。今天凤岗就像一罐醇醇的酒，在无数客家人心中窖藏，在时代的滚滚车轮上喷薄。面对不断壮大的客家人群，凤岗将扩展丰富客侨文化的内涵，引导新的客家文化传承发展，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客侨文化之乡。

大鹏所城的百年沧桑史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说起深圳的历史，也许很多人都会很迷茫：在改革开放之前，深圳不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吗？哪有什么历史可言？的确，四十多年来，深圳的飞速发展，往往令人们惊叹于它的年轻和活力，而忘却了它曾经的沧海桑田。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曾经有着一段可歌可泣，鲜为人知的绵长历史。深圳的别称——鹏城，正是从这段历史衍生而来。

大鹏所城的由来

14 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乱华”。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称帝，随即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朱元璋几次派使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1392 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日渐炽盛的倭患。

为抵御倭寇海盗的侵扰，明朝廷命沿海要冲建立守御千户所。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奉命筑大鹏守御千户所城，管辖范围为今天的深圳东部及香港地区。大鹏守御千户所规模宏伟，城墙以青麻石为基，内填夯土，再由青砖包砌而成。城墙长 1200 米，墙基宽 5 米、高 6 米，城墙上有雉堞（即有锯齿状垛墙的城墙，可用来作为守御城墙者在反击攻城者时的掩蔽之用）654 个，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城门外设瓮城（大城外的小城，用来加强防御），每个城门上有一座敌楼，两边设四个警铺，城墙四个角上分别设有角楼。

大鹏所城建成驻军后，周边有三分之一的路段既不能骑马，也不能坐轿，只能步行，横通海港没有船只，只能等潮水退去才涉水行走。因此采取了“以农养兵”的办法，“命军三分守城，七分屯军食粮”，驻军的军粮供给主要靠屯军种田维持。守城将士，屯田之兵中既有广东、福建沿海的人也有北方人，来自天南地北的军人语言不同，为寻找沟通，内部逐渐形成当时的“普通话”。在古文献中，这种独特的军营专用语言系统，被称为“军语”或“军话”，又称“千音”。由此也诞生了后来流行于此地的用“千音”来传唱的“大鹏山歌”。大鹏所城这个名字，多年后也被演化为深圳的别称——鹏城。

清朝时期，历任皇帝仍然非常重视大鹏所城。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大鹏所城防守营提升为大鹏水师营，兵员增加到 931 名，管辖现今深圳东部的盐田、上峒、关湖、下沙、老大鹏五个塘汛和香港地区的红香炉汛（香港岛）、九龙汛、东涌口汛和沱泞炮台（炮八位，营房二十六间）、大屿山炮台（炮八位，营房二十间）、佛堂门炮台（炮八位，营房十五间），共有大炮一百六十八位。清嘉庆十五年（1810 年），水陆区分，广东增设水师提督，驻扎虎门，大鹏为外海水师营，归虎门水师提督管辖，兵额 800 名。

鸦片战争的开端

大鹏所城的建城初衷，是为了守御国门，保卫家园。而在数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大鹏所城也的确涌现了不少爱国爱乡、英勇作战的英雄儿女。

明朝末年，由于专职种田的士兵数额不足，所城也只留下少量老残弱兵，守城力量非常弱，倭寇于明隆庆五年（1571 年）乘虚而入，进攻大鹏守御千户所，竟围城 40 多天，并用云梯等器械攻城。在危难之时，舍人康寿柏挺身而出，他带领军民手持大刀砍杀登城倭兵，砍碎倭寇云梯，最终将倭寇逼退，维护了城中军民的安定生活。

清朝时期，从小成长于大鹏所城的刘起龙家境贫寒，早早地就在大鹏营当了兵。他非常熟悉水性，在抗击倭寇，保卫海防的“前后十八战”中屡建奇功，得到朝廷重视，官至福建水师提督。他从小见过不少将军回乡时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因此他长大后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作风清廉。每次回家，他仅带二三仆从，三更半夜摸黑进城，因此被所城内的百姓称为“摸夜”将军，深受百姓尊重和喜爱。清道光十年（1830 年）二月，刘起龙率水师船队出洋巡逻，不幸以身殉职，诰授振威将军，道光皇帝亲笔为他撰写了《御祭文》。

除了抗击倭寇以外，大鹏所城在对抗英军侵略时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晚清时期，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使不少中国人精神糜烂，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家破人亡。1838 年 4 月，林则徐在虎门进行了轰动中外的销烟行动，史称“虎门销烟”。然而，英国殖民者并不打算放弃走私鸦片。1839 年 6 月 20 日，有英国醉酒水手在尖沙咀村与当地村民发生殴斗，其中村民林维喜在打斗中伤重不治。事件发生以后，英国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同意赔偿死者家属，但拒绝按照《大清律例》交出其中一名水手偿命，并以拥有领事裁判权为理由，表示会自行审讯凶手。8 月 15 日林则徐下令停止供应英人柴米食物，三日内撤回澳门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员和工役。由此，中英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

9 月 4 日，查理·义律与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兵舰舰长士秘密乘坐“路易莎”号，率领“珍珠”号等五艘武装船只开往九龙山炮台附近海面，于下午 2：30 向在该处的大鹏营水师兵船发动突然袭击。当时驻守在九龙炮台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见英军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官兵，对敌施放大炮，击翻双桅夷船一只，在漩涡中滚转，英人纷纷落水。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打扫战场后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英船船主忌刺士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而大鹏营只牺牲了两名兵丁，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后

来，这一战被称为中英“九龙海战”。这一战无意之中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

就在九龙海战发生后仅仅两个月，英军同时挑起了穿鼻洋（位于虎门外 30 里）之战和官涌（位于今尖沙咀洋面）之战。其中，在官涌之战中，英军连续 6 次向清军阵地官涌一带发起进攻，赖恩爵率领的大鹏营官兵作为主力部队，骁勇善战，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最终，穿鼻洋之战和官涌之战都以清军胜利而告终，成为中国近代抗击英国殖民主义侵入并取得辉煌胜利第一仗。

此事传回英国后，引起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关注。1840 年，她在英国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呼吁“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向中国发动战争，鸦片战争由此开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作为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蚕食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的战斗堡垒，大鹏所城的海防设施和军事设施被英国殖民者用尽各种方式，终于全部裁撤完毕，历经五百余年的大鹏所城就这样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久弥新的文化

战火纷飞的日子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大鹏所城独特的军事地位却给它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今天，当我们走进大鹏所城，除了游览城中大大小小的将军第和参将署、左堂署等衙署建筑及遗址以外，我们依然能够听到满脸皱纹，面容慈祥的阿公阿婆们用“千音”吟唱着动听的大鹏山歌：“相送情郎出海中，耗壳割娘脚指头。有妹相送我吾怕痛，踏上蚝面照样冲。打开蚝壳挖蚝仔，返归蚝仔煮姜葱。”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歌者，就会发现，女性大多喜欢头戴一种红顶蓝边的竹帽。这种帽子叫“大鹏凉帽”，用手工编制而成，红顶和蓝边分别象征“红缨”和“大海”，极具军营屯田文化特征。数百年来，当地妇女就戴着这样的帽子，既遮阴纳凉，又能在无声中缅怀英勇先烈。

另外一种祭奠先烈的仪式则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大鹏清醮”。古时，新安县“打醮”分为两种，一为解除瘟疫的“瘟醮”；二为祈求平安的“太平清醮”。源于 600 多年前大鹏所城的大鹏清醮，是大鹏所城军民为追念抗击外来侵略者阵亡将士和海上罹难者而举行的祭祀活动。每次打醮，都会在农历正月初七至十五期间挑选吉日，在古城天后宫门前空地搭醮坛，打醮时间固定为七天，其中包含了制作纸扎祭品、拜祭、巡游、放生、吃斋等多项活动。在“打醮”的前六天，村民们每天都要吃斋，而在最后一天，打醮仪式结束后，全城将大摆“将军宴”。“将军宴”，相传源于赖恩爵将军家的家宴，赖恩爵将军每逢打完胜仗或逢年过节，都会设宴款待归来的将士和四方的乡邻，以表凯旋之喜和爱民之情。这样的宴席广受老百姓和将士的喜爱，因此这一习俗流传至今。2007 年，大鹏清醮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果你是个吃货，那么你一定要尝尝大鹏所城独有的“大鹏打米饼”和“大鹏濑粉仔”。许多年前，大鹏所城的将士外出巡逻、打仗时往往需要自带干粮。广东主产水稻，但米饭难以长期储存，因此一些军人家属便将大米磨成粉，以水调和做成饼，放在铁锅里，用柴火烤熟成为米饼，不但便于携带，更能保存较长时间。但这样做成的米饼既硬



大鹏所城夜景

又粗糙，咬起来很费力，而且没有味，不好吃。于是家属们又先将大米用开水浸泡，再用石磨磨，还在米粉中加入糖水、芝麻、花生等原料，这样烤出的米饼金黄松脆又香甜可口。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木模，在模子里刻上吉祥的文字、图案；制作米饼时往往用木槌锤紧放入模子里的米粉，因此这种米饼又称为打米饼。大鹏所城至今流传着一首《大鹏米饼歌》：“九龙海战奏凯歌，鹏城军民齐庆贺。支援前线送米饼，保障干粮装满箩……”足以说明打米饼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同样，当地人因地制宜，还研究出了大鹏瀛粉仔这种独特的食品：将大米浸泡后，用石臼舂成粉，再以生熟粉混合，加凉水调成浆，直接盛入椰壳中，在椰壳下面钻一个 2 厘米左右的圆孔，手执椰壳不停地摇晃、抖动，米粉浆就会从孔中流到下面铁锅的沸水中，煮熟后放上油盐调料，即可做成一碗鲜美可口的大鹏瀛粉仔。

有人说，历史是枯燥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但是在大鹏所城，当你轻轻抚过那历经沧桑的城楼，读过那段简明却意味深长的赖氏家训——“文官愿为清吏，武官敢当沙场”，吃一碗热腾腾的大鹏瀛粉仔，你就能理解大鹏所城数百年来无数将士的爱国情怀，也更能体会这种不畏强权，敢于抗争，致力于报效祖国的精神对于深圳的今天和明天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鹏城，恰如他的名字一般，将鹏程万里，前程似锦！

探访客家千年古镇

文 祥子

常听人说起，梅县人是正宗客家人，自从知道夫人先祖是梅县迁出的客家人，就开始关注梅县，自诩也算半个客家人了。

梅县，这个客家人聚居地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的美誉，历来崇文重教，名人辈出。自辛亥革命以来，从梅县走出的将军超过 100 位，包括开国元勋叶剑英在内的一大批光耀中华的名人贤士都出自梅县。这个久负盛名的人文秀区，是客家历史文化遗产最丰富的聚集地，逾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大量客家民居和名人故居，这些风格独特的中国民宅建筑瑰宝屹立于青山绿水之间，构成了神秘而绚丽的画卷，形成了客家独特的人文景观，令人心神向往之，只是一直无缘得见。直到客家古镇松口镇获评“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我才踏上了梅县的方寸之地，虽然只是浮光掠影般穿过，但足以让我领略妩媚的客家风情。

松口镇迄今已逾千年历史，人文底蕴深厚，是闻名遐迩的岭南四大古镇之一，也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史料记载，西汉南越王赵陀统一岭南，和集百越，梅县属南海郡龙川县，无独立县名，松口主户畲族人，称为“东畲寨”。东汉、三国、西晋时，属广州义安郡海阳县，改称“义安围”。公元 945 年松口始有镇之称，清初改称“松口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多次调整，逐步形成当今的松口镇。

松口古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约一公里长的南洋风格骑楼沿街耸立，骑楼下的街道空寂冷落，偶有人影也匆匆走过，几家杂货铺显得萧条。沿江而建的数百间店铺由西向东形成了曲折起伏的古镇轮廓线，店铺平面布局纵深宽敞，既有古朴传统的木板铺面，又有南洋风格的骑楼，使古街连片店铺中西合璧而富有变化，临江吊脚楼与店铺亭顶建筑相互辉映，别开生面。

松口古街是客侨商贸文化的缩影，据说



繁荣西路骑楼建筑



松江大酒店

宋代已有集市。明代李氏“世德堂”族人合力所建的“世德新街”，街巷狭长，“楼下经营，楼上寝室”，夯墙灰瓦，古朴深邃。20 世纪 30 年代华侨投资的商铺曾让古街达到了商业的鼎盛期，每逢岁时佳节，古街客家民俗事项丰富多彩，如春节舞狮、元宵赏灯、春秋祭祖、端午赛舟、中秋对歌等。如今那些繁荣的景象早已远去，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骑楼保存得非常完好，从任何一个角度望去，似乎都能回到清末民初的年代，让人感受到时光穿梭的真实感。

顺着骑楼往前可以看到梅江旁边的旧码头，其中火船码头最引人注目，尽管这里已经寂寥得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无聊地拍打着磨得发亮的石阶。数十年前，许多客家人为了逃避战乱再次迁移家园，松口就是下南洋的必经之路。昔日的火船码头，最多的时候有 300 多条船只同时在这里停泊，数以千计的旅客从这里出发。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离别场景，有些人此去就是一辈子，再无回头之路。正对码头的松江大酒店为中西合璧式的 5 层建筑，得天时地利之便，当年曾经是闽粤赣最有名的酒店之一。无数客家人由火船码头下汕头出南洋，或由南洋回国探亲时，都要在松江大酒店住一宿。这里是华侨背井离乡的第一站，也是华侨回乡光宗耀祖的落脚之地，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承载了早期华侨移民的记忆。这里是海外漂泊的起始符号，每年都有许多华侨带着后辈来这里仰望滔滔江水，回忆昔日的离别情景，怀念逝去的岁月。

在松口，随处可见客家文化特色的古建筑。古人以为“天圆地方”，“圆”既表示对于天的崇敬，又象征团圆和幸福，于是客家人就生动地把“圆”体现在建筑上，特别是围屋。松口至今还保留着历史久远的元代



中国（梅州）移民纪念广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2013 年 10 月 13 日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正式落成，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移民纪念广场

客家围屋遗址，明代殿堂式围屋“世德堂”被誉为“客家建筑文化活教材”，建筑风格结合了中原汉族府第的特点——“三堂不见瓦”，结构极具特色，吸引着国内外客人尤其是艺术、建筑专业人士前来参观考察。世德堂内静静幽幽的一片竹海，旁边松源河逶迤而过，置身其中，面对一望无际的碧绿竹海，听着虫鸣鸟唱，品一口客家山茶，恍如世外桃源。

松口古建筑还蕴含丰富的人文科学。由于松口地处梅江下游，常遭遇洪水侵袭，故沿江古街建筑多为三至四层，有些甚至高达五层。店铺建筑用客家人独特的红糖、糯米饭搅拌三合土夯墙或洋灰砼混结构，墙体坚固，不惧洪水浸泡。楼棚则大多为木板棚，可视洪水高低逐层揭开，以消除水压对楼棚的安全威胁。有些洋行客栈干脆建造时就在楼棚中央设计天井，平时既可通风采光，又可装吊店内储存的货物，遇洪水侵袭也无需拆掀木板棚。为预防特大洪水侵害，大部分店铺山墙垂脊为阶台式，可供人在山墙垂脊上拾级行走，既美观又可作洪峰期间的最后安全防线，在楼顶坚守或等待救援，无须揭瓦拆梁损坏建筑而逃生，这是客家人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生存的智慧和科学总结。古街店铺山墙仍可见到店主标识历年洪水的标高记录，成为另类的民间水文历史档案。

松口自古以水上交通发达、商贾云集、经贸活跃、富庶一方而蜚声中外，“松口不认州”“小香港”“不夜城”等俚语，道出了松口古镇的繁华兴旺。松口港曾是广东内河港第二大港，百吨轮船由梅江直通潮汕出海，沿河建有码头 29 座，丰水期松口港江面停泊船只达千艘。20 世纪 40 年代松口港口、墟市建设已有相当规模，闻名海内外。梅县周边出洋谋生的人都从松口坐船经汕头出国，



泰国邓氏宗亲总会组团回祖籍地梅县松口祭祖

从南洋寄往松口的信件，只需在信封上写明“中国汕头松口”即可送达。由于梅江水系直通汕头出海口，松口成为明末以后聚集于闽粤赣山区的客家人下南洋的始发地，见证了客家人漂洋过海，艰苦创业的历史，也成就了松口“日看千帆过、夜观万盏灯”的辉煌景象。鉴于全世界客家人的影响力，也为了纪念飘落印度洋群岛的中国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择梅州作为客家人移居海外的原乡，在松口建立了中国（梅州）移民纪念广场，包括中国移民纪念碑、世界客侨移民展览馆，名为《家园》的主题雕塑以榕树的抽象造型托起地球，七只和平鸽代表七大洲展现了散布全球的客家民系。

繁华过后是烟云，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地方，衰退之后往往迅速地消失在视野之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年“松口不认州”的繁华早已随着历史的变迁流散在时间长河里，个别的载体以文物形式得以保留，更多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而被覆盖。曾经的岭南四大古镇仅有松口保存原貌，那些街道、那些故居、那些传统文化，仿佛依旧未曾改变。客家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对于先人的尊重，让后来者仿佛回到过去，走在松口的大街小巷，时间仿佛停滞在过去的岁月里。走出松口，身后繁华早已落尽，空余下寂寥寥的街道，空荡荡的码头，还有一片恍若无人的寂静。

清晖园：因孝而园起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少时读《红楼梦》，我对“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印象很深。大观园是为了元妃省亲而修建的，从贾政让贾宝玉题匾额对联开始，到后来金陵十二钗生离死别，大观园见证了贾家的兴衰，既是公子小姐们的乐园，也是他们的伤心地。而清晖园，作为岭南四大园林之首，也恰似大观园一般，隐藏了一段罕为人知的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



白木棉九鱼图灰塑，灰塑是岭南地区传统建筑装饰工艺

“耕读传家”的龙氏一族

清晖园的历史与中国古代“耕读传家”的传统息息相关。翻阅清晖园的历史，会让你感叹这里实在是一块读书入仕的“风水宝地”。

清晖园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清晖路，最初在这块土地上建宅院的是顺德杏坛镇人黄士俊。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黄士俊高中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1621年，他在顺带城南门外的凤山脚下修建了黄家祠和天章阁、灵阿之阁。

黄士俊是古代罕见的长寿之人。在91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目睹了明王朝的灭亡，清军入关，以及清顺治帝短暂而跌宕起伏的统治时期。而他的家族，也在他死后数十年内，逐渐衰落。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生机的家族，正在岭南地区悄悄兴旺起来，那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龙氏。

龙氏自宋朝起迁居广东，及至六世祖龙现追随堂兄龙喜到顺德大良，喜爱此间“山明水秀，可耕可儒”，遂定居于此。顺德从15世纪的明代中期开始，由于手工业，尤其



清晖园里的水池和具有江南色彩的假山

是丝绸业发达，从一个渔村逐渐演变成为经济文化昌盛的集镇，当地素有“重书崇文，读书做官”的传统。

定居大良之后，龙氏分为两房，长房居于凤山之麓，明正统年间改居于以后的顺德县城东门附近，因此称为“东门房”；次房居于碧鉴，为“碧鉴房”。

明景泰三年（1452 年）顺德建县前，龙氏已是有一定文化根基的耕读世家。龙氏十世、十一世的传记、墓志铭中多有“诗礼巨族”“望族”等描述。明正统十四年（1449 年），黄萧养从广州大牢越狱，举旗反明，义军达十万余人。黄萧养是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潘村人（今广东省顺德），因此大良居民多半被迫胁从，“不从贼者止十九家”，其中即有龙氏。在黄萧养起义过程中，碧鉴房一家八口死于大难，仅一子龙澈幸存。东门房龙应澍带领一门二十余口，冲破军队禁锢，“义不屈服”，因此树立了社会声望。黄萧养起义被平定后，为加强统治，当地乡绅上书朝廷请求成立新县，龙氏东门房和碧鉴房都参与了上书，因此成了建县功臣之一。明中后期，大良龙氏的政治地位得到官方认可，逐渐走向中兴。

在封建时期，想要真正振兴一个家族，通过科考谋取功名几乎是唯一的道路。《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几近癫狂的举动，以及老丈人胡屠户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逼真地刻画了当时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视。

然而，相对于范进，乃至于《儒林外史》

的作者吴敬梓来说，龙氏一族的“应试水平”可谓相当高超。

入清以后，龙氏宗族进一步发展，在中山、番禺、顺德等地拥有东海十六沙等大量沙田，经济实力大增，同时也建立了完善的教育机制，清前期平稳发展，生员资格以上的人数徘徊在 20—30 名之间，多为监生、县学生等。乾隆十六年（1751 年），碧鉴房二十一世——龙应时参加殿试高中，成为龙氏第一名进士，曾任山西平阳府灵石县知县。龙氏家族从此步入仕宦阶层。

在古代，受“衣锦还乡”“封妻荫子”等观念影响，不少官员都会在自己的老家购田置地，建造府第。龙应时也不例外。他经过一番考察，看中了当时已经荒芜的黄家祠，于是把这块地买了下来，修葺扩建，植花莳草，渐成规模。

根据史料记载，龙应时一辈子都没当上什么大官。但令他极为欣慰的是，儿子龙廷槐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也高中进士。龙应时得到喜报，深感苦尽甘来，欣然写下了诗句：“雁塔署名寻旧款，傍花单姓得新传。”

龙廷槐不负众望，他的官运比父亲好，一路当到了监察御史，入值上书房。龙廷槐是个孝子，他时常感叹自己不能亲身侍奉双亲，“游学省垣，远宦京师，不获亲侍三十余载”。恰逢和珅弄权，官场黑暗，因此，在清嘉庆五年（1800 年）父亲去世之后，龙廷槐便索性不再出仕，1805 年在父亲购买的黄家祠旧址上为母亲兴建“小方园”。

回归故里的龙廷槐并没有闲着，他一方面晨昏定省，精心侍奉母亲，并于家中设立私塾，督导龙氏子弟研读诗书，另一方面也



清晖园内“归寄庐”的庐匾出自清代书法名家李文田之手

积极参与家乡建设，曾筹备大良公费万金，以济贫、养士、拯荒。清嘉庆十四年（1809 年），海盗张保仔、郭婆带船只 200 余艘驶至县城大良十里外的板沙尾屯泊，战争一触即发。龙廷槐当时已是花甲之年，但他仍然率先捐款，经手督办砖石炮台两座、土炮台一座及筑栅堵河诸项工程。即使不能时刻巡防，但他依然亲自指示次子龙元侃与其他乡绅一起巡防，招募乡勇，组织团练。四年后，顺德海盗风波逐渐平息，李铁桥成为新一任的顺德县令。龙廷槐为了帮助李铁桥更好地了解当地民俗民风，专门写了一篇《李铁桥明府咨询风俗议》，深刻剖析了顺德大乡大族雄踞一方的社会现状，以及当地女子“不落家”“义结金兰”的风俗。这篇文章因为

意义深远，被录入了县志，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顺德历史的重要材料。

龙廷槐的举动无疑为后辈树立了榜样，他的儿子龙元任同样高中进士，创下龙家祖孙三代同为进士的传奇。至清朝结束，龙氏一共涌现了文武 7 进士 28 举人，其中碧鉴房一支就有 6 进士 12 举人，在当地十分显赫。

岭南名园的绝代风采

随着龙氏一族在科举考试方面的成功和家族财富的不断增加，龙氏对家族园林的建设投入也越来越大。清嘉庆十一年（1806 年），龙元任扩建了“小方园”，因该园是龙廷槐为了侍奉母亲而建，于是龙元任取“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意，将“小方园”改名为“清晖园”。而后，龙元任之子龙景灿（举人）、龙景灿之子龙锡恩（监生）相继成为清晖园第四代、第五代园主，他们对清晖园的扩大建设都有贡献。



清晖园里的树种都用石料修砌底座，用精美的灰塑装饰

走进清晖园，你可以领略到浓浓的岭南风情。广东地区气候潮湿，雨水充足，广东人认为“水为财”，因此希望钱财如水般丰盈。由此，在岭南传统园林里，一定要有水，清晖园也不例外，里面有着众多大大小小人工挖掘的水池，池里游着不少肥硕的鲤鱼，十分悠闲自在。由水而衍生的是清晖园的中心部分——船厅。船厅是船舫与楼厅建筑的结合体，平面像舫，主体是楼。据说，船厅的式样是模仿昔日珠江上的一艘名船建造的。舫是中国古典园林里不可缺少的建筑，是古人依照现实生活中的船而模拟提炼出来的建筑形象。在船厅前左侧，清晖园的主人还刻意栽种了一株古藤顺楼蹒跚而上，象征系船的缆绳。

船厅又被称为“小姐楼”，相传是清嘉庆年间园主为未出嫁的女儿修建的。按照封建礼教，大家闺秀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能轻易与外人接触。因此“小姐楼”没有楼梯直接上下，出入“小姐楼”必须经过楼上露天平台的回廊绕到“南楼”。“南楼”是船厅的后舱，也是小姐的丫鬟仆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小姐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家中仆人严密地看管。

也许是为了缓解小姐独居阁楼的苦闷，船厅的走道侧装饰着木栏杆，往下望是碧波荡漾的池塘，恍如置身船上。前舱与后舱间有一道间隔，充分利用木雕镂空成芭蕉图案，窗格则用木刻竹叶装饰，人在厅内，仿若在蕉林竹丛荫蔽的珠江三角洲水乡之中，为小姐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乐趣。

与“小姐楼”相对应的，是园主对族中男性后裔的殷殷期望——清晖园里建有状元堂（原名“红藁书屋”）、笔生花馆、真砚斋和惜阴书屋，从这些建筑的名称不难看出，龙氏一族对子弟珍惜光阴，勤学奋进，读书入仕的规劝。

同样充满寓意的还有园中种类繁多的各种植物。虽然说岭南本来就有许多种植物以供选择，但园主人一般都会选择象征吉祥寓意的品种。例如石榴——石榴多子，而且酸，酸在粤语中与“孙”同音，因此石榴象征着“多子多孙”，为园主人所喜爱。还有芭蕉和榕树，芭蕉枝大叶大，象征家业兴盛；榕树树冠很大，根系非常发达，象征家族子孙后代不断延绵。这些高大的树种都用石料修砌底座，用精美的灰塑装饰，既美观又能防止水土流失。

而最为园主人所喜爱的，则是竹。竹既有“清高”的含义，也有“节节高升”的寓意。在清晖园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竹的形象，不但漏窗、院墙以竹子为造型，而且还专门营造了一个竹的天地，取名竹苑，是龙家子弟读书的庭院。

在《红楼梦》书中，贾政曾说过：“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由此可见，在古人心中，匾额对联对于一个园林来说极为重要。清晖园中，多处建筑物的匾额都值得细赏。“清晖园”的匾额是由清朝进士、文学家李兆洛所书；游廊上的“绿云深处”匾额则为乾隆帝十一子成亲王所书；“小蓬瀛”牌匾为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宋湘手笔；“归寄庐”庐匾则出自清代书法名家李文田之手。

除了传统中式风格，清晖园也融合了西洋元素，欧洲古典建筑的罗马柱式被装饰在园里的许多门窗和墙面上，演变成了中西合璧的造型。玻璃在古代昂贵难得，中国古代上层人士斗富往往使用玻璃器皿显示其豪华。清晖园中装饰门窗的彩色玻璃都是清代套色玻璃制品，是当年岭南的玻璃工匠利用意大利、法国进口的套色玻璃，运用中国古代特有的雕刻、手绘等工艺制成。

从家破人亡走向开放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破开了中国封锁的大门，数千年来沉浸于封建制度的人们在惊愕中慢慢被迫转变。处于沿海的广东氏族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龙廷槐的第四代传人龙朝杰，被父亲送



清晖园中装饰门窗的彩色玻璃都是清代套色玻璃制品

到了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皇仁书院读书，与孙中山、廖仲恺是校友。毕业后，龙朝杰担任港英政府的公务员，后来升任香港电讯司副司长、香港华员会（在港华人组织，香港政府公务员工会）会长。1941 年，香港沦陷。龙朝杰拒绝为日本人工作，遭到了日军的刁难和敲诈勒索。龙朝杰思索再三，决定动员年龄最大的两个儿子返回内地。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龙启昌、龙启明说：“现在国难当头，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没有祖国，就只有耻辱和凌辱！”远在香港的龙朝杰也许并不知道，就在 1938 年 7 月，清晖园最后一任园主龙锡恩已去世了，当年 10 月，日寇占领大良，龙锡恩的子孙家人纷纷逃往香港、澳门及海外。龙氏一族也许在香港曾相聚，也许失之交臂，我们不得而知，但清晖园再也不是龙氏一族的安身之地了。

然而无论如何，1942 年，龙启昌还是去了重庆，弟弟龙启明来到了桂林，无意间看到了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的广告，龙启明便报了名。两年后，龙启明成为飞虎队六名中国飞行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飞行员。加入飞虎队不久，他就被派遣到印度加尔各答执行对缅甸腊戍、密支那、仰光等地日军轰炸的任务。后来，他又参加了对云南腾冲、龙陵、湖北汉口、湖南芷江等地日军军事目标的轰炸，以及支援中国军队地面作战。1945 年 8 月 25 日，龙启明和轰炸机分队队长希尔少校接到上级命令，从四川梁山县（今重庆梁平县）起飞，直接降落在武汉，接受日军投降。

这是龙启明一生中最畅快的飞行，因为他终于可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1944 年，父亲龙朝杰和母亲从香港返回内地途中不幸被日军炸死，唯有 11 岁的弟弟侥幸生还。龙启明和龙启昌从未想过，香港匆匆一别，竟是与父母的永别。

1949 年 11 月，龙启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两航起义”，毅然从香港驾机返回内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1953 年 10 月，他转业进入重庆钢铁厂，直至 1982 年退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氏族人散落于海内外不同地方。为保存文物，1959 年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视察顺德，指示重点保护，并拨款修复，将原清晖园、广大园、楚亭园三部分合并总称为清晖园。2011 年，经龙启明提议，龙氏后人一致同意，龙启明和留在顺德大良的龙氏后人龙颂良一起将原民国三十六年广东省政府地政局颁发的《土地所有状权》证书、《龙氏族谱》一套、勋章、照片等近百件历史文物捐献给了顺德区政府。2013 年 3 月，佛山市顺德区清晖园博物馆挂牌成立，同年国务院核定公布清晖园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清晖园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如今，清晖园已成为顺德的文化地标，时常举办各类少儿文艺演出、广东音乐专场、粤曲戏剧展演活动，每逢传统节日，还会配合举办系列传统活动，如开笔礼、书法讲座，端午节活动、诗歌朗诵、中秋灯谜、做月饼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由于清晖园地处顺德市区内，从清晖园内眺望，能看到四周高耸的现代高楼，但当你沉下心来，仍能从一步一景中，感受园中 400 余年来沉淀下来的历史风云和文化魅力。

清晖浩荡，源远流长。

锦绣中华，怎一个妙字了得

文 何尚

如今，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网红打卡点”，有些打卡点是历史古迹，有些是高档奢华的精品百货店，有些是幽静宜人的森林公园。而在 30 多年前，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华民俗村可谓是全国闻名、人人向往的著名打卡点。在那里，人们可以一饱眼福，感受中国大江南北不同地区的绝美风光和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锦绣中华和中华民俗村承载了一代人的旅行回忆，也成为了华裔青少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

锦绣中华是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今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中旅集团



锦绣中华



民俗村《龙凤舞中华》演出

有限公司（今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风情，吸引境外游客来到中国、了解真实的中国，是锦绣中华缔造者的宏大心愿，也是历史赋予锦绣中华的特殊使命。锦绣中华筹建处汇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和斗志昂扬的年轻人。当年，国内一流的文史学家、艺术家、古建专家、园艺专家、民俗学家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齐聚深圳湾畔，为筹划锦绣中华项目出谋献策。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 200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汇集深圳，奋战了两年才完成景点的建设。1989 年 11 月 22 日，世界上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实景微缩景区——锦绣中华正式开业，来自中国东土西域、南国北疆的 80 多个名胜古迹锦绣荟萃，景点比例大部分为 1:15，最大比例为 1:1，井然有序地分布在中国版图位置，错落其间的是五万多个栩栩如生的陶艺小人，生动地再现了中国 56 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

锦绣中华园区正式开放的第一年，便以接待游客超过 300 万人次、9 个月收回全部投资的奇迹，轰动了中国旅游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以“一步迈入历史，一日游遍中国”的恢宏气势被誉为“开中国人造景观之先河”的杰作，并由此引发了主题公园的建设热潮。

1991 年 10 月 1 日，锦绣中华姊妹篇——中国民俗文化村隆重开业。中国民俗文化村占地 20 多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民俗博物馆”。园区内现有 27 个民族的 28 个村寨，是在中国民俗专家和各民族文化学者的指导下，在尽最大努力保持少数民族风貌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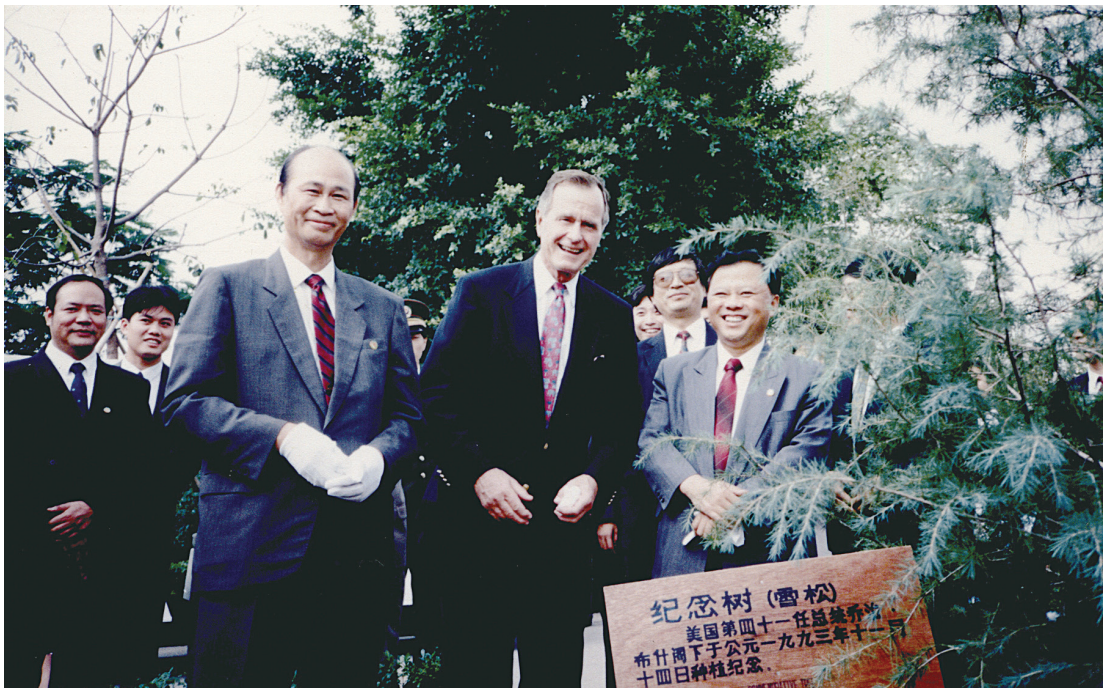


1992 年 1 月 21 日，邓小平视察锦绣中华和民俗村

上建造而成。中国民俗文化村以村寨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播散地，通过民族风情展示与体验、民族歌舞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大型民间节庆活动和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多角度、多侧面、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让游客快乐地体验中华民族的精华，领略民族文化的魅力。

1992 年 1 月 21 日，邓小平南巡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和中国民俗文化村视察，并在景区内的布达拉宫景点与家人合影留念。当日 10 时许，邓小平和家人抵达民俗村广场，整个广场都沸腾起来了。当天景区照常开放，邓小平沿途向各村寨的少数民族员工、景区工作人员和游客亲切招手。当导览车经过海边椰林时，邓小平看到高大的千手观音，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千手观音。”过了陕北窑洞后，他下车步行至新疆村寨，抱着小孙子观看新疆维吾尔族的歌舞表演，兴致很高。随后，邓小平由民俗村步行一段路转到锦绣中华景区。经过乐山大佛、云南大理三塔、桂林山水等景点时，邓小平说：“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抵达西藏布达拉宫景点后，他说：“中国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就是没有到过西藏。”于是，邓小平分别同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及陪同的负责人在布达拉宫景点前合影留念。同年，来自世界各地的 716 万游客来到这里，创造了中国主题公园年接待游客量的最高纪录。

如果说锦绣中华是一座座精心雕琢的静态艺术作品，那么民俗村就是潜心勾勒的一幅幅中国历史风情画卷。动态的表演是民俗村活的灵魂，她对各民族地区采风而来的民俗风情，加以提炼与升华，并以本民族演员



1993 年 11 月 14 日，美国总统布什参观锦绣中华，并植树留念

登台演绎，艺术地展现各民族原汁原味的民俗生活。演艺，是中国民俗文化在锦绣中华民俗村绽开的一朵朵艺苑奇葩，是景区最具特色的产品。1995 年推出的《中华百艺盛会》，以“一夜纵览五千年文化，一台荟萃八万里风情”的恢宏大气，被誉为“广场艺术的精品”。在此基础上，景区不断推陈出新，先后创编《新中华百艺盛会》《绿宝石》《蓝太阳》《东方霓裳》《龙凤舞中华》等 12 台大型晚会。2003 年 1 月 1 日，大型华夏综艺晚会《龙凤舞中华》正式隆重推出，2008 年 11 月，该剧喜获 IAAPA 美国年展 Big E 最佳演出荣誉提名奖。

锦绣中华艺术团还每年承接众多的涉外演出任务，曾多次受国务院侨办、国家旅游局委派，以“中国民族艺术团”的名义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演出四百多场次，深受海外华人和外国观众的喜爱。2002 年 5 月，艺术团应邀代表国家为庆祝中日建交 30 周年出访日本，引起轰动；2000 年 9 月 10 日，受国家文化部重托，艺术团代表“中国民族歌舞团”随江泽民主席赴美国参加“中华文化美国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舞蹈的旋风”。

2019 年，深圳锦绣中华和民俗村被列入 2019 第七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近年来，广东省侨联在举办“风韵南粤”华裔青少年夏令营期间，都会将深圳锦绣中华和民俗村列入“外出学习”的打卡点。通过游览这两个著名景点，华裔青少年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精深博大和包容开放，加深对华夏文明的理解和认知。

花山小镇故事多

文 乔萱

遇见花山小镇，正是她天真烂漫年少时。她的舅舅因为生意的原因搬到了花山小镇，租了一座“三间两廊”的青砖大屋，据说原主人家已移民海外。节假日，她常常去舅舅家串门，因为舅舅家总有很多没见过的洋零食，还有很多好玩处——中西合璧的华侨碉楼群。舅舅家的洋零食是左邻右舍送的。舅舅说，左邻右舍都有海外亲戚，他们回乡省亲总是带回来大包小包的零食，最经典的是巧克力和花旗参糖。



花山小镇

花山小镇其实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小村庄——洛场村，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洛场村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是著名的“华侨之乡”。花都在清嘉庆年间就有人出国，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出现过多次出洋高潮。据资料记载，花都人出洋有很多种因素，其中的两个因素是自然环境恶劣和兵灾匪患。当时花县（花都的旧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又有平原又有山，年年搵食咁（这样）艰难；响归（在家）耕锄难度日，漂洋过海去谋生。”而花县原属“三不治”地带，“花山寨”贼匪猖獗，到处打家劫舍，村民被迫离开。且花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繁，人民饱受兵灾之苦而背井离乡避祸走难。花都人常常是家族式移民，靠着血缘关系和亲戚提携，以致整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都走光了，洛场村尤为最甚。据统计，洛场村有海外侨胞 5000 多人，主要侨居在美国，是现居村民人数的两倍。

19 世纪中期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谋生的洛场人，足迹遍布美国、巴拿马、东南亚等地。据《花都华侨志》载，花都人旅美的先驱，是花山平山村江、刘二姓的先辈，而当时平山村包括现在的洛场和东华。洛场的江荣辉、江炽尧于清嘉庆五年（1800 年）赴美谋生，江活涵、江相威、江根威、江永刚、江活添、江新南、江杰宽等，在清同治三年（1864 年）应募到美国加州修铁路。他们在

海外谋生大多不容易，大洋的彼岸并不是想象中的遍地黄金唾手可得，但他们总是坚忍求存，以其勤劳、智慧和诚实的品格在异国他乡拼搏奋斗，落地扎根。

纵隔千山万水，故乡永远是华侨心中的惦念。洛场乡亲在异国扎稳根基后，纷纷寄钱或亲自回乡买地、建房、娶亲，或者支持家乡建设，以光宗耀祖。

洛场村现今仍有 50 多座华侨碉楼，散落于黄墙瓦房和新民居之间，溢满浓郁的侨乡气息和鲜明的乡土色彩。这些碉楼大部分建于 1920—1940 年间，是当地乡村工匠结合华侨带回来的明信片、外国建筑的画报建起来的。楼房大部分为三四层高，布局、内部装修与陈设以中式为主，建筑造型则以西式为主，形态庄稳，装修华美，兼具中西建筑风格。与具有防御功能的开平碉楼相比，洛场村碉楼大部分有前庭后院，风格精致，具有更浓重的生活气息。

洛场村的碉楼大部分以楼主或楼主先辈的名字命名，如兰芳楼、绍庚楼、绍甲楼、起鹏楼、梓桥楼、梓球楼、营辉楼等；有的则以楼房的用途为名，如“彰柏家塾”“配芬家塾”“彰德阁”“修业学校”等。还有一些碉楼的名字，文雅端庄，如“雄庐”“若芙庐”“澄庐”“静观庐”“穗庐”等。后来，村民还为一些具有特色外观的碉楼起俗称，如“飞机楼”“坦克楼”“斑马楼”“火箭楼”“绿瓦面”等。

这些刻满时代烙印的碉楼，每一块青砖瓦片都写着故事，填满了她的年少时光。调皮的她常常跟着小伙伴们钻进碉楼里去探秘，缠着几位喜欢“讲古”的老人家讲洛场村的“威水”史。如工科举人江起鹏，曾在黄埔



花山小镇入口的彰柏家塾，由旅美华侨江彰柏出资兴建



静观庐

军校任教，并参与兴办广东省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美国第一位华裔州务卿余江月桂，曾五次蝉联加州州务卿，是美国上下公认的政坛最成功的女亚裔之一；曾在海外资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江绍庚等等。坐在村头古榕树下，老人家如数家珍，细数着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



重焕生机的华侨建筑

然而，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小村庄，终究也逃不过时代的大浪淘沙。随着原村民或迁移融入流光溢彩的城市生活，或出洋定居，村里人口减少，洛场村出现了空心化问题，碉楼和祖宅渐渐被荒置，年久失修，失去了曾经的光彩。

她的舅舅一家人也早已离开了洛场村。舅舅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需要更大的平台发展。于是，舅舅将家安在了繁华的都市，表弟妹们也相继出国留学去了。年少时的小伙伴们也离开了这片故土，各奔前程。这个曾经带给她无限快乐的小村庄，终究成为了她人生中的“回忆”。

洛场村重焕生机的转机出现在 2013 年。在美丽乡村政策的带动下，洛场村被改造成为集碉楼建筑、文化展馆、特色餐饮为一体的创意小镇，将文化特色资源与历史传统遗产、现代时尚生活消费跨界融合，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文艺打卡地，有了“花山小镇”的美誉。

“檐墙旧巢燕未回，小园桃红盼春雷；不堪往事成梦境！百年碉楼主是谁？”那些古朴的碉楼也被重新“激活”，向游客诉说着百年侨乡的起起落落。

其中，“飞机楼”最负盛名。“飞机楼”建于 1937 年，占地 234 平方米，主楼为三层半高，首层门口建有两根欧式门柱，碉楼外墙采用青砖为材料，阳台上还有做工精美



鹰扬堂

的壁画，因为俯瞰造型似一架飞机，故而得名。“飞机楼”最早的主人叫江梓桥，是洛场村一位读书人，其子江宝卓留学美国，曾在陈济棠主政时期的广东政府中任职，另一子江宝琨在美国开了“番衣店”，寄回不菲侨汇。据说江家请了全广东最好的设计师进行设计建造，整个建筑的造型在当时算是比较前卫的。

“鹰杨堂”是最有特色的一座——红青砖混用，仿佛穿了一件条纹衫。“鹰杨堂”又名自谦楼，楼主是美国华侨江自谦，民国时期回乡建成该楼。主楼坐西北朝东南，楼高三层半，最具创造性的是用大砂砖和青砖砌成条状墙体，窗边墙体则用两种砖砌交替竖砌，铺几层青砖，再铺几层大砂砖，整栋楼颜色层次分明。楼房的正面女儿墙上砌有拱形照壁，照壁上塑有一只栩栩如生的展翅欲飞的大鹰，照壁正面有灰塑竖写“鹰杨堂”三字，两侧写有“江林记造”和“江河平作”，整个楼房颇有欧洲建筑的味道。

在这些碉楼群里，建筑时间比较早的是美国华侨江瑞莲所建的“瑞莲楼”。全楼约高五层，被时光腐蚀得斑斑驳驳的青砖墙壁上布满了累累的弹洞。根据当地村民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曾经驻扎在这座建筑当中。当时“瑞莲楼”遭受到来自日军的猛烈攻击，墙身因此而弹痕累累。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队又曾经攻打过“瑞莲楼”，也是久攻不下，后来只好放火烧楼，但是大火同样没有办法摧毁它。“瑞莲楼”的坚固从此出了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还曾经被当作监狱使用。

为了盘活这些老碉楼，花都区通过政府引导、企业投资的方式，在对旧碉楼修复和保护的基础上，借助社会力量对洛场村进行活化，一方面联系身在国外的碉楼业主获得委托权，一方面与文化产业公司合作，由租赁方承担碉楼的维护费用，并向业主支付租金。位于花山小镇入口的彰柏家塾，过去是乡村里为宗族子弟进行启蒙教育的学馆，经过修缮、改造成为了艺霖坊，展示陶器、花艺、香道，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华侨江悦远回乡建成的中西合璧建筑静观庐，引进了企业，让空置已久的楼房多了生气；一座名为津仁楼的碉楼，20 世纪 50 年代楼主去美国后一直没回来，曾被用作香烛加工厂，10 多年前开始闲置，这次引入了一家以意大利菜为主打的西餐厅，给这座老房子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的东华村，经



改造后的花山小镇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打卡地

常到洛场村的碉楼来玩，以前这里还是知青点。出国前，碉楼就已经比较破败了。这次回国看到这里被改造得这么好，实在太漂亮了。看到家乡变得这么美，我都想回来。”在美国从事餐饮业四十余载的华侨江显端，在耄耋之年再次来到这片故土，看到它的华丽转变感慨良多。

洛场村还是一片具有红色传统的革命热土。1950—1955 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花县（花都的前身）人民政府从花城迁往洛场村一座华侨建筑里办公。花县人民政府在洛场村的 5 年，是破旧立新的 5 年，是花县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5 年。花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这座华侨建筑中，领导花县人民先后开展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为花县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座既有古韵又有红色基因的花山小镇，如今正融合着现代创意，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村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近年来，花山小镇还陆续收获了“广州十大乡村旅游示范点”“珠三角最美乡村”等荣誉，是花都文化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2019 年 12 月，花山小镇被认定为“中国华侨文化国际交流基地”，成为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向世界讲述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

侨韵悠悠满大江

文 《华夏》记者 子言

台山，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悠悠侨韵，还有那如诗般的田园风光。

这片3286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每一寸都有侨的痕迹。“处处是侨，业业必侨，人人有侨”，华侨、侨眷、侨资在台山社会生活中居重要的地位。虽然昔日台山洋楼街的十里繁华早已随岁月的侵蚀而消逝，但那些散落于各个村落之间的融合了西方建筑风格的侨房、侨校、侨圩，依旧证明着“侨”的因子在这座县城已深入骨髓。

台山正式建县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定名为新宁县。后因湖南、广西、四川等省都有“新宁”县，为避免混淆，于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台山县”。台山濒临南海，历史上便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这也为台山人出洋提供了便利条件。二百多年来，台山人前赴后继，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谋生。目前，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台山人及其后裔，因而有“内外两个台山”之美誉。

大江镇位于台山最北端，是台山的北大门，户籍人口4万多，旅外华侨、港澳同胞却有8万多人。20世纪初，伴随着贯通城乡的新宁铁路通车，这个小镇刮起了一阵“西洋风”，一座座充满中西风情的侨房如雨后春笋般伫立于乡间里巷。这些侨房的用材十分“国际化”，有英国的“红毛泥”、德国的钢铁、西洋花纹地砖、意大利进口彩色玻璃，时新花样、工艺精巧，都是先侨从太平洋彼岸带回来的。

当时声名鹊起的公益埠开办的契机就是新宁铁路的修筑。公益埠所坐落的地方是斗洞堡，此乡村地处潭江边，与新会、开平两县相邻，三面环水，交通便利。公益埠的创办人之一伍于政是斗洞堡沙冲村归侨，他年轻时曾游历欧美，“尽见崇楼峻宇，广道通衢乃是历经艰苦开发才有的繁荣世界”。他还曾在开平水口圩经过商，因而懂得土地要经过开发和进行商业经营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其价值。同时，他游说旅美回乡筹建新宁铁路的陈宜禧在公益埠所在地附近设立车站，使得公益埠更具交通优势。1905年，伍于政联合附近乡绅成立埠董局，筹划建埠开发事宜。公益埠的倡建和主要出资者均为旅美华侨，所以其设计按照美国纽约的城市布局规划。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在旅美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公益埠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占地0.33平方公里的小村落建起来了。这一新埠原名宁海埠，后因取意“公共得益”而改名为公益埠。商埠以9条笔直的骑楼街纵横贯









① 1909 年 6 月，新宁铁路斗山至公益埠段开通运营，公益埠开幕日场景
② 新宁铁路公益埠站遭日军机轰炸
③ 大江镇对公益埠进行活化更新
④ 位于公益埠的越华中学建于 1939 年，教学楼原是伍氏胥山纪念堂，其见证了当年江会日寇投降的历史

通全埠，整体呈繁体“無”字形，街道两旁建筑涵盖骑楼商铺、教堂、学校、医院等类别。这是当时的美国归侨按照纽约的城市布局规划而建，因此被称为“纽约街”。随着新宁铁路第一期工程斗山至公益通车，公益埠的水陆交通更加便利，货流、人流汇聚，使得公益埠一跃成为台山仅次于台城的第二大城镇。这吸引了大批华侨和外地富绅落户投资，纷纷在这里投资建立金铺银号、药材铺、照相铺，掀起了建设热潮，曾开设商店 500 余号，盛极一时，有“小广州”的美誉。在众街道中，数苏杭街、中兴街与中环街尤为有名。

直到新宁铁路干线全线通车，公益埠再次迎来发展新高潮。1933 年大文豪巴金到广东，坐过一次新宁铁路到公益埠访友，在他的散文《机器的诗》中如此描述：“这是新宁铁路上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这里没有桥，火车驶上了轮船，就停留在船上，让轮船载着它慢慢地渡过江去。”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宁铁路设施及高度繁荣的公益埠成了敌机狂轰滥炸的重点之一。从此，繁盛的



大江镇锦龙村的田园风光

公益埠因遭受重创而日渐衰落。尽管其后进行过恢复建设，公益埠却仍未能重回抗战前的辉煌。此后，公益埠更是随着岁月的打磨，日渐凋零，昔日辉煌已成过眼烟云，徒留下一栋栋空置的洋楼。

2018 年，为重塑城圩历史价值，大江镇政府按照“修旧如旧，改造提升”的原则，对公益埠进行活化更新。旧城改造工程分两期实施，目前已修复了上海街、新上海街和沿江路为示范街，重点打造榕树公园、越华中学、渡口广场等节点，当年的繁盛隐约可见。

离开正在重新“激活”的公益埠，前往大江镇的锦龙村——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雷洁琼先生的故乡。与大兴土木建有大量西洋风情骑楼的公益埠不一样，锦龙村一派岭南田园风。田间稻浪滚滚，正是青黄相接时，惹人沉醉，正如巴金在《机器的诗》中所描述的：“南国的风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显出一种梦景般的美：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那一块一块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楼。南国的乡村，虽然里面包含了不少的痛苦，但是表面上它们还是很平静，很美丽的！”

一口池塘，一树古榕，守护着这个小村庄的宁静。古榕对着的正是雷洁琼祖居，边上坐落的是为纪念她而建的同心苑。雷洁琼出生于华侨之家，从小受到新思想文化的熏陶。1924 年赴美国留学，1931 年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雷



雷洁琼


雷洁琼祖居

洁琼祖居和同心苑里收藏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和实物资料，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雷洁琼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光辉人生：从一名追求真理的青年，雷洁琼成长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国共产党的挚友、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杰出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将一腔热忱投身国家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多党合作事业鞠躬尽瘁。雷洁琼先生经历了 106 载岁月沧桑，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她将个人的理想、价值、幸福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斯人已逝，但她却为故乡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

悠悠侨韵，拳拳赤子心。近年来，大江镇深耕华侨历史文化，依托雷洁琼祖居、同心苑等阵地，用好用活侨界红色资源，促进侨务资源与文化交流、乡村振兴、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充分融合，打造出来华侨历史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精品小镇，搭建起台山与世界交流新的桥梁和纽带，讲好中国故事、华侨故事、台山故事。

冯如故里

文 梁健生（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在源远流长的锦江河畔，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风景秀丽，依山傍水，令许多旅客流连忘返，这里是“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的故里——牛江镇，是广东著名侨乡。牛江镇位于广东省恩平市东北部，总人口 2.4 万人，却有 3.5 万旅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分布在委内瑞拉、巴拿马、古巴、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西等 20 多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牛江镇汇聚灵气，英才辈出，除了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以外，还有工程院院士、惯性技术领域著名专家冯培德，还有吴年乐、冯雪茂、方寿林、冯根存等杰出侨领，也有像“恩平第一楼”炯成楼、县委旧址（郑锦波故居）红色基地等一批著名历史建筑。

中国航空之父

冯如，原名冯九如，字鼎三，号树垣，于 1884 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冯如的父亲冯业伦是一个朴实忠厚的庄稼人，靠耕耘一块土地养家糊口。冯如自小聪明伶俐，从小喜欢制作风筝和车船等玩具，对神话故事尤其是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父亲送他到乡村小学念书，由于他成绩出众，深受老师的喜爱。冯如在左邻右舍的呵护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然而由于无钱求医，冯如的四个哥哥相继病逝，冯如也因家中贫困，只好中途辍学，帮助父亲务农。

12 岁那年，一个亲戚的出现，改变了冯如的人生轨迹。当年有一个在美国打工的舅舅，回到家乡提出要带冯如去美国，目的就是赚钱谋生。得到父母同意之后，冯如随亲戚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在目睹了美国先进工业之后，认为国家富强须依靠工业发达，从此立志学习机械，报效祖国。冯如先在纽约工厂当学徒和工人，晚上自学制造机器的知识；后回三藩市招徒设厂制造机器，开始收集研制飞机的资料。在美国，冯如发誓“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立下了“航空救国”的大志。

1908 年，冯如在三藩市附近的奥克兰市与人合伙集资设立广东制造机器厂，制造飞机。1909 年 9 月 21 日，冯如制成了第一架飞机，在奥克兰飞上蓝天，试飞基本成功。1910 年，冯如先后研制修改飞机 6 次，未获成功，又遭受厂房失火挫折，但他并不灰心，继续奋进。1911 年 1 月，冯如制成第二架飞机，在奥克兰试飞成功，后又连续在奥克兰附近的海湾进行了多次成功飞行，飞机性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1911 年 1 月下旬，广东制造机器公司更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冯如谢绝

美国多方高薪聘任，并决定将机械迁回广州，与 3 名助手携带设备乘船回国致力发展祖国航空事业。接着，冯如亲自驾驶飞机作实验性试飞，因机件锈蚀，刚起飞就坠毁了，所幸冯如无大碍。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倒台。1911 年 11 月 17 日，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冯如率助手参加革命，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随即在广州燕塘建立广东飞行器公司，开始制造飞机。1912 年 8 月 25 日，冯如在燕塘表演时飞行不幸失事，机毁人伤，不治殉难，时年 29 岁。

冯如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临时大总统追认冯如为少将。孙中山称冯如是中国始创飞行家。广东军政府陆军司下令按陆军少将阵亡例拨款抚恤其家属，并将事实宣付国史馆，以教育后人，流芳百世。

冯如故居

冯如故居在广东省恩平市牛江镇杏圃村。故居建于清代，硬山顶建筑，山墙外皮为青砖砌筑，内墙为泥砖垒筑，俗称“金包银”结构，建筑面积 52 平方米。整个故居以大厅为中轴线，西侧布以寝室和厨房，这种建筑模式俗称为“龙船脊”。1984 年 7 月，恩平县政府拨款将冯如的故居按原貌进行修缮，并把冯如故居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 6 月，恩平市人民政府再次拨款将冯如故居按原貌重修。

沿着冯如故居的巷道往上行，有一座冯如后裔于 1989 年 5 月新建的冯如纪念楼，楼高 6 层。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亲笔题书“冯如纪念楼”，楼内有冯如的历史图片、文献和实物等陈列品。

距离冯如故居不远处就是冯如文史馆。该



冯如纪念馆陈列的冯如铜像

馆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纪念冯如飞天 102 周年之际落成剪彩，是利用杏圃村的冯氏宗祠原址改建而成的。馆内陈列着由冯如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建造的冯如铜像、“冯如一号”和“冯如二号”飞机模型，还展出了关于冯如生平、中国航空航天发展史等一系列珍贵的文史资料图片，是当地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诸葛八卦名村

牛江镇莲塘村是诸葛八卦名村。据莲塘村老人介绍，莲塘村居住的都是冯氏家族，冯氏先祖于明成化七年（1471 年）从相邻的仕洞村迁入此地开枝立村时，原来不会诸葛八卦布局的，只是该村随意的房屋建筑，却暗合了诸葛九宫八卦阵。后来，莲塘村成为真正的诸葛八卦，却是一种机缘巧合。

从宋开宝元年（968 年）起，莲塘村是南恩州（现阳江、恩平等地）辖内的一个驿站，是官府文书陆路南来北往肇庆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的必经之路，又是官府官员上任、卸任、探亲途中休息之处，还是历朝历代官员被贬岭南歇脚的地方。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 年），被贬广东徐闻典史的明朝进士、大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1616 年），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冯如故里恩平牛江镇

回江西临川老家途中留宿莲塘村。这行程是汤显祖人生最失意时的一段历程，在此却受到莲塘驿站小官员的盛情接待，心中很是安慰，有一种居家的温暖感觉。晚上，汤显祖在驿站宿舍作了“恩春少佳树，向北梅花夕；入门问小吏，知是莲塘驿；莲叶落已久，林塘映非昔……”的《南恩道中》这首诗后，为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就随着驿站小吏到他在莲塘村的家访问到深夜。汤显祖进村时由于有人陪同没有感觉到莲塘村的异样，当他一个人出来回宿舍时，只见村巷错落有致，宽窄无常，大小不一，或迴龙九曲状，或状如迷宫，或是死胡同。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知道进入了诸葛九宫八卦阵。原来，汤显祖除了在戏曲、文学等方面甚有成就外，对诸葛九宫八卦阵的研究也甚有心得，所以晓得这是诸葛八卦阵。汤显祖了解到莲塘村房屋随意建筑却暗合诸葛八卦后，也来了兴致，主动提出为莲塘村进行修改完善，一来是报答在驿站莲塘村受到的盛情接待，二来也是借这个机会检验自己对诸葛八卦的研究成果，因此特意在莲塘村多待一段时间。此期间，他把莲塘村天然暗合诸葛八卦阵未完善之处作了调整，以莲塘村中村的六屋村开程巷为中心，向四周呈现不规则的放射状，村中所有的房屋、巷道、水沟，几眼水井和村周围天然生成“三凹三凸三沙三水”的地理环境纳入九宫八卦阵，按“坎、震、巽、离、坤、兑、乾、艮”进行设计布局。从此，莲塘村的诸葛九宫八卦阵形成了一种“霸气”，隐隐然带有慑人的气势。400 多年过去了，莲塘村的诸葛九宫八卦阵慑人气势不减，该村大闸还暗藏着汤显祖设计的“九板十踏”玄机。据了解，一直以来，外人到莲塘村探亲访友就是走进了诸葛九宫八卦阵，经常是辨不明方向找不着路口，整天也是窝在莲塘村走不出来。

恩平“第一楼”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匪患猖獗，不少旅外华侨创业成功后，不忘故里，回到家乡兴建楼房。赤子的善举，既改善

了乡亲居住环境，又可抵御盗匪，保一方安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恩平地区最豪华的建筑——炯成楼，号称恩平“第一楼”。

炯成楼又名子昌楼，坐落在有着 778 年历史的仕洞村，是由马来亚华侨冯安相出资建造，并以其父名字命名。该楼雄伟壮观，气势不凡，高高耸立村中，登临高楼，南望良田万顷，西眺青山连绵，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出身贫寒的冯安相生于 1897 年，1906 年往马来亚投靠叔父冯合成，参与开发当地锡矿，后来成为南洋矿业巨子。1934 年，冯安相衣锦还乡，委托冯道存、李逢光等建造炯成楼。1945 年 7 月 25 日，过境恩平的日寇无恶不作，其中一队日寇 10 多人，拉来一门小钢炮，围攻炯成楼。几位村民坚守楼内，以暗堡枪眼奋力抵抗，击退了日寇。至今大楼檐底和铁门，仍留有累累弹痕。

2003 年 7 月 15 日，恩平市人民政府公布炯成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 6 月，炯成楼被列入《广东省恩平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巾帼革命夫人村

牛江镇马龙塘侨村历史悠久，该村东牌楼上书写的“马奔千里，龙腾九州”一联，体现了村里人纵横四海的豪情与大志。马龙塘至今有 280 余年历史，已繁衍 12 代。全村总人口 570 人，海外侨居 300 多人。早在百年前就有人出洋打工，现散布于委内瑞拉、美国、哥斯达黎加、墨西哥、荷兰、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古巴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村中每户几乎都有人在海外谋生，乡人中侨眷（包括港澳台同胞眷属）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素有恩平侨乡重点侨村之称。马龙塘村是革命老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涌现了冯华善等 3 位烈士和吴有恒夫人、郑锦波夫人、吴枫夫人和徐云夫人等 4 位支持丈夫投身革命斗争的巾帼夫人，因此被称为巾帼革命夫人村。



牛江镇举办濑粉节


牛江镇濑粉飘香

2018 年 4 月，马龙塘村成功创建为“广东侨界人文社区（示范点）”。素来享有“恩平粮仓”之美誉的马龙塘侨村，2016 年被评为恩平市十大美丽乡村之一，是广东省卫生村、江门市生态村、恩平市文明村。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牛江镇以弘扬冯如精神为亮点，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景点升级改造，全力打造精品旅游路线，2019 年成功申创为全中国第七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广东省侨联纪事

文 林辅毫

9月 SEPTEMBER

9月2日　颜珂书记、黎静主席在机关会见广州市侨联主席卞勇一行，并进行座谈交流。

9月3日至10日　黎静主席率省政协海外列席侨胞考察团赴西藏考察。

9月5日至7日　颜珂书记赴北京参加全国台联系统贯彻落实“两个意见”培训班暨2021年全国台联第二次专兼职会长（扩大）会议。

9月10日　省侨联组织开展2021年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专题辅导，邀请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家瑞授课。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戴文威、谢惠蓉、邵瑾，二级巡视员、机关纪委书记庄有林，二级巡视员林克风，以及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活动。

9月10日　颜珂书记、邵瑾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委内瑞拉委中贸易商会会长陈伟嶙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9月11日　黎静主席赴浙江衢州出席由知名侨企侨爱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浙西骨科医院奠基仪式。

9月14日　颜珂书记、邵瑾副主席率调研组在广州调研侨联工作。

9月15日　颜珂书记、黎静主席在机关会见由禅武国际联盟总会主席王德庆率领的访问团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邵瑾副主席、林克风二级巡视员等参加座谈。

9月15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东分会场出席2021年全国侨联公益工作交流会议。

9月15日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三巡回指导组组长孙小华带队到省侨联检查指导工作，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党组成员、副主席戴文威向巡回指导组汇报了省侨联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9月22日　省侨联十一届二次全委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主席黎静，副主席戴文威、谢惠蓉、邵瑾、陈越华、林永新、林春晖、钟仰进、郭泽伟、梁瑞冰、

廖志仁和省侨联常委、委员等200多人出席会议。省委宣讲团成员、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郭跃文，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家瑞到会指导。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和中国侨联十届七次常委会议精神，聆听郭跃文同志所作的专题宣讲辅导，听取和审议黎静代表省侨联十一届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增补颜珂同志为省侨联副主席。

9月23日　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由省致公党轮值主办的2021年第三季度省“五侨”联席会议。

9月23日至27日　颜珂书记赴北京参加全国台联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及到中国侨联汇报工作。

9月27日至28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惠州出席全省第三期“侨爱南粤·法治沙龙”暨民法典宣讲活动并讲话。

9月29日　颜珂书记在广州参加粤黔统一战线东西部协作对接工作座谈会。

9月29日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第十三组组长孙小华带队到广州市荔湾区就省侨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行调研。戴文威副主席参加调研活动。

9月30日　戴文威副主席出席省侨联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并讲话。

9月30日　邵瑾副主席参加广州市公祭烈士活动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10月 OCTOBER

10月10日　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侨批舞剧《侨批·家国》首演活动。

10月10日至12日　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部长、中国侨联法顾委秘书长张岩率调研组到茂名、江门，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和“检侨之家”建设工作调研。颜珂书记在广州会见调研组一行，谢惠蓉副主席全程参加调研活动。

10月10日至12日　颜珂书记、邵瑾副主席赴中山、珠海调研侨联工作。

10月11日至15日　全省侨联系统第三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中山举行，来自全省侨联系统基层党组织书记及省侨联机关党员干部160多人参加培训。颜珂书记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和授课；戴文威副主席主持开班仪式和出席结业仪式并讲话；副主席邵瑾，二级巡视员庄有林、曹堪宏、林克风出席开班仪式。期间，邀请省委宣讲团成员、侨史专家学者、省直机关工委有关领导进行专题授课辅导，组织全体学员到孙中山故居、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中山市改革开放史教育基地等开展现场教学。

10月11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出席广东省各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并发言。

10 月 12 日　黎静主席、林克风二级巡视员在中山开展侨联工作调研。

10 月 13 日　邵瑾副主席赴佛山实地考察“南粤侨创基地”。

10 月 16 日　邵瑾副主席赴惠州出席“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专题研讨会暨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议并讲话。

10 月 18 日　省委第五巡视组巡视省侨联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会前，省委第五巡视组组长范先军主持召开与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主席黎静见面沟通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要求，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范先军作了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颜珂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省委第五巡视组副组长及有关同志，省侨联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侨联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副处以上干部，机关纪委委员，组织人事部干部列席会议。

10 月 18 日　颜珂书记、黎静主席等在机关会见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嘉淳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0 月 19 日　颜珂书记赴东莞出席“两岸婚姻家庭活动”开幕式。

10 月 19 日至 22 日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率调研组到湛江，举办“中国侨联特聘专家走基层•肿瘤筛查义诊活动”并开展工作调研。颜珂书记参加调研活动。

10 月 21 日至 22 日　邵瑾副主席赴惠州、深圳实地考察“南粤侨创基地”。

10 月 21 日至 24 日　黎静主席赴汕头、揭阳市调研侨联工作，并出席潮汕“星河奖”“星河辉勇师表奖”等颁奖活动。

10 月 23 日至 27 日　颜珂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在广东考察活动。

10 月 25 日　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贺党百年诞　共聚台山情”暨广州市台山商会 2021 年会员联欢晚会。

10 月 27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分管领导主持召开的分管部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分析研判会。

10 月 27 日至 29 日　全省第三期基层侨联干部培训班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举办，来自全省县（区）以下基层侨联干部、涉侨社团组织骨干、“侨胞之家”负责同志近 80 人参加。谢惠蓉副主席出席开班仪式、结业仪式并讲话。

10 月 28 日　戴文威副主席赴中山出席“菁英杯”2021 年国际侨界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评委工作会议。

10 月 28 日　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出席广东国际华商会四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并讲话，省侨联兼职副主席、广东国际华商会会长郭泽伟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华夏》杂志创刊于 1985 年，为双月刊，由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华夏》站在东西方文明的高地上看世界、看中国、看广东，围绕“拥抱世界的港湾，连接天下的彩虹”的办刊宗旨，以“侨”为中心坐标与纽带桥梁，藉由“侨”的眼界和语境，以“人文”为主线，承载家国情怀、弘扬中华文化、记录侨海风云以及探索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40-148 号省侨联大厦 6 楼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牢记嘱托担当使命　做好新时代“侨”文章

文 林辅毫

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时，要求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加强海外华侨工作，引导和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继续参与投资兴业、发挥双向开放作用寄予厚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既是对侨的关心、肯定，也是对侨的要求和动员，是汇聚侨界爱国爱乡力量的集结号，是引领侨界投身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令，也是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牢记嘱咐，不负重托。一年来，在广东省委坚强领导和中国侨联有力指导下，广东省侨联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省委工作部署要求一体把握、整体落实，不断推动新时代广东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侨”的文章。

举办汕头峰会，引导侨界在粤投资兴业、助力双向开放

广东省侨联联合中国侨联、汕头市委市政府在汕头举办“创业中华·‘十四五’中国发展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助力更高水平开放发展。峰会吸引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侨领、侨界企业家、创新创业人士、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和双创联盟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促成中国侨商联合会与“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基地”——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汕头投资环境推介、创新创业项目路演等活动，推进汕头高质量发展。通过此次峰会，进一步凝聚侨心侨力侨智，激发了广大侨胞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建功立业的新热情。

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搭建侨创基地，服务侨界创新创业。广东省侨联推动成立“南粤侨创会”，在全省共建 36 个“南粤侨创基地”，举办“南粤侨创基地”现场推进会、“侨创南粤杯”第四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指导举办第二届“龙湖杯”全球潮人工业设计大赛等活动，筑巢引凤打造创新创业人才高地。汕头市侨联成立侨界博士发展促进会，进一步团结联系服务侨界高端人才。搭建引才引智平台，服务海归人才来粤发展。深圳市侨联参与组织举办第九届中国（深圳）海归创

业大会，支持举办第 10 期海归人才专场招聘会，100 多家知名企业提供近 1500 个岗位，超 5000 名海归人才参加，助力海归人才落地深圳发展。江门市侨联组织市留联会举办多场项目对接会、分享会，帮助海创企业对接金融资本，推动促成了 9 名留学归国人员和高层次人才申领国家级人才奖励计划。搭建线上线下双“侨路”，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举办 2 期“海外华商南粤行”活动，邀请组织 200 名在粤杰出华商和青年华商到清远、中山市考察交流，促成合同总投资额约 55 亿元的 3 个高科技项目落地两市，推进广州软件学院在清远建设分校区。指导举办“第七届华人华侨产业云交易会”，新建刚果（金）、越南等 5 家海外采销中心，共计 1600 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展，吸引 3 万多海内外观众线上观展，页面浏览量达到 13 万次。

拓展海外联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广东省侨联及时调整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海外联谊工作方式方法，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断扩大“朋友圈”，目前省侨联已与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个社团建立了联系。在线上，将省侨联海外顾问、海外委员按五大洲分片建立了微信群，实行洲长负责制，及时向他们推送各类宣传信息，加强了日常联谊联络，维护并增进了感情。通过海外侨领以点带面，加强了与当地重点侨团的联系，畅通了沟通渠道，提高了沟通时效。在线下，举办“第十二期海外社团负责人研讨班”“2020 港澳及海外青年侨领研习班”等系列活动，组织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多名在粤侨领参加，提升侨团青年负责人领导力。团结引导海外侨胞旗帜鲜明反独促统。结合组织海外侨胞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和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直播盛况，坚持以侨为桥，通过“岛外”促“岛内”，进一步团结台胞、传统侨团和台胞青年，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引导支持广大侨胞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多做工作，壮大爱国统一力量，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团结引导港澳侨界携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结合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推进“双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强与港澳侨界社团联络联谊，鼓励支持省侨联港澳荣誉主席、顾问、委员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领港澳同胞自觉投身国家发展大局，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感。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广东省侨联研究制定《广东省侨联贯彻落实〈中国侨联关于加强新时代侨联信息传播工作的意见〉的实施办法》，以“侨刊、侨网、侨微”三大平台为基础拓展侨界媒体宣传阵地，深化与国内主流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合作，发挥海内外侨胞作用，引导侨界向海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广东故事、讲好大湾区故事。弘扬中华文化。举办 9 期“亲情中华 • 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活动，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吸引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入营，“云上”品读中国，延续中华文化传承。汕头市侨联编辑出版《潮汕华侨文化》《汕头华侨志》，进一步传承侨乡文化，展现侨乡文化魅力。打造侨界文

深圳市侨联组织举办“侨心向党·同心逐梦”文艺演出活动，引导侨界听党话、跟党走，画好侨界团结最大同心圆。

化交流基地。指导推动汕头侨批文物馆等 8 家单位成功入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牵头组织或协助组织海外侨胞参观全省 23 个文化交流基地，以及开展书画展、文化演出等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上千场次。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广东省侨联组织拍摄《百年粤侨赤子心》宣传片，广州市侨联组织拍摄《赤子丹心筑红图》专题片，汕头市侨联组织拍摄《赤子心·侨胞情》专题片，展现侨胞爱国爱乡爱自己家人的情怀，进一步团结凝聚侨界人心。深圳市侨联组织举办“侨心向党·同心逐梦”文艺演出活动，引导侨界听党话、跟党走，画好侨界团结最大同心圆。

深化改革创新，建设温暖、和谐、可依靠的“侨胞之家”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广东省侨联深化“党建带侨建”，推动各地市新建立侨联组织近 50 个（其中新成立的广州大学华软学院侨联是全国首个民办高校侨联组织），目前全省共有各级侨联组织 8000 多个。深化“侨胞之家”建设。推动各地市侨联新建“侨胞之家”近 60 个，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全省首个高校侨联“侨胞之家”，目前全省共有“侨胞之家”1783 个。探索打造“网上侨胞之家”。结合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广州市荔湾区侨联打造“为侨服务·一呼必应”数字化综合服务系统，汕头市侨联建立“网上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江门市侨联建设涉侨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平台，积极构建数字化涉侨服务模式，努力为海内外侨胞提供全天候、零跑腿、一网通办的云服务。助力海外侨胞抗疫。开展“情系南粤·暖心携手抗疫”活动，向 7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侨胞、130 多个侨团捐赠 11200 份“侨爱心防疫包”，筹集物资支持印度、阿根廷等国家抗疫。扎实做好侨界帮扶工作。开展 2021 年春节“侨爱南粤·新春送暖”活动，安排慰问金 100 多万元，直接受益侨界群众 1000 多户。认真做好华侨事业费发放工作，共向 830 多名困难归侨发放救助金 250 多万元、向 380 名困难归侨子女发放助学金近 130 万元、向 4300 多名困难归侨发放临时救助金近 1200 万元。汕头市侨联从 2021 年起将每年向全市 70 周岁以上的归侨和低保归侨发放慰问金，进一步关心关爱困难侨界群众。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广东省侨联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不断开创广东侨联工作新局面，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侨界新贡献。

“为侨服务·一呼必应”

文 墨池

近年来，广东省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群团改革、侨联改革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国侨联工作要求，推进侨联信息化建设，引导基层侨联组织建设“网上侨联”，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高效联系服务侨界群众，在推动基层侨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上发挥了应有作用。广东省侨联以广州市荔湾区为试点，聚焦“为侨服务”新要求，以“互联网+服务”思维，依托该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平台，打造新型“网上侨胞之家”。

2021年3月23日，荔湾区“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正式向海内外侨界人士提供服务，成为广东第一个实现为侨服务数字化的基层侨联。

借力网络平台优势，开通为侨服务“云平台”

该系统以“为侨服务·一呼必应”二维码作为数据输入前端，广大侨胞和侨界企业只需微信扫码登陆，输入基本信息即可点击报到或者进入事项办理。目前为个人提供涉侨事项办理、政策咨询、帮扶救助、法律援助、纠纷调解、海外寻亲等6大类服务，为企业提供商事登记、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3大类服务。其中部分事项直接连接粤省事和网办大厅对应事项在线办理，其余部分办事



“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界面

诉求通过平台回到区侨联进行处置回应。涉及荔湾区侨联工作范围内的，区侨联自行联系回复；涉及相关部门的政策解答等事项，区侨联提交区综合指挥调度平台转交相关部门答复，实现“呼”和“应”的对接。将现有数据“搬”上系统，将服务渠道“汇”入系统，通过服务系统联系、引导和服务侨界群众，构建信息桥，为侨界群众提供全天候、零跑腿、一网通办的云服务。

构建“1+2+3+5+N”新模式，提升为侨服务能力和水平

涉侨服务管理涉及的项目很多，要想让侨界群众和涉侨企业更好地享受数字服务的便利，让基层侨联更方便地了解和管理侨界事务，为侨数字服务系统就要是小系统，实现大服务。在实际建设中，按照“1+2+3+5+N”的思路构建数字化涉侨服务管理系统。“1”是建立一个“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2”是以涉侨数据采集和为侨数字服务为主要目的；“3”建设相互衔接的前端输入、中端处置、末端管控的三个服务模块；“5”为包括华人、华侨、归侨、侨眷、留学归国人员等五类服务对象；“N”是提供涉侨法律咨询、申请帮扶救助、企业商事登记等多项服务功能，将政务服务、司法服务、海外信访服务等服务事项统一整合到为侨服务中来。

“足不出户办侨事”，为侨服务显成效

“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的建立使用，有效破解了基层侨联工作长期难题和薄弱环节，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海内外侨胞的“有效覆盖”。

该系统解决了荔湾区侨联与侨界群众缺乏互联网联系的渠道问题，能让群众简便快捷地找到侨联组织。2021 年疫情期间，1 名美籍华人由于疫情导致无法回国办理房屋继承，后来通过微信朋友圈扫码登录平台诉求帮助，该区侨联收到诉求后，第一时间通过平台转发区住房建设局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并在后续处理过程中实时把进度公布在“进度查询”上。事后该华人感慨说，登录平台办理事务比在国内自己办理事务还方便，解决了海外华人华侨办理国内事务的大难题。特别是在目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荔湾区侨联通过该系统可以发布定点短信，及时告知辖区内侨界群众疫情防控最新消息；荔湾区内的侨界群众、侨资企业通过该系统寻呼求助，“足不出户办侨事”。如不少在国内居住的海外侨胞通过平台咨询打疫苗的事项，荔湾区侨联直接在平台上给予解答，同时通过系统给数据库里的侨胞推送相关资讯，侨胞们都说侨联推送的不光是“及时雨”，更是党的温暖。

该系统还解决了涉侨基础数据的缺失问题，避免了因人员调整、机构改革或场地搬迁等原因而造成数据的丢失，通过逐步的采录归集，不断丰富基础数据，实现区—侨联—街道三级共享，为侨服务更精准、更有效：一方面在数据库已有的辖区内家庭成员信息、经贸企业信息，直接过滤导入涉侨人员信息和侨资企业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加网格员拉网式入户宣传派送、省市区三级侨联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发布、多种媒体手段推送等方式，大力宣传鼓励侨界人士和企业登录使用“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到广州市荔湾区现场调研，充分肯定“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

不断丰富涉侨工作电子数据库。通过构建“涉侨数字图层”和“涉侨数字库”，对目前上图的 4811 名侨界群众和 77 家涉侨企业实现系统化、联动化、动态化管理模式，运用网络和信息化手段为做好新时代侨联工作提供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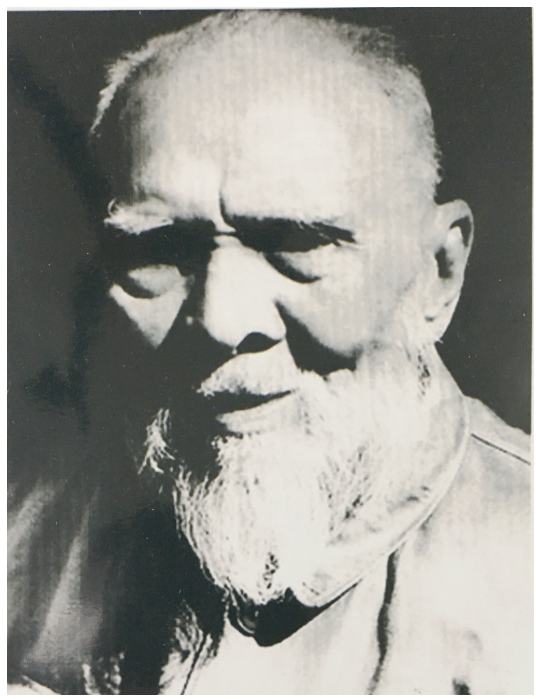
“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启动以来，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副主席程学源等领导先后到广州市荔湾区现场调研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系统信息化程度高、涵括的内容丰富，不仅让侨界群众找到了侨联组织和政府，还解决了侨界群众的日常诉求，同时完成了对侨数据掌握、侨情了解，并能把为侨服务纳入社区建设、社会治理的大范畴，作用明显，示范意义重大。

在传统沟通模式中，无论是电话、邮箱还是微信，都存在信息不及时、沟通不顺畅、渠道不完善等问题。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远程沟通交流变得更加迫切，众多海外侨胞、留学归国人员反馈“找不到组织”“归家难”。通过该系统，现在他们只需要一扫码即入库，一点击即“回家”，让“回家”变得不再遥远，实现海内外侨胞联谊联络“无界限”。数字化为侨服务还可以做到足不出户“点”，随时随地“查”，妥善解决了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在涉侨纠纷、帮扶救助中出现的跑动多，见面繁，后续跟进不及时的情况。平台的数字化管理还可以实现“精准通知”，通过数字地图上的可视化数据，群发问候短信或推送信息资讯，进一步畅通涉侨企业和涉侨群众互动渠道，增强侨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的爷爷司徒美堂

口述 司徒月桂　　整理 梁小恩

我的爷爷司徒美堂是著名的爱国侨领，祖籍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中股村委会牛路村。他 12 岁赴美谋生，81 岁离美回国，在美国生活了 60 多年。爷爷虽然身处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但他一生追求真理，心系祖国，无论是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爷爷都积极参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邀请爷爷出席开国大典。爷爷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扶柩，遗体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对爷爷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司徒美堂

一腔热血护祖国

1880 年 3 月，爷爷只有 12 岁。为了谋生，他只身搭乘“卡力”号轮船，背井离乡，远赴美国。初到美国，社会上掀起了强大的“排华”逆流，华人备受歧视，被骂作“黄猪”，经常遭到美国流氓欺负。备受欺凌的经历，给爷爷以极大的刺激，也让爷爷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海外华侨就算再有钱，如果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一样毫无地位可言。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爷爷虽身在海外，却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7 岁时，爷爷加入洪门致公堂。1904 年，爷爷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1905 年，爷爷在美国纽约组织维护华侨华人利益的安良堂。其后，安良堂分堂遍布美国东部各个城市，在团结华侨华人、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1 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四

爷爷眼眶湿润了，一生强悍的他从不轻易流泪，但当时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两双大手久久地握在一起，爷爷希望将自己以及海外华侨的无限深情都在这一瞬间传递给眼前这位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

个多月后，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以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国民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消息传至美国，年过半百的爷爷倍感振奋，立即组织洪门成立筹饷机构，为十九路军募捐。

淞沪会战结束后，爷爷亲自率领华侨代表万里跋涉，回到祖国，慰问十九路军将士。看到满目疮痍、硝烟未散的淞沪抗战现场，爷爷悲愤交加，誓与祖国同在，誓与日本鬼子抗战到底。

蔡廷锴将军闻知爷爷万里迢迢来到上海，早早迎候在军部门口，亲自打开车门搀扶爷爷下车。爷爷眼眶湿润了，一生强悍的他从不轻易流泪，但当时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两双大手久久地握在一起，爷爷希望将自己以及海外华侨的无限深情都在这一瞬间传递给眼前这位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

1932 年 5 月 16 日，十九路军军部召开了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爷爷代表美洲华侨敬献了花圈。这天，也是爷爷和蔡廷锴分别的日子。爷爷对蔡廷锴说：“日后如有难处可去美国，侨胞会热烈欢迎你的！”这句话是爷爷的肺腑之言。日后，爷爷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力主抗战的蔡廷锴后来因受蒋介石排挤，到美国避难。爷爷得知后，马上发动华侨欢迎。蔡廷锴成为在美国最受华侨欢迎的中国官员之一。蔡廷锴所到之处，都是爷爷亲自陪同、贴身保卫。当时有消息说，潜入美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已经收买杀手，准备刺杀蔡廷锴。因此，爷爷对蔡廷锴寸步不离，甚至愤怒地说：“谁要杀蔡将军，先杀我！”正是爷爷和广大华侨的保护，才保证了蔡廷锴美国之行的安全。

爷爷在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还会见过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每一次会面，彼此都惺惺相惜，为国家前途彻夜长谈，之后又成为志同道合的友人。

一位是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1936 年陶行知到美国、加拿大向华侨及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爷爷与陶行知在纽约相见相识。两人相见恨晚，遂成知己。爷爷邀陶行知下榻自己家里，“天天畅谈救国之道”。以后的许多年间，在陶行知多次危急时刻，都是爷爷鼎力相帮，助其脱离困境。另一位就是杨虎城。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逃亡到美国。当时已近古稀之年的爷爷带领众多华侨前往迎接，他要亲自感谢这位为了消除内战一致抗日而牺牲自己政治前途的将军。他把杨虎城接到自己的寓所，设宴招待。宴席上，爷爷不顾年迈，举杯向杨虎城致敬。两人的这次会面，使爷爷对国内的政治局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此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保护杨虎城的安全，爷爷不仅

安排致公堂兄弟贴身跟随保护，并亲自送杨虎城上船离开美国才放心。

奔走呼号为抗日筹款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刚传到美国，纽约华侨马上成立救国团体——救济总委员会。爷爷是19位执委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该组织的任务是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监督和协调一切爱国活动，特别是筹款和宣传活动。在该组织发动和领导下，纽约市区每月参加各种救国活动的华侨达3万多人次，进而影响和带动了全美国乃至整个美洲华侨社会积极投身到筹款募捐活动中来。

早在淞沪抗战时期，爷爷就成立了筹饷机构，发动美洲各国广大华侨进行了捐款。他除了自己成立的筹饷机构外，还参与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积极发动华侨捐款。

当时在美华侨大多抱有一颗爱国之心，为祖国惨遭日寇蹂躏焦急万分。可是很多人无从着手，而他们对平日为侨胞仗义执言、坚决维护侨胞利益的爷爷却十分信任。有的华侨不知道该怎么捐款，甚至不信任常设的捐款机构，便亲自登门找爷爷捐款，以致爷爷家里每天就像市场，上门拜访、捐款的人络绎不绝。爷爷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是笑脸相迎。他欢迎所有爱国仁人志士为抗战捐款，对心存疑问的人士也是耐心讲解。除此之外，他的工作量要比平时大两三倍，很多事情他都亲力亲为。他每天上午10点开始工作，至深夜12点才能结束，有时甚至要工作到凌晨。

为了更好地做好募捐工作，爷爷暂时辞掉了洪门职务，专心筹饷支持祖国抗日。在爷爷和其他华侨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美国华侨成立了95个募捐团体，开会筹款达437次，捐款共达5600万美元，而爷爷亲自组织的纽约“筹饷总会”募捐达1400万美元。此外，旅美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飞机30多架，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上千。爷爷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一个华侨社团。爷爷在国外为抗日战争募捐时，从未为自己和家人留下过一分钱，回国后也从不为自己和家人向国家要任何好处。

不畏权势宣传抗战

爷爷为了宣传自己的抗日思想，还走出美国，多次在南北美洲、东南亚多个国家之间奔走呼吁。期间他多次护送华侨捐赠的抗战捐款、物资回国，并考察国内抗战形势。1942年爷爷回了趟祖国，返回美国后，将在国内了解的抗战情况及时向美国华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之后，他不辞辛苦到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当地侨胞们及国际主持正义者宣传并呼吁援助中国抗战。

爷爷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民众，更鼓舞了士气。当时，他被选为华侨参政员，一直任职到抗战胜利。他十分看重自己的这份责任，以民族大义为重，敢说敢做，毫不畏惧权势和威胁。1941年6月皖南事变后，爷爷马上通电蒋介石表示要“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又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国难面前，爷爷始终坚持以民



1949 年 9 月 21 日，司徒美堂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族大义为重。

拒绝诱惑恪守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期间，爷爷积极宣传抗日，历经艰险，在香港面对日本特务威逼利诱正气凛然，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出任日伪香港维持会会长，后逃离香港，辗转到达重庆，深受国人敬慕。爷爷到重庆第二天，他还没有从一路劳顿中恢复过来，就被告知有人来访。他当时不知道是谁，以为是国民政府派人前来慰问的，就匆匆换了件衣服出门迎接。

令爷爷没有想到的是，来探望他的竟是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爷爷虽然一直活跃在抗日舞台，和国民党高层也打了不少交道，可是和共产党领导人打交道还真是第一次。面对周恩来，他想起杨虎城将军曾经的介绍，不由肃然起敬。

在爷爷下榻的饭店，周恩来和爷爷进行了简短却深入的交谈，同时告知爷爷，过几天要为爷爷举行一个欢迎会。虽然这次会面时间很短暂，却给爷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后，在周恩来亲自组织下，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爷爷举办了一个热烈而简朴的欢迎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民主人士陶行知等百余人出席会议。

回到饭店，爷爷久久不能入眠，他还处于一种兴奋和昂扬的情绪之中。会上周恩来的讲话太好了，也让他知道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情况。

由于爷爷的威望和地位，国民政府也想拉拢他，爷爷眼见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受到排挤甚至追杀，他怒火中烧，



司徒美堂与毛泽东主席合影

对国民政府充满了失望，但是，他以大局为重，坚持民族大义，仍然担任了中国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且积极履行职责，毫不因为年事已高而有所懈怠。为了更好地团结广大侨胞，爷爷向政府当局提出自己有关抗战及关系到侨胞切身利益的主张和建议。比如以侨救侨、疏通侨汇与吸引侨资等主张。爷爷还联合侨商及国内金融界人士共同创办华侨建设银行，吸收侨资，开发国内实业。他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号，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他在所不惜。但是，爷爷的想法和建议多数未被国民政府采纳，不仅如此，很多事情让他根本无法接受，比如 1943 年国民党想夺取美国华侨抗日募捐之功事件，华侨多笔捐款被国民党侵吞等等，都使爷爷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越来越失望。强烈的爱国情怀挡不住他爱憎分明的个性，他无法忍受任何损害抗日成果、损害民族利益、践踏华侨心血的事情发生。1942 年，爷爷任重庆华侨参政员时，在一次八路军办事处的茶话会上，他慷慨陈词，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演讲。他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祸侨、害侨的罪行。为了把广大华侨统一起来，更好地为抗战做贡献，为以后国家富强做贡献，1945 年初，在爷爷和其他致公堂领导人的努力下，于同年 3 月 12 日在纽约召开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将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爷爷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的主席。随着时局发展，爷爷在人生的晚年找到了寻找了一辈子的方向，抗日战争后期，他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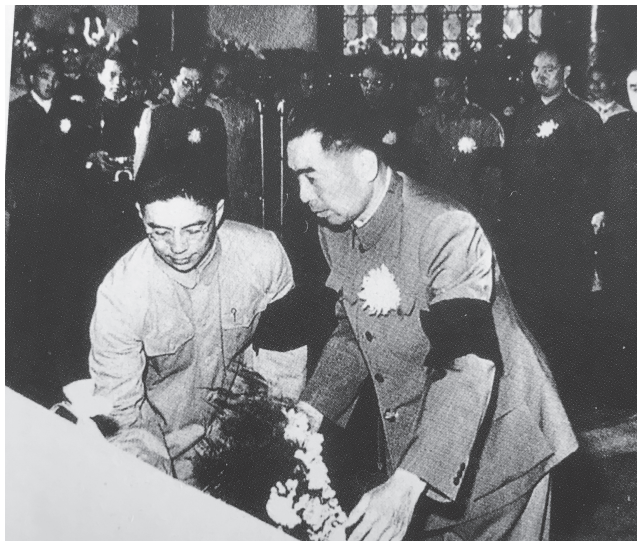
坚决支持共产党建立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爷爷盼望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能够飞跃发展。但是，蒋介石却发动内战，使到工、农、商破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爷爷再次感到失望，说：“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爱国爱民的中国共产党，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人民苦难深重，不容我袖手旁观。”1948 年，爷爷毅然离开上海到香港，公开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要求共产党主持召开没有国民党顽固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协商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爷爷说只要收到共产党的邀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回来参加会议。随后爷爷重返美国，发动华侨支持祖国的解放事业。

1949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主席发出邀请函，邀请爷爷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爷

爷欣然接受。9月，爷爷结束了69年的旅美生活，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日，爷爷与新中国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的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勤政殿开幕。会议主要讨论与协商关于建立新中国的一切准备工作，包括确定国名、国旗、国歌、国徽等重要内容，其中，国名问题是中心议题，因为它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是革故鼎新的标志。毛主席在当天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问题提出了三种意见。一为“简称中华民国”说，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过长，认为这一名称可不变，必须时则使用简称。二为“中华人民民主国”说，提出“民主”与“共和”无并列的必要，认为国名可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过长，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用简称，而是“去掉民主二字”，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讨论中，张奚若提议：“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他的意见获得在座的认同。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我们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在公祭司徒美堂大会上，周恩来总理献花圈

然而，新国名虽然定下来了，但是争论却还没完，因为国名后面还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赫然写着六个大字“简称中华民国”，这个写在括号里的简称在审议《共同纲领（草案）》时候，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9月26日，为了国名后面的这个争议的括号，周恩来总理设午宴，召集包括何香凝、周致祥、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陈嘉庚与爷爷等在内的二十多位民主人士举行商谈。周总理这样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

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民建代表黄炎培表示支持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但是，他的话遭到了前清进士周致祥的坚决反对。周致祥说：“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周致祥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当时已经 83 岁高龄的爷爷，因为听不懂“北方话”，这次有其秘书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这时候，爷爷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顿时，宴会厅里安静下来，大家等待着聆听这位美洲侨领、“洪门大佬”的意见。

爷爷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 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我们好像偷偷摸摸拟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爷爷的这番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他的慷慨陈词引来众人喝彩，大厅里立即响起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自此之后，张澜、沈钧儒、陈嘉庚等也全都反对简称。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名后面括号里“中华民国”的简称。从此，伴随新中国成立的步伐，一个伟大而光辉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并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爷爷一生心系国家民族，赤胆忠心，肝胆相照，恪守民族大义，抒写了一个海外华侨领袖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百年梦想。爷爷这份爱国心、民族情和锲而不懈的奋斗精神，成为我一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始终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支持着我顽强地走过知青上山下乡到贫困山区的艰苦生活等种种磨难，走向今天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

赤子丹心归来　怀真抱素归去

文 刘铁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1937 年 7 月 26 日，妈妈出生在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堤岸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原名冯红妹。看了电影《女驸马》后，妈妈把名字改成了剧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冯素珍，希望自己也能像女驸马一样聪慧、勇敢、坚强，对爱忠贞不渝。

在我们的印象中，越南是个落后贫穷的地方，可在 20 世纪初，西贡是法属殖民地，曾繁华一时，而堤岸则是最富庶之地。我外公当时在堤岸开有两家铺子、一间茶楼和一家洗衣店。他们平时穿的是西装革履，喝的是雀巢咖啡，用的是法国餐具，吃穿用度十



1955 年回国前，冯素珍（前排左二）与妹妹冯红凤（前排左三）及高中同学合影

分讲究，一家人过着富裕而舒适的生活。外公家有 8 个孩子，妈妈排行老三，但她在女孩中排行最大，是名副其实的“大小姐”。可妈妈没有一点小姐做派，经常帮家里做家务，有时一洗就是 10 个人的衣服。由于妈妈十分勤劳，外婆很喜欢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外一批又一批热血的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越南的年轻华侨也备受鼓舞。1955 年 3 月，妈妈快满 18 岁时，怀着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激情，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放弃优渥的生活，和我大舅、二舅还有一帮同学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途经香港时，二舅被香港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吸引，留了下来。而妈妈和大舅没有受影响，继续归程，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州。1955 年 5 月至 1956 年 8 月期间，妈妈先后在广东华侨补校和广东华侨中学学习。1956 年 9 月，妈妈考取了广州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接受了三年严格的师范教育。

妈妈美丽大方、热情活泼、多才多艺，她会吹口琴、弹风琴、拉手风琴，能歌善舞，演话剧、指挥合唱、打羽毛球、打篮球样样在行，还写得一手好字，教学技能出类拔萃，师范毕业时被评为“五好团员”。此时，恰逢华南师院附小（现为华南师范大学附小）的叶珠云校长到一师为学校挑选教师的好苗子，妈妈被她一眼相中了。1959 年 8 月，妈妈被分配到师院附小，从此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28 年，直到生命的终点。

叶校长的确没看走眼，妈妈很快就成为师院附小语文教学的金字招牌。每逢学校上



1980 年，冯素珍在华师附小上语文公开课

语文公开课，都是妈妈和另一位资深的林老师轮流挑大梁。每逢外地的老师来听课时，叶校长便会指定妈妈去上课，因为妈妈不仅上课出彩，而且形象出众，是师院附小的形象代表，学生们都说妈妈的眼睛会说话。妈妈备课非常认真，教案写得规范详细，还在家制作各种教具，刻蜡版备印资料，并不时向在华师大教育系工作的爸爸请教。

妈妈不仅课上得好，还十分关心学生。当时师院附小除了招收华师教职工子弟外，还接收石牌地区第一军医大学、中山三院和武警部队等单位的孩子。记得小时候的某年寒假，妈妈冒着刺骨的寒风骑自行车带着我去第一军医大学（当时在暨南大学校园内）家访。那儿的家长都是北方人，他们不像广东人那样在客厅会客，而是把客人让到里屋。每次妈妈和我一进门，家长们都十分欢迎，立马把我们让进卧室那铺满各色棉被的大床上，还拿出糖果点心给我吃，我在旁边玩，妈妈和学生家长热烈交谈，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

妈妈还经常义务给学生补课。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邋邋遢遢的女生，好像家长不怎么管，每天下课后就到我家报到，简直把我们家当托管所了！她流着鼻涕，还哭哭啼啼，我很烦她，可妈妈每次都细心地给她擦去眼泪鼻涕，再给她补课，还不时留她吃了晚饭再走。妈妈是个急性子，可对学生却十分耐心，特别是调皮的孩子，她不但不讨厌，反而格外用心。

妈妈在业务上很出色，可由于她资产阶级小姐的出身，多次提交入党申请书都未获



1982 年，华师附小二年 1 班举行卢米高归国欢送会

批准，也没能评上先进，还有人趁机贴她的大字报，妈妈感到十分委屈和苦恼。一次，她恳切地对派驻师院附小的工人宣传队队长说：“队长，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优秀的青年，不知道我哪里做得不够？请您指出来，我一定努力改正。”工宣队长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觉得你早就符合入党条件了。只是你的出身……”妈妈听了队长的话，禁不住热泪盈眶，虽然无法满足入党的心愿，但能得到工人代表的肯定，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金杯银杯不如家长的口碑，家长们可不管什么出身，只管老师教得好不好，他们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妈妈的班上，就连华师附小的同事们，也竭力为他们的孩子争取挤进妈妈任教班级的名额。

1981 年，叶校长把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妈妈：一个美国男孩要到妈妈的班上学中文。校长语重心长地对妈妈说：“这不仅是教学的小事，更是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大事，希望你能圆满完成任务！”改革开放之初，华南师范学院开始引进外籍老师给外语系的学生上课，那次引进的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带着十岁的儿子一起来到中国。当时广州没有几个外国人，教外国孩子学中文更是没人尝试过，哪个老师敢接啊？可为了不辜负学校和领导的信任，不让其他老师为难，妈妈毅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1985 年，14 岁的卢米高从美国寄来照片

这个美国男孩叫卢米高（英文名 Michael），他不懂中文，妈妈也不懂英语，这可怎么教？神奇的是，妈妈竟想出各种办法和卢米高沟通，而卢米高也很快能用简单的中文跟妈妈交流了。卢米高当时十岁，褐发碧眼，长得很高，而妈妈那个班的孩子才七岁，比他矮了一个头，所以他显得特别突出。课堂上，每当卢米高站起来用洋腔洋调的中文回答问题时，小朋友们都会哄堂大笑，前仰后合，搞得他很不好意思，脸红到脖子，再也不想去上课了。在妈妈的教育和引导下，这个班的中国孩子后来不再笑话卢米高了，在他不懂的时候还纷纷给他提示，并且在其他方面帮助他，卢米高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和班上的孩子成了好朋友。

每逢周末，妈妈都会让卢米高来家里为他义务补课。我当时很不懂事，感觉十分妒忌，还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心想：妈妈从来没给我补过课，却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这个小老外身上，她怎么爱别人的孩子胜过爱我呢？

经过一年的学习，卢米高已经能自如地用中文进行日常交流了。看来，语言不同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只要心中有爱，便能在彼此之间架起跨文化的彩桥。即将离开中国时，卢米高与妈妈和这个班的孩子已经难舍难分，卢米高的母亲在机场告别时，

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冯老师，我和米高的爸爸都非常感谢你，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回国之后，他们还不时寄来明信片和照片。1985 年 9 月，妈妈又收到了卢米高的照片，看到他已经长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妈妈非常高兴。

由于妈妈长期承担公开课等高强度又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压力特别大，长期处于精神紧张、身体透支的状态，偏头痛、颈椎病和胃疼等病痛不断袭来。可妈妈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加上教学任务繁重，家里爷爷瘫痪在床，需要她和爸爸一起照顾，她老抽不出时间去医院检查，就这么一直拖着、忍着。妈妈的包里总是放着一瓶风油精和几块饼干，头疼的时候就抹几滴风油顶一顶，胃疼的时候就吃几块饼干撑一撑。

1986 年，妈妈胃痛越来越严重，饼干和药物都无法缓解了，爸爸提出陪妈妈去医院做胃镜，结果查出已是胃癌晚期。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仿佛晴天霹雳，妈妈可是我们家的支柱，她要是走了，我们的家也塌了！可妈妈知道后，却出人意料地平静，她并没有愁眉苦脸，而是乐观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化疗很痛苦，会引起剧烈疼痛、强烈呕吐和大量脱发，我们看着都替她难受，可妈妈每次都表现得很坚强，为的是让我们安心。在家休养期间，妈妈和以前一样做着各种家务，为我们解除后顾之忧。我当时还天真地以为，妈妈这么乐观，还这么能干，而且才 49 岁，一定会好的！谁知道……我当时真应该多为妈妈分担家务，让她少干点。

妈妈去世前在中山三院住院期间，她所教班级的孩子们自发组成慰问团，分好小组，自我排练，并排好场次，每天下午下课后派一个小组到医院为妈妈表演节目，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这让当时中山三院的医生护士非常感动，她们之前从未见过哪位老师受到学生如此爱戴。叶校长也亲自到医院看望妈妈，她强忍泪水，握着妈妈的手说：“小冯，你是我亲自带到华师附小的，我一直以你为骄傲，这些年你为学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代表学校感谢你！”妈妈听了，眼里泛起了泪光。我既为妈妈高兴，也为她感到惋惜。妈妈的兄妹感情很好，我大舅、二舅都来看望她。二舅还专门从香港买来多瓶白蛋白，这些营养剂当时中国大陆很难买到，而且很贵，普通人买不起，二舅那时已是香港一家酒楼的老板了。二舅见到妈妈，哽咽地说：“阿珍，如果你当年跟我一起留在香港，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辛苦了……”妈妈摇摇头，微笑着说：“二哥，我从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

即将离开中国时，卢米高与妈妈和这个班的孩子已经难舍难分，卢米高的母亲在机场告别时，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冯老师，我和米高的爸爸都非常感谢你，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手术和化疗最终都没能挽救妈妈的生命，她于 1987 年 12 月去世了。我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发现她的抽屉里塞满了学生亲手制作的小礼物、小卡片，还有不少学生的来信。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冯老师，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当上医生了，我知道您身体不好，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有什么需要，一定要来找我！”在妈妈的追悼会上，来了上百人，除了亲人、朋友和同事外，大多数是



1955 年冯素珍（中）回国时，与同行的越南朋友合影

学生和家长，他们来送敬爱的冯老师最后一程。如果妈妈地下有知，应该感到安慰，她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几年前，我在华师的公交车站碰到以前中山三院的护士长，我跟她打招呼，可她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说：“我是冯素珍老师的女儿。”老护士长立马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我说：“冯老师是我孩子的班主任，你以后如果要到三院看病啥的需要帮忙，尽管来找我，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在医院里还是有熟人的，一个托一个，总有办法。因为，冯老师实在是太好了！”老护士长眼里闪烁着泪花。我真没有想到，在妈妈去世 20 多年后，竟还有学生家长记得她，而且因为妈妈多年前教过自己的孩子，还愿意为她的孩子去做好事。

妈妈在她的芳华岁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洗尽铅华，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她的确做到了人如其名：纯朴、坚毅、勇敢，无论碰到什么委屈、不公与打击，她对祖国、对党、对教育事业都矢志不渝，对自己的付出无怨无悔！妈妈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却像流星一样，在天空画出了最美的弧线，在人间留下了最绚烂的光彩。

我是一名侨眷，现在也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将秉承妈妈爱国爱家、敬业乐业、勇挑重担、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

吕健：“五色时空”的追梦者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这句振奋人心的话，引发了亿万人共鸣。吕健就是其中一人。三十余载光阴，他一直追逐着一个梦想——建设“地绿、水净、天蓝”的生态健康人居环境。他从祖居地广东肇庆启航，走出广东，甚至走出国门，绕了一圈后，又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实践他的“五色时空”。

结缘鼎湖山水

吕健从肇庆学院毕业后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书育人。1988年，一纸调令，他离开了相伴四年的三尺讲台，到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报到。“当时局里领导问我想去哪个部门，我选择了远离城区的鼎湖旅行社。”从小喜欢亲近鼎湖山这块山清水秀之地的吕健，想让鼎湖山变得更美。

20世纪80年代末，生活在鼎湖山附近的人们环保意识不强，习惯将生活垃圾倾倒在山溪旁。几公里长的山溪垃圾遍地，严重影响鼎湖山景区的美观。当时整个景区还没有清洁工人，新官上任的吕健便组织单位里的50名青年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一场垃圾清理运动。他们足足干了一个多星期，清走了七卡车的垃圾，还鼎湖山一片地绿。1989年，升任鼎湖旅行社总经理的吕健主持全面工作，开始大刀阔斧的“保洁改革”——雇清洁工，还制定了一系列鼎湖山保洁制度，激励景区员工自觉维护鼎湖山的洁净。

整顿好“内务”，吕健化身为“宣传大使”，着手向全国推广鼎湖山。

1995年，国家邮政局准备发行广东题材的第一套特种邮票，选了深圳特区，派出邮票设计师等专家到深圳取材。吕健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往深圳邀请国家邮政局的邮票设计师等专家到鼎湖山一游。

吕健对鼎湖山的“家底”十分自信，他相信国家邮政局的专家会为鼎湖山的“美色”倾倒。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与吉林长白山、四川卧龙山并驾齐驱的中国第一批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鼎湖山还是当今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原始森林，从山麓到山顶有近2000多种植物共生互生，被誉为“活的自然博物馆”“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

果不其然，国家邮政局的专家被这一方好山好水所折服：“广东题材的第一套特种邮票选题理应是肇庆鼎湖山。”

同年2月，广东题材第一套特种邮票发



吴楚材教授（左）与吕健（右）合影



吕健在鼎湖山景区检测空气负离子含量

行，鼎湖山榜上有名。随着这一国家名片的发行，鼎湖山为更多国人所熟知。

而一套四枚特种邮票所体现的鼎湖山“山、林、水、气、景”生态环境，让吕健对生态健康人居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此，他与鼎湖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创立的“五色时空”人类生境自组织理论源于这一片山水的启发。

开创“五色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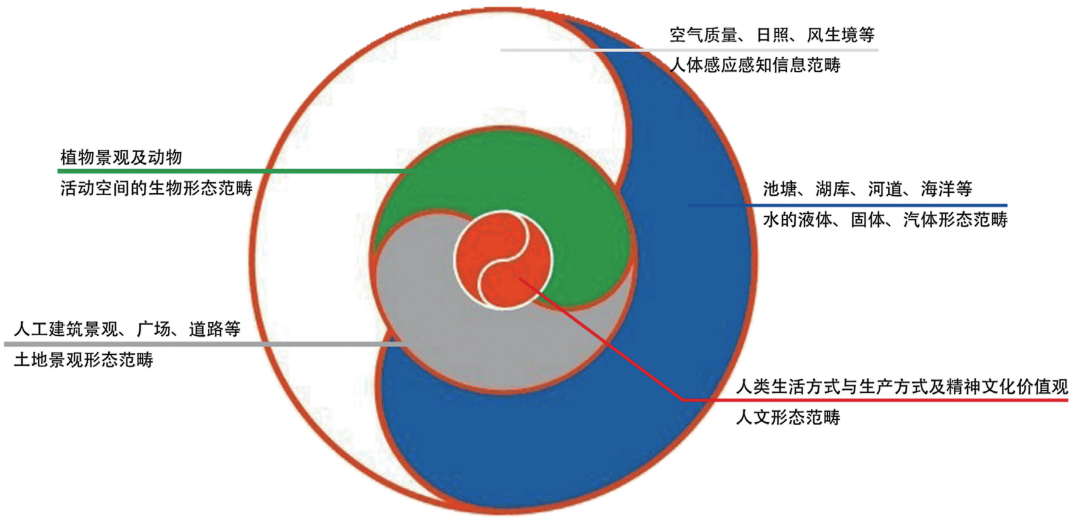
1998 年，是吕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遇到了他的梦想导师——中国生态旅游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吴楚材。吴楚材是研究森林空气环境的专家，他采用 20 多个指标定性定量分析，以此判断森林空气质量。吕健一直苦于如何将鼎湖山的新鲜空气定性定量传播出去，吴楚材教授的研究理念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于是，吕健前往湖南拜师学艺。吴楚材很欣赏吕健对生态旅游的独特见解，遂推荐他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特招生态学硕士研究生。吕健放弃经营多年的管理成果，回炉深造。

在跟随吴楚材教授攻读生态学期间，吕健的生态环境科学学识得到极大提升，提出采用“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空气微生物含量”三项指标来测定与评价森林生态环境，并以这三项指标定义新鲜空气。后来，他受导师委托回到鼎湖山主持原始森林生态环境（空气质量）测定与评价工作。鼎湖山景区空气负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大多数都在 1 万个左右，最高值达 105600 个。鼎湖山的最高检测数值超过了吴楚材之前检测过的 50 多个国内景区的含量，成为全国最高值。根据测评结果，吕健研发出“空气负离子呼吸区”“天然氧吧”等鼎湖山生态旅游产品，从而引发轰动全国的“空气负离子效应”。

2002 年，不惑之年的吕健继续北上求学，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生态哲学博士。

在读博期间，吕健全身心钻研生态健康人居环境问题，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他首创的《五色时空·人类生境自组织理论》（简称：“5SSK-H&SO”理论）轰动国内外学界。



《五色时空·人类生境自组织理论》示意图

《五色时空·人类生境自组织理论》是吕健从中国生态文化原创思维出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八卦学说”的宇宙人生自然规律为思路，以生态学自组织“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tics）、突变论（Calastrophe Theory）”等理论为方法，以世界语言诠释，探究生命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多元文化精髓融合而成的生态科学理论体系，简称为“5SSK-H&SO”理论。《五色时空·人类生境自组织理论》示意图，恰似一环又一环的太极相扣相生，极具中国特色。在人类生态系统“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跨度中，无色时空（人体感应感知信息范畴）与蓝色时空（水体形态范畴）形成阴阳关系，两者环抱而立生成天道太极；灰色时空（土地形态范畴）与绿色时空（生物形态范畴）形成阴阳关系，两者环抱而立生成地道太极；红色时空（人文形态范畴），以西方科学理论与东方文化思维形成阴阳太极关系，两者环抱而立生成人道太极；无色时空、蓝色时空、灰色时空、绿色时空与红色时空由天道、地道、人道三重太极叠加生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五色时空”整体耗散空间结构。“‘五色时空’整体耗散空间结构中的物质、能量、信息分析研析于‘过去’，把握于‘现在’，实现于‘未来’的不同时间集合，以同体共生、相互对待、交流平衡、循环再生、生生不息运动着。”这就是吕健梦想的生态健康人居环境。

吕健的这一理论被联合国授予了“全球人居环境绿色技术奖”和“全球人居环境杰出贡献奖”，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和尊重。

曾主持过生态旅游开发的吕健没有停留在“纸上谈兵”，而是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2003 年“非典”疫情暴发，广大市民陷入恐慌。相关政府部门纷纷采取应对措施，消除“非典”事件带来的恐慌。吕健在广东省旅游局的邀请下，采用“5SSK-H&SO”理论设计了“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提神”等




① 吕健带领其团队在里湖种植“5SSK-AP”沉水植物
② 吕健和他的团队一天要在淤泥里劳作四五个小时

一系列保健旅游产品，让市民在生态旅游中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鼎湖山成为他实践“5SSK-H&SO”理论的第一个旅游景区，并且大获成功，这样的旅游日益受到人们推崇。

之后，吕健对这一理论的实践更有信心。他将这一理论推广应用到住宅小区和城市生态建设领域，推动了中国生态健康人居事业火速发展。

坚守“绿色梦想”

凭借着“5SSK-H&SO”理论走红的吕健没有止步不前，他希望掌握更多的生态修复环境知识和技术。“美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治理技术国际领先，如果能够把他们的经验、技术、理念引到国内来，我觉得这是再好不过了。”2008 年，吕健踏上了出国取经的漫漫长路。

2013 年，吕健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回来了。他在肇庆创立了广东五色时空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出任公司董事长。从此，吕健的“五色时空”梦想在华夏大地落地开花。广东五色时空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拥有 21 项专利技术，其中 2 米水质透明度“五色时空－水下森林氧吧”地表水污染生态工程综合技术（以下简称“5SSK-UF·OB”技术）被中央电视台誉为“登上黑臭河道治理的珠穆朗玛峰上”。

重现“天空之境”的星湖是成功实践“5SSK-UF·OB”技术的经典案例之一。

星湖是肇庆的母亲湖，千百年来经多次修建形成如今的五湖格局，银湖黛峰，林荫覆道，碧水波光，垂虹弄影，景色优美，有“桂林之山，杭州之水”的美誉。然而，这如诗如画的意境大约从 2000 年开始变得黯然失色。由于城市建设和人类活动影响，含氮、磷等排放物使水体富营养化，藻类繁殖过盛，破坏了星湖的自净能力，引发水体发腥发臭，水质恶化。

“星湖治水，关键在于恢复水下生态。”吕健从星湖水质变差中领悟到让星湖水重新



治理 3 年多以来，里湖水质保持Ⅲ类水标准，水清见底，与周边湖泊形成强烈对比

变优的方法。他希望用自己的所学，让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的河流湖泊恢复儿时水清见底的模样。

2017 年，肇庆市政府将整治星湖水质工作排上日程，批准由肇庆市生态保育慈善会筹集资金，用于七星岩景区·里湖水体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吕健接下了这项生态修复技术服务项目。

同年年底，项目即将启动，但慈善会仅收到 19 万元捐款，技术服务款还缺口 3000 多万。这让吕健进退两难，对于才起步不久的广东五色时空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来说，3000 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经过彻夜思考，吕健还是决定先将项目做出来，为家乡争口气，也为民企争口气，“别人不相信一家民营企业可以治理好十几年都呈现浑浊状态的星湖水，我们自己花钱也一定要争这口气。”

2017 年 11 月 28 日，吕健带着团队进驻星湖景区开始施工。吕健介绍，湖泊的绿色生态治理分三步走：首先在湖里投放“5SSK-EP-1 ～ 15 号”定制微生物降解底质泥，抑制藻类生长，提升水质透明度，促进种植“5SSK-AP-1 ～ 15 号”沉水植物的生长；然后开始“5SSK-BE”生态修复技术服务，种植的“5SSK-AP-1 ～ 15 号”沉水植被以吸收淤泥底质的富营养物质转化为体内的植物蛋白，并孕育其生长至 2 米多高的“水下森林”，通过光合作用释放“负氧离子”净

化湖水；最后“5SSK-EPR”技术生态保育“5SSK-AP-1 ～ 15 号”沉水植物群落演替为“水下森林”，覆盖湖底达 90% 以上；投放“5SSK-AA-1 ～ 15 号”水生动物，生成“水下森林氧吧”生态系统，维持水体生态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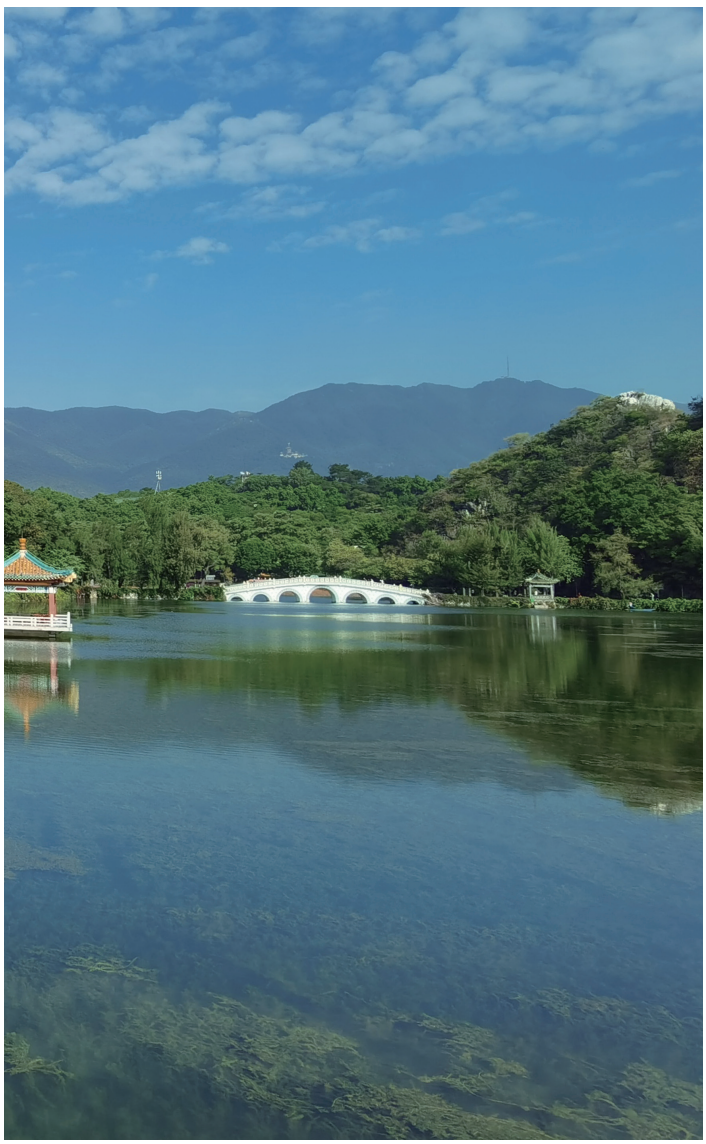
在吕健和公司团队终于将里湖的水全部抽干，准备投放微生物时，却收到景区紧急通知，因有重要接待，里湖需要重新填满水。这突发事件令工程又耽搁了 1 个月，此时离 2018 年春节只剩下 40 多天。按往常惯例，景区每年春节假期都有一个传统节目——里湖泛舟。留给吕健的时间不多，他躬体力行，带领 10 多名公司员工下湖“种草”。

里湖湖底淤泥平均厚度达 0.52 米，最深的地方将近 1 米。刺骨的寒冬里，吕健和员工光着脚行走在淤泥中投放“5SSK-



里湖运用“5SSK-UF • OB”技术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后，形成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

EP-1 ～ 15 号”定制微生物来降解底部淤泥的污染物和水体富营养物质浓度，并种植经优化改良能净化水质的“5SSK-AP-1 ～ 15 号”沉水植物。他们一天要在淤泥里劳作四五个小时，有的女员工陷入淤泥中需要其他人协助才能上岸，而不少员工脚上的皮肤被冻得疼痛不已甚至皲裂。后来，热心市民被他们的行动感动了，自发组成志愿团，给他们送姜汤，还协助他们进行岸上工作。



终于，在吕健和公司团队的努力下，所有工作在春节前圆满完成，里湖重新灌满了水，没有影响景区春节庆典活动的举行。

“治理星湖是我们‘5SSK-UF·OB’3.0 技术的一个尝试。”春节期间，大家忙着访亲走友，享受节日的欢乐，治学严谨的吕健却每天带着设备到里湖测量水的清澈度，亲自跟进“5SSK-UF·OB”技术的实践效果，“年初一，水质透明度还是 0.4 米；年初三，1.0 米；年初五，1.5 米；年初七，整个里湖清澈可见底！”

据肇庆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数据显示，治理 3 年多以来，里湖水质保持Ⅲ类水标准，形成水生态系统食物链，沉水植物覆盖率达 90% 以上，水体重新恢复自净能力。里湖水下生态恢复后，即便下雨天周边污染流入湖中，湖水也能自净消化掉。如今的里湖如镜映蓝天，水清见底鱼相逐，形成了“鱼群空游”“天空之镜”和“氧气冒泡”的七星岩新三景。

从此，吕健的“5SSK-UF·OB”技术一战成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广州、深圳、佛山、肇庆、长沙、合肥、成都、重庆、郑州等地，甚至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也开始先后实施“五色时空”生态健康人居建设。

“我的初心一直没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还城市一片碧水蓝天。”数十年如一日，吕健始终担当起生态建设使命，为人们向往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田园风光、鸟语花香”美好生活梦想而努力。

新兴侨批寻踪纪事

文 李柏达（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在广东省汕头视察时的重要讲话，激起了南粤侨乡学习侨批文化的热潮，台山三益碉楼侨文化研究基地也随之走进了春天。

新兴侨批初露芳容

2021年新春伊始，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簕竹镇委书记伍华安、副书记罗海健、副镇长李志欣等一行莅临台山三益碉楼调研侨批文化，为推动簕竹镇美丽圩镇侨文化博物馆建设作参考。我满怀喜悦之情，为客人讲述一个个台山银信故事。伍书记一字一句地研读一封封银信，为银信里动人的故事感到震撼。他惊喜地发现一封印有“簕竹恒信庄”侨批，即邀请我一起朗读起来：

家英嫂粧鉴：

顷接五哥来缄，悉已平安抵埠，兹在督亚冷埠做日本车工作，料渠（佢）亦有出告耳。前五哥抵此，叫代购耳环三对，每对一样重，交给收用，今已购妥三对付上，希查收，有信回复五哥知照是幸。如有土（产）复五哥，祈交新兴本号转来。旺侄拟习车衣，五哥有讲此事，托钊叔作主，只以时局不宜，钊叔来信进行找工作而已。此问

闺安

四叔手启

七（月）、十（日）

这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四叔”寄给新兴“簕竹恒信庄”转送寺云村“家英嫂”的侨批信，寄信人受“五哥（即家英）”的委托，托人带三副金耳环回家乡，并告知如有家乡的土特产要带去南洋，请交新兴“簕竹恒信庄”转送即可；同时讲及“旺侄”学习衣车一事，请“钊叔”作主决定，因当时



云浮市新兴县簕竹镇调研组到台山三益碉楼调研

时局不宜，先选择找工作好了。

看到来自家乡的侨批，伍书记非常兴奋，他鼓励我将这些簕竹侨批整理研究，写成故事，让侨批文化为新兴县簕竹美丽圩镇建设增添光彩，同时盛情邀请我到新兴簕竹镇，挖掘当地的侨批故事。

原地寻踪，挖掘记忆

庚子年小年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我夫妻一起驾车来到簕竹镇政府。在当地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到簕竹圩旁的河边村参观。河边村前巍然矗立着五座岭南传统古建筑——“锅耳屋”，檐牙高啄，雕梁画栋。据了解，这是新兴叶氏宗族聚居的村庄，以前出了许多官宦人家，清末民国时期，不少村民漂洋过海去南洋谋生，有的人去屋空，尽显破落。我第一次走进新兴的“锅耳屋”，感受这大户人家的气派。叶家祖屋是岭南民居典型的“三间两廊”结构，门口正面正开，大厅中宫墙为祖先社坛，前开天井口，为“天、地、人”融合一体的典型岭南民居，里面还摆放着一些农具和旧家具，全屋结构还算完整。罗海健告诉我们，簕竹镇正在推进美丽圩镇建设，计划将这些古色古香的“锅耳屋”修复建成侨文化博物馆，建设华侨文化广场，重修河边古码头，复现当年以爱国



新兴县簕竹镇鸟瞰图



荣栈店铺原址就是现在的“德惠商店”

华侨张珠为首的簕竹人到南洋艰苦创业的情境，向世人推广簕竹人敢想敢干、奉献担当的竹子精神。

古墟追溯，批局觅迹

我们到簕竹圩旧街走访，寻找侨批局遗址。

簕竹旧圩是一条笔直古街道，两旁为南洋骑楼式的街铺，这种建筑有利于遮阳避雨，为适应广东闷热多雨的气候而兴建的宜居铺户，旧铺多为砖瓦桁角结构，米黄色的外墙、褐红色的窗户、灰黑色的瓦檐，在蓝天白云的辉映下鳞次栉比，美轮美奂。我们找到一间曾代办过侨批的旧店铺——德惠商店。据当地两位 80 多岁的老人董先生、张先生回忆说，民国时期（1945 年以前），力（簕）竹的所有海外华侨书信及邮件先送至新兴恒信号投递（当时恒信投递铺位在新兴县城水街原烟丝厂），转送到簕竹圩相关的联营店铺，然后再送给收件人，簕竹圩当年有以下三间店铺负责邮件收发的工作：一是荣栈店铺，店主黄安是簕竹五联五楞根村人，既是老板，又是送批人，原址就是现在的“德惠商店”，是一间杂货店。二是均和昌店铺，老板梁金进（送件人），是簕竹红光村人，原铺已拆重建。三是簕竹墟邮政代办所。据 1926 年出版的《中华邮政局所名录》记载，当年簕竹墟邮政代办所已经成立，属新兴邮局管辖。1946 年，簕竹墟邮政代办所设立在该墟济安堂药店内，老板（投递员）李泽芬是红光圩尾村人。1956 年，由当地政府在现在纯剪发艺铺处成立簕竹墟邮政所，改革开



1960 年 9 月，新兴县簕竹镇寺云村寄马来亚金榜埠回批封

放后迁至现在簕竹镇政府对面的现群记餐厅，不久又迁至现新街 S113 线红光居委会侧的邮政大楼。

一封新兴寄马来亚的回批信，刻下了簕竹墟邮局的足迹。这是寺云村朱氏寄马来亚朱家昇的家书，贴“航 2—航空邮票”52 分一枚，是国际航空邮资，盖 1960 年 9 月“广东 • 簕竹墟”实线三格式邮戳寄出，9 月 12 日送达马来亚金榜班影五十五号朱家昇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各种物资缺乏，各地方邮政局所为节省开支，一般沿用民国时期的邮政日戳，直到 1960 年，新兴簕竹墟邮政所仍然使用旧式邮戳，当年绿衣使者勤俭建国的精神，在邮戳上也有体现。

综合以上采集到的信息和我收集的资料可知，当年的簕竹圩就有新信和宝号、元利大宝号、恒信号、荣栈号、均和昌号、济安堂药店、同兴号等多家店铺代理华侨书信业务。可见，当年小小簕竹圩，在大量侨汇的滋润下，客货两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繁荣昌盛。

桑梓情深，报效故土

新兴县簕竹镇永安村，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高墙大宅，上面镶着“云浮第一批历史建筑：张珠宅”的牌匾，那是马来亚爱国华侨张珠回乡建的大屋。

张珠 1885 年出生于簕竹永安村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以打柴卖草及给人放牛、做短工为生。16 岁那年，同村华侨郑福田见张珠生活无着，便把张珠带到了马来亚冷埠（督亚冷埠），在一间中药店做伙夫。张珠从不吸烟喝酒，加上勤奋节俭，几年间，他便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几十亩山地，种植橡胶树。到可以收割橡胶时，刚好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橡胶价格暴涨，张珠发了一笔小财。之后，他又与乡人合伙开设了“公益号”粮油杂货店。开始时，由于生意不好，三个股

1942 年，日寇南侵的战火迫近马来亚，张珠为使自己经营的矿区不落入日寇之手，亲自率领工人将机器埋入矿坑，炸毁防水堤坝，引水灌浸封闭后，送家人往澳大利亚避难，他和司机郑伙取道缅甸乘机回国，投身于祖国抗战。

东分别退出。但张珠坚定信念，以诚为商，很快赢得众多乡亲信任，生意日渐兴隆。1926 年，有人找到张珠说马来亚怡保有个荷兰人经营的锡矿场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正急于转手。张珠以 10 万新加坡币买下这个矿场，先把多余的汽车、机械卖掉，把矿场改名为“公益矿业公司”，并主攻一个他认为最有可能出矿的坑道，结果，不到一个月，即挖出大量锡矿砂，随后，不断扩大生产。事业发展至巅峰时，他经营着 7 个矿场，成为当地的“锡矿大王”。

张珠创业成功后，不忘故土，热心公益事业。他早年联合侨胞叶春圃、顾耀庭，捐资支持新兴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叶季壮创办的育才小学兴建学校大楼。1927 年，他投资 3 万元在新兴县城东街经营“吉祥泰”号油米杂货店。1928 年，从马来亚怡保锡矿场运回两台发电机，一台装在“吉祥泰”，晚上发电供群众照明，白天和深夜则碾米，开启了新兴人用电的先河。1931 年，张珠捐建新兴县立中学（现新兴一中）南楼宿舍。1934 年，他与侨胞廖芳等捐资兴办霞堡小学，后改名为张珠纪念小学。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远在马来亚的张珠闻讯后，立即电汇 10 万元回国支持抗日。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带头号召华侨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并成立各种支持祖国抗战的团体。期间，他担任马来亚华侨赈济委员会副主席、中华抗日救济总会怡保分会主席，在马来亚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募集大量资金，支援抗日前线。

1938 年 11 月 26 日，日机轰炸新兴县城。他闻讯后，即电汇 2 万元回县，并派出“吉祥泰”经理朱家驹代表他参加组织“新兴县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及“救护队”，培训救护队员，进行赠医、施药、施粥、救灾等。1942 年，日寇南侵的战火迫近马来亚，张珠为使自己经营的矿区不落入日寇之手，亲自率领工人将机器埋入矿坑，炸毁防水堤坝，引水灌浸封闭后，送家人往澳大利亚避难，他和司机郑伙取道缅甸乘机回国，投身于祖国抗战。

1945 年底，张珠再次回到马来亚，重新召集工人，恢复生产，重操矿业和种植业。1954 年 10 月，张珠在马来亚病故，终年 70 岁。

世界记忆，海丝之路

清朝顺治四年（1647 年），箬竹属于宁花都，咸丰元年（1851 年）属西路，宣统二年（1910 年）属第四区，民国三十年（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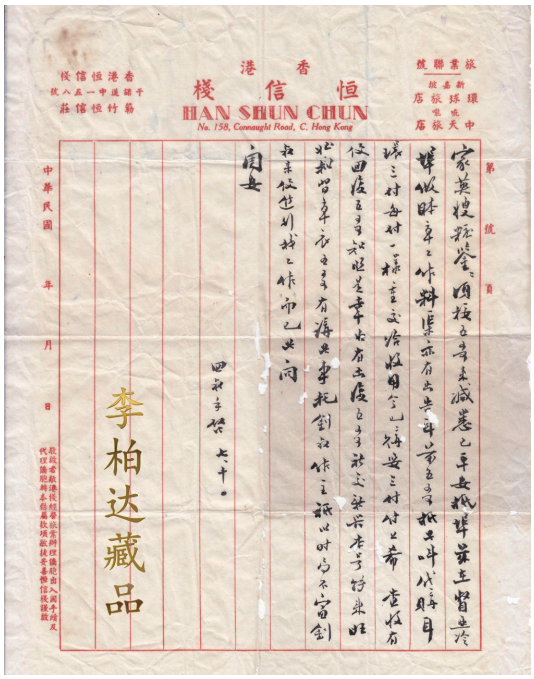
祖屋里挂着朱家英、郑三妹、朱宪芳的照片

年）赖属第二区，民国三十五年（1946）成立簕竹乡。明末清初，在红光金坪村前建圩，因交通不便，不久迁往锦水河边建圩，新圩水陆交通方便，但常受洪水侵袭，于是在河边广种簕竹，以阻止洪水冲毁河堤，簕竹圩因此而得名。

我们来到大坪村委会寺云村，一排传统的岭南青砖大屋整齐林立于眼前。在该村支书和村中父老的带领下，我们很快找到朱家英的祖屋。祖屋里挂着朱家英、郑三妹、朱宪芳的照片。村中父老说，郑三妹是朱家英的夫人。我猛然想起“家英嫂”这个称谓，正是前文所述“簕竹恒信庄”侨批的收信人。寺云村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为朱、黄两姓族人的聚居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不少村民出走南洋马来亚怡保等埠谋生，时至今日家家户户都有华侨，是一条典型的侨村。朱家英这间侨房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面还有一间祖屋。祖屋屋檐横楣上刻着“千祥云集”四个楷体字以及各种精美的花雕，门楣上方几幅古典花鸟传统壁画栩栩如生，门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虽有褪色，却掩盖不了大户人家的豪华气派；墙裙环绕全屋顶部，在乳白色线条灰雕的衬托下，散发出传统侨房的原始之美。我们绕村子转了一圈，发现该村有许多类似的大屋，不少屋主早年移居外洋后，人去屋空，出现空心化现象。

新兴簕竹河道今为西河，古称锦水，发源于新兴县西南面的锦山，是新兴的主干流。据记载，锦水是新兴水陆交通要道，是通往高州、雷州、廉江、儋州（海南）、阳江等地的主要航道。过去从广州前往儋州（海南）、雷州等地，需从西江转船入新江再入锦水，在今河头圩“舍舟登陆”，经阳春前往儋州、雷州、高州等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从惠州贬到儋州时，就是走这一古道，这属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十九世纪初，“下南洋”之风起，南粤掀起了一股“放洋”潮。嘉庆年间，新兴在职知县杨福康弃官出洋任教，带动不少县内士子出海外。道光年间，新兴人出国往马来



“香港恒信栈”侨批信

亚、新加坡等地谋生渐多。1878 年后，到南洋的新兴人急剧增加，并从原定居地转往马来亚各埠，同时散居越南、日本、荷属东印度（印尼）、欧美、法国各地。据统计，目前新兴县旅居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约 15 万人，其中以天堂、簕竹镇为多。马来西亚现有簕竹华侨约 1.5 万人。

我有一封珍藏多年的“香港恒信栈”的侨批信，信笺印有红头广告——“旅业联号：新加坡环球旅店、庇能中天旅店，香港恒信栈，簕竹恒信庄”，左侧还有“敬启者，敝港栈经营旅业，办理侨胞出入国手续，及代理侨胞转本县属款项，敏捷妥善，恒信栈谨启”。

从这封侨批可知，当年香港恒信栈旅店专营旅业，分别在新兴、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设立连锁经营，兼代理侨胞汇款、出国回国手续等业务，是一家连锁经营侨批的机构。再翻开 1949 年朱家英寄回乡的几封家书，我们可以猜测出当年簕竹镇华侨的出洋之路：1949 年初，新兴簕竹寺云村的马来亚华侨朱家英荣归故里，办完所有恳亲相关的事项后，又要踏上出洋的旅途。国历四月三十日，朱家英告别家人，在簕竹码头上船启航，初一日到肇庆，即转搭晚船，初二早到广州，由初三夜往港，初四早到香港。在香港逗留了一周后，五月十一日搭澳大利亚鸭家船启程往新加坡，十五日到星洲，十六夜转乘车入埠，十七日到怡保，即投入新的工作，一路舟陆平安。水陆交通及旅途费用港币三佰元左右。他在香港期间，委托寺云村兄弟、香港恒信栈掌柜朱家驹（曾任新兴“吉祥泰”经理）代买金耳环三对带回给家人用。

1949 年 6 月 21 日，朱家英在寄给儿子日旺（宪芳）的侨批信中说，“我现往督亚冷埠广（公）益公司锡矿车部工作……如来信寄香港家驹转来，由乡寄港四毛，由港寄东洋二毛。通信（处）：督亚冷公益转便。”由此可知，朱家英当年是在马来亚督亚冷埠张珠开办的公益公司锡矿车部工作，该公司也成为当地华侨书信的中转站。

百多年来，以爱国华侨张珠为代表的新兴簕竹人就是这样，踏着美丽的锦水，出发、远航、归来、再出发……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异国他乡扎根后，他们又寄回一封封侨批以及大量的洋货、洋银，为家人、为家乡、为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绘就了一幅帆影交错、货如轮转的往返于新兴与外洋之丝路的壮丽画卷。

海外潮侨与中国红色革命概述

文 黄晓坚（韩山师范学院）

潮州是中国著名侨乡，与海外华侨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民初，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东南亚特别是泰国（暹罗）、英属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众多潮州籍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涌现出以张永福、郑智勇、林义顺、林受之、许雪秋、陈涌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华侨仁人志士。民国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更多的海外潮籍华侨青年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无论是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对决的解放战争时期，海外潮侨都大量置身其间，为中国红色革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海外潮侨

潮汕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属潮循道辖区，道台治所在今潮州。虽僻处粤东一隅、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但大革命的浪潮亦不时波及这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政府为反帝反封建、扩大革命根据地，以便继续北伐、统一全国，曾于1925年组织两次东征，进驻潮汕地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25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雷厉风行地推行一系列革命措施。此外，他还在汕头组建了中共潮梅特别委员会，领导潮梅地区的革命活动，推动粤东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值一提的是，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周恩来的倡议，在潮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分校。该校设在潮州城厢太马路（今中山路）中段李厝祠，于同年12月18日开学。至1926年年底，共毕业两期728名学员，其中除国民革命军下级军官外，还有部分学员来自入伍生大队（原在东江及潮梅地区招考的中学生）。他们或与黄埔军校本校第三期毕业生一起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加北伐，或与黄埔军校本校第四期学员一起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从事军事、政治工作，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著名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军队将领。所有这一切，都在潮汕侨乡留下深深的革命烙印，并对海外潮人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极大地鼓舞了潮籍华侨参与国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原籍潮安、1916年出国的新马华侨、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许苏魂，即于1923年10

月回国采访，于翌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于稍后出任国民党缅甸总支部常务委员兼仰光《觉民日报》总编辑。1926 年 1 月，许苏魂回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秘书长兼中共海外总支部负责人。随后，他在广州发起成立全国华侨协会，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同时，他还亲自创办《海外周刊》，任主编。

1926 年 7 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马来亚侨眷、旅游归国华侨叶挺率领 2100 余人作为先遣队首先入湘，为北伐进军立下首功；接着，所部又英勇攻占汀泗桥和贺胜桥，浴血攻入武昌城，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值此革命形势发展的紧要关头，海外华侨毅然回国参战。还在北伐酝酿期间，仅暹罗一地回国参军的华侨就有 300 余人，他们多为潮籍华侨；出师北伐以后，更多华侨青年陆续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阵营，仅经广州口岸回国参战的就有 318 人。他们组成华侨炸弹敢死队、北伐军海外北伐工作团和华侨特别宣传队等各种团体，开展运输、救护、修理枪械等各种战地服务，活跃在北伐第一线。华侨炸弹敢死队有 200 余人，其中来自暹罗的就有 80 多人，许多是潮籍华侨热血青年。他们同北伐军一道英勇作战、顽强杀敌，立下了不朽战功。由许苏魂亲自发起、成立的华侨北伐后援会，也积极组织、号召海外华侨支持北伐战争。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反共清党后，许苏魂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7 年 9 月 23 日，“八一”南昌起义余部攻占潮州，并在潮安、揭阳、澄海等县市建立了革命政权。同月 30 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被迫从潮州撤出，史称“潮州七日红”。在此期间，起义军二十军第三师的司令部就设在潮州西湖之滨的涵碧楼。起义军失败后，许苏魂受派赴香港主办《香港小报》，从事进步宣传活动。

正当潮汕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之际，部分潮籍进步华侨却知难而进、归国从事革命斗争。大革命时期考入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加入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在潮汕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普宁籍进步青年方思琼（方方），国共合作破裂后遭广东国民党当局通缉，一度被迫赴泰国曼谷侨居避难。1927 年 10 月，他回到国内，在潮汕、闽西、闽西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曾任代理福建省委书记。先前在香港办报的许苏魂，也于 1929 年 8 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广西工作，参加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先后担任红七军宣传科长、红七军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第七军政治部主任。1931 年 7 月，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红七军内部开展“肃反”运动，许苏魂被污蔑为“国民党改组派”，遭迫害致死。1945 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为其平反昭雪，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总的来看，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潮州籍华侨参与中国红色革命者贡献极为突出，但群体数量并不多，主要是新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呈现出零星自发的特点。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共在潮汕地区的工作基础较为薄弱，海外地区的侨运工作也尚处于萌芽状态，未能广泛发动海外潮籍

华侨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海外潮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1931—1945 年，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潮州籍华侨与各属籍华侨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慨捐巨款以充军费，或回国效力抗日疆场，为祖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也得到了海外华侨包括潮州籍华侨的大力支援。

在海外潮州人云集的泰国，潮州籍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活动和排日运动。但在泰国亲日政府的镇压下，救国工作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当时，泰国华侨抗日救国团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各自活动、彼此不相统属。日本人即调查指出，暹罗的华侨抗日团体大致上可分为“中央路线”和“共产路线”两大体系，前者大致上为公开或半公开团体，而后者则属秘密机关。公开或半公开团体，主要有中华总商会、潮州会馆（包括各县同乡会）、报德善堂、火砻公会，以及暹罗华侨祖国难民筹赈会、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等；秘密机关，主要有泰国侨党、泰共领导下的泰国各界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其外围组织，以及启明学校、崇实学校等。即使是奉行“中央路线”的泰国中华总商会，在时任主席蚁光炎等一众侨领的领导下，也对中共敌后抗日赞助有加，如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捐助军需物资并与廖承志及何香凝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写信推荐并资助华侨青年盘缠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等。1939 年 11 月 21 日，因积极发动侨众支持祖国抗日，竟招致日伪雇凶当街枪杀。诚如著名党史、侨史专家任贵祥研究员所评价的那样，“蚁光炎是为祖国抗战直接献身的唯一的一位侨领富商，他是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的楷模，其在祖国抗日战争史上及中华民族爱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在法属印度支那，潮籍华侨数量众多，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出生于饶平县高塘乡的吴敬业（又名吴琳曼），幼年便随父母移居新加坡，后辗转马来亚、香港、泰国、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地侨居和开展革命活动。他于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和创办白梅话剧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和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组织。1938 年，他担任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总干事，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遗憾的是，在 1948 年越南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其梅（华裔）等人的大冤案、大错案、大惨案中，吴敬业也牵连其中，几十人被秘密处决，直到 1985 年才由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予以平反昭雪。

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潮州籍华侨青年，为数不少。据估计，抗战期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前后约有 600 人，其中不少人后来前往抗日前线；参加新四军的华侨青年不下 400 人，仅新四军军部各机关和直属支队的华侨就有七八十人；参加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更是多达 2500 人；还有不少华侨青年，则参加了各属籍华侨救乡会组建的各个华侨回乡服务团。这些热血华侨青年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潮州籍。他们一般都是在海外或国内受到进步组织的影响及协助，自行或结伴、成批回国投效的。如泰国潮州籍著名华侨富商

之女钟时，即在当地进步组织的安排下，毅然抛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国参加新四军，其后经历了皖南事变、上饶集中营等种种磨难，仍然矢志不渝。她与许可、林秀兰、林风被称为“四娘子军”。尤其是在1939年暹罗排华、二战爆发后，暹罗、新马侨社进步组织如“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后援会”悉数遭到破坏或被迫解散，返回国内的华侨进步青年更是激增，其中不少为潮州籍。1938年，吴琳曼（吴敬业）、林德兴、许煜、许侠、许一新等22人被捕，经侨领蚁光炎等营救，除贝子端等得到保释外，其余的人于同年3月29日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他们回到汕头后，在潮汕中心县委的协助下，成立了暹罗归国华侨抗敌同志会，由林德兴任会长、许侠任秘书。他们积极发动暹罗归侨侨眷组织华侨救护队，参加抗战救护工作。据吴田夫回忆，抗战期间曾在延安工作的部分祖籍广东归侨干部中，潮属华侨就有45人（包括大埔、揭西籍），具体名录如下：

抗战期间曾在延安工作的部分祖籍潮州的归侨干部名录

姓　名	籍　贯	侨居地
廖　冰（女）	大　埔	新加坡
吴星峰	大　埔	新加坡
周介文（周文）	潮　属	泰　国
叶　克	普　宁	泰　国
苏　兰（女）	潮　属	泰　国
康　明（女）	潮　属	泰　国
苏　青	潮　属	泰　国
叶　驼	潮　属	泰　国
庄江声	潮　属	泰　国

续上表

姓　名	籍　贯	侨居地
詹尖锋	潮　属	泰　国
王　真	潮　属	泰　国
吴　潮	潮　属	泰　国
余丁如	潮　属	泰　国
郑　隆	潮　属	泰　国
黄觉生（女）	潮　属	泰　国
肖　戈	潮　属	泰　国
肖　鲁	潮　属	泰　国
王耀华	潮　属	泰　国
马　松	潮　属	泰　国
黄　礼	潮　属	泰　国
彭光涵	揭　西	马来亚
张　敦	揭　西	马来亚
张　益	潮　属	泰　国
陈远高	潮　属	泰　国
何泽良	揭　西	泰　国
陈展元	澄　海	泰　国
张汉英	潮　属	泰　国
吴田夫	潮　安	新　马
李树坚（女）	潮　属	泰　国
蔡　兴	潮　属	泰　国
庄国英	潮　安	泰　国
庄仲仁	普　宁	泰　国
朱维松	潮　属	泰　国
吴　风	澄　海	泰　国
杨光伟	潮　属	泰　国
李达先	潮　属	泰　国
黄　信	潮　属	泰　国
罗道让	普　宁	泰　国
张精锐	普　宁	泰　国
王健华（女）	潮　安	越　南
谢良英	揭　阳	越　南
杨　烈（女）	潮　安	越　南
周任民	潮　属	越　南
陈戈华	潮　安	菲律宾
林清佐	揭　阳	泰　国

根据吴田夫回忆的《抗战期间曾在延安工作的部分祖籍广东归侨干部名录》一文整理。

在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中的潮籍华侨青年就更多了。当时，由于国共摩擦加剧，通往延安、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道路被封锁，于是他们回国后，多就近加入了新四军特别是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抗日生力军。

潮州籍华侨青年在各个根据地里学习、工作和战斗，不少人成为先进模范人物，受到信任、重用和表彰。如原籍潮安江东上庄村、出生于泰国的庄国英，1939 年与欧阳惠等 12 位华侨青年男女，克服重重困难从曼谷转道老挝万象、越南河内一同奔赴延安，当时年仅 17 岁。他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奋战在泰国曼谷及国内黑山地区一带。原籍普宁的罗道让，担任延安八路军总司令部的伙食管理员、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并被评为延安的模范管理员。原籍潮安的新加坡华侨青年吴田夫，1940 年辗转越南等地来到延安后，长期从事延安华侨联合会等工作，表现出色，抗战胜利后与谢生、罗道让、张上明、曾远辉五人一同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并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其间，延安华侨联合会曾印发《告海外侨胞一封信》，并通过新华社电台用粤语和闽语对外广播，将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的消息告慰海外侨胞。原籍普宁的泰国华裔青年陈惠，1937 年带领一批同学回国参战，同年 9 月在汕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 2 月又带领首批泰国归侨青年 12 人到福建龙岩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抗敌报》记者、新四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在对日伪军战斗中，他冲锋在前、英勇杀敌，多次受到军部表彰，1939 年被新四军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原籍澄海南澳的暹罗华侨陈子谷，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伪军科科长，曾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出国继承祖父的遗产，同时发动侨胞为新四军募捐棉衣。最后，他继承了祖父的遗产折合国币 20 万元，另募得购买一万套棉衣的费用 6 万元，将所有款项国币 26 万元汇给新四军，足以解决新四军上万人两个月的军费和军部当年的棉衣费。为此，叶挺军长在《抗敌报》中谈到陈子谷时说，“他是一个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赤子”。在另一次会上，叶挺还表示，“革命胜利后，我们要打个金牌给陈子谷”。

皖南事变中，数以百计的归侨战士被惨杀，其中就有原籍普宁的新四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陈惠。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他带领战友们浴血奋战，奋力冲出敌人包围圈，在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 21 岁。皖南事变后，仅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于上饶集中营的归侨将士，已知的就有 24 位，其中潮州籍的陈子谷和钟时赫然在列。

在华南东江、琼崖、珠江、潮汕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英勇献身的华侨青年就更多了，其中已知的潮州籍归侨就有东江地区的王丽（钟若潮之妻）。牺牲在潮汕地区的归侨，则有郑松涛、杜家青等。这些血洒抗日根据地的华侨烈士，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足资炫耀的抗日史实，都有一幕极其壮烈的就义场景。他们匆匆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途，实现了舍身报国的崇高理想。

解放战争中的海外潮人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关系破裂，

大规模内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引起了海外侨社的强烈反应，并导致侨社内部的政治分野。在海外侨界进步组织的推动下，部分华侨一改原先对国内政治斗争所秉持的中立态度，而直接归国返乡参加解放战争的热心华侨青年亦数以千计，潮籍华侨自不例外。在支持解放战争特别是华南地区的解放上，潮籍华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948 年 7 月，暹罗曼谷南洋中学陈复悦等 10 名华侨学生毅然取道香港回广东潮汕参加解放军，被编入韩江纵队第十一团，该团后来扩建为闽粤赣边纵第四支队。同年秋，另有 40 多名华侨从泰国回到滇西南边区参加游击队，发展武装力量和解放区，其中多潮籍华侨青年。据不完全统计，南洋爱国华侨以及香港的爱国知识分子先后约有 1000 人回到广东潮汕、梅县等地参加游击战和发展解放区，其中通过组织由泰国输送回国的即有 500 多人。此外，在越南、缅甸和印尼等地，也有华侨包括潮籍华侨进步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创办于 1946 年的香港达德学院，1949 年被港英当局取缔后，部分师生包括潮籍师生亦北上华北解放区，部分则进入华南游击区。

另一方面，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便已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大批归侨包括潮籍归侨，在解放战争时期仍然继续活跃在各个战场上，许多人锻炼为人民解放军的各级优秀指挥员。坚守在华南各地建立根据地的广大归侨包括潮籍归侨，也在配合人民解放军野战军进军华南的行动中立下功勋，涌现出不少著名指战员。如抗战时期历任闽粤赣边区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泰国归侨方方，即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领导华南武装斗争，为人民解放军华南各纵队总指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成长为地方革命武装的优秀指挥员。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潮籍归侨青年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回国参加广东韩江纵队第十三武工队的暹罗归侨陈复悦，随部队在饶平县一带开展游击战，在一次筹粮行动中被敌人围捕，惨遭腰斩而死，年仅 20 岁，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抗战时期回国参加新四军，后任营、团级干部的暹罗归侨郑克，率部参加淮海战役，1949 年 1 月 6 日指挥部队随大军向杜聿明所部发动总攻时，牺牲于肖县赵诗庄，时年 29 岁。其他牺牲的归侨烈士还很多，如暹罗归侨黄清河、林盛谋等。而尤值一提的，是著名战斗英雄林文虎。

林文虎为暹罗归侨，祖籍普宁，抗战时期回国，曾在东江纵队任中下层指挥员。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北撤，他奉命留守当地坚持斗争，领导组建了海上游击队。此后，他历任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第三团副团

坚守在华南各地建立根据地的广大归侨包括潮籍归侨，也在配合人民解放军野战军进军华南的行动中立下功勋，涌现出不少著名指战员。

长，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主力第一、三团副团长，并以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海防队副队长的身份，于1950年5月随军参加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此次海战是中外少有的以小炮艇打大军舰的战例。行动前，我军组建一支火力船队，由林文虎任大队长。行动开始后，他乘坐“解放”号小炮艇，率部担任中路突击垃圾尾岛的首战任务，并很快到达指定海域。此时临近拂晓，夜幕笼罩海面，林文虎果断指挥“解放”号趁着天黑闯进敌舰群，实施“肚里开花”的突袭战术。敌舰猝不及防，远程炮火失去作用，其指挥舰首先被击伤，舰队司令兼万山防卫司令也被击毙。敌舰群龙无首，盲目乱打，又被“解放”号击沉、击伤各一艘。天亮后，敌舰发现我军仅有一艘小炮艇，便组织围攻，“解放”号被迫且战且退，多处受创，最终得以突围，但舰上战士亦伤亡惨重，林文虎不幸中弹牺牲。此次战斗，林文华率一小炮艇突袭敌舰群成功，创造了奇迹，受到中央军委、中南军区和海军司令部的嘉奖。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嘉奖电中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的首次英勇战例，应予表扬。作为人民海军立下第一功的指挥员，林文虎被追认为全国第一位海军战斗英雄，并在珠江口的黄埔岛上立碑纪念。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明确目标，并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海外潮籍侨领的响应。暹罗潮籍侨领蚁美厚（蚁光炎之堂侄）获邀代表暹罗华侨回国参加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庄严的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总之，在历时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海外潮侨踊跃归国参战，国内归侨奋勇效命疆场，爱国侨领回国参与建立新中国，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

纵观海外潮人参与中国红色革命的历程，可以发现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海外潮侨在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大革命时期的许苏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李华、伍治之，到抗战时期的吴田夫、吴敬业，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蚁美厚等，潮籍华侨素有从事华侨工作的传统，在动员、组织华侨参与和支持中国红色革命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二是，潮侨参与、支持中国红色革命，其足迹遍及海内外，而不仅仅局限于潮汕侨乡一隅。海外活动中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潮州人聚居的泰国曼谷、越南西堤等城市。三是，就潮汕侨乡而言，由于这里远离国内政治中心，地方宗族势力较强，侨乡本土内生的红色革命活动比较困难。红色革命的骨干力量，往往借助于海外的输送，或者依靠广州等国内政治中心的培育；而他们在推动潮汕侨乡的社会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海外潮人自始至终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海外潮人参与、支持中国红色革命的方式和规模不尽相同，但他们在中国红色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都是独特的、无法替代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广东革命

文 苏昕宇（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1949 年 9 月前后，人民解放军主力南下两广地区，在赣州与方方、尹林平等率领的华南游击纵队会师。方方在向南下大军介绍广东的情况时表示，自 1946 年 6 月，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在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急遽变化后，用三年多左右的时间，将广东的党员人数发展到三万多人，并将其所领导的各游击根据地军事武装部队扩充至八万人左右，解放了广东境内的大部分乡村与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并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县份初步建立起了“县人民政府”等民主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在远离中共中央，缺乏其他解放区与根据地相应支持的情况下，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精神，借助全国革命局势的变化，因地制宜，根据广东的特殊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独立发展并壮大革命力量，推动了广东革命形势向前进展，为广东全境的解放以及华南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纵北撤后党组织的隐蔽与坚持

受国际国内局势与地方革命形势变化的影响，在国共两党决战角力东北、华北的大背景下，1946 年 6 月，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精神，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为广东抗战旗帜的东江纵队主力以及中共广东地方党部分干部骨干奉命北撤山东解放区。东纵北撤以后，部分坚守在华南等地的中共党员干部骨干，虽然根据中共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要求，基本停止了组织发展与武装斗争，转入“分散隐蔽”状态，然而广东等地的地下革命活动却并未因此全然停止。

早在 1945 年 9 月抗战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后，为免因战略方向的调整，可能出现“亮了北方，黑了南方”，以致广东等地中共党组织受到影响等情况的出现，中共中央即决定调派曾经长期在广东、福建等地工作，有较强敌后游击战争与地下斗争经验，并与南洋等地华侨华人关系紧密的方方，借军调第八小组中共代表的身份返回华南，负责领导广东等地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同时中共中央又以熟悉当地情况，长期坚持东江等地敌后武装游击斗争的尹林平为其副手，予以相应协助配合。

1946 年 7 月，东纵主力北撤后，统管华南等地革命的中共中央南京局（由 1946 年 5 月重庆迁往南京的“中共中央重庆局”改称

而来）。根据方方、尹林平等人关于东纵北撤后，广东各地党组织应在“保持与巩固现有阵地”的情况下，改变革命方式，党员干部以“职业化”作掩护，转入“地下隐蔽”状态，并“停止活动”的建议，决定广东地方党组织在东纵主力北撤后的“总方针和党员的任务”，是在充分利用“国民党地域内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求得生存与“活动的余地”。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指示，坚守华南各地的基层党组织成员，除部分潮汕、粤西等地已彻底暴露的党员干部，根据要求撤往泰国、越南等地，组成“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等，组织当地华侨支持国内革命外。其余各地党组织，则根据中共中央“长期隐蔽，蓄力待机”的指示，将各地党组织领导层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以免相互暴露。而一般党员干部则或就地从事生产，或以职业为掩护，暂时不进行公开活动，相互不发生横的联系，转入地下秘密状态。为对未来恢复武装斗争等问题预做准备，各地保留隐蔽的游击武装人员，部分以乡村“白皮红心”政权自卫队等合法名义活动。部分地区选出精干人员，编为武工队、特务队等，以“灰色面目”或“群众面目”出现，在各地农村秘密保护复员党员与党组，并积极筹集经费，为各地党组织解决“经济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与南京局关于东纵主力北撤后，广东地方党组织应利用香港、澳门的优势条件，积极开展港粤地区城市地下工作，联络并动员南洋等地华侨华人支持国内革命的指示，中共广东区党委机构由广州迁往香港，并成立了与中共广东区党委平级的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港澳工委”）。港澳工委不对外公开组织身份，尹林平以广东区党委书记身份兼任港澳工委书记，同时将部分未北撤的地方党骨干充实到港澳工委，以加强对香港、澳门以及南洋等地的城市地下党工作。可见，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已由从此前主要从事根据地发展与领导武装游击斗争等，转入到主要开展“白区”与城市地下秘密战线工作等。

由于东纵北撤后，广东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与南京局指示，处理应对策略得当，到 1946 年底 1947 年初，大部分分散隐蔽，等待时机的广东各地中共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基本度过了东纵主力北撤后，国民党广东地方军政当局大举“围剿”“清乡”的最艰难时期。同时，广东地方党在港澳、广州等大城市与“白区”的文宣与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中共广东地方党不但完善并扩充了中共党在广州、港九等地的城市地下组织系统，在中山大学等重要文教单位建立起基层党组织。他们还通过各种相对灵活的工作形式，积极支持民盟、国民党左翼组织等在华南、香港等地的活动，力求把“进步的士绅及有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以及中共的“同情者”联合起来，不断扩大中共在华南等地的“政治影响”，以“团结中间群众”。在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民盟南方总支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在广州、香港先后成立，这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共在华南等地统一战线工作的建立与发展，为此后国内形势再次变化，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发展以及武装斗争的逐步恢复预埋下了伏笔。

华南敌后游击武装斗争的恢复

1946 年底 1947 年初，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国共两党调停失败，国共关系宣告破裂，解放战争爆发。由于解放军主力在东北、华北战场上逐步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逐步占据了军事上的优势，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逐步在华南等地恢复农村游击武装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与精神，结合东纵主力北撤后，华南各地保留武装力量较为弱小，两广地区远离中共中央所在地与华北、东北各解放区，难以得到主力的配合与支持等情况，同时考虑到广东地方党组织虽自抗战以来便实现了组织恢复与重建，但未能得到普遍的发展与巩固，干部较为缺乏等问题，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中共广东区党委负责人方方、尹林平等人决定在国民党势力薄弱，革命基础条件较好的闽西南（解放战争时期闽西南等地革命归广东地方党组织统一领导）以及粤桂湘赣等省边界地带逐步“恢复农村武装斗争”。此外，对于恢复后的广东农村武装游击斗争的规模与形式，中共广东区党委也做了具体要求与限制，指出在敌我力量对比相对悬殊的情况下，华南各地恢复农村武装游击斗争初期的基本方针是在“不违反长远打算”的基础上实行“小搞”，以为将来的“大搞”做好准备。

此后为统一各地干部党员思想，进一步做好壮大农村武装游击斗争的准备，1947 年初，中共广东区党委又在香港湾仔召集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湾仔会议”。会上中共广东区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与重新开展南方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广东各地进行武装游击斗争的可能性，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主力北调后，国民党在广东等地的兵力不足，后方空虚，加之“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的“反三征”斗争的普遍兴起，为敌后游击战争的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会上，方方、尹林平等要求华南各地党组织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将工作重心由此前的“分散隐蔽”转向敌后农村游击武装斗争，并要求做好各地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为加强各地干部的斗争信心，会议期间，中共广东区党委还成立了专门的干部教育学习机构，领导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学习，以“提高政治认识，加强斗争信心”。

湾仔会议后，中共广东区党委又向各地党组织印发了《武装工作意见》，就游击战争初步恢复中的发展步骤过程、军事原则、组织形式等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指示。要求广东各地党组织应积极利用“反对三征，维持治安”等“保卫群众利益”的口号，发动农村武装自卫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敌后军事游击武装的恢复与发展，“从为群众生存利益来求得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同时《武装工作意见》指出，由于广东等地国民党方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恢复后的敌后武装游击战的“战斗原则一般应避免硬打，以保存实力为主”。游击战争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边境山区和重要交通线上”。至于游击武装活动的具体恢复过程则以“现有基础建立一个精干的主力，该主力一般的要恢复政治教育生活，有制度、有训练，大批训练中下级各种干部和加强技术教育”。

为配合解决敌后武装游击斗争的恢复后，各地干部党员较为缺乏等问题，中共广东区

党委另决定，将此前集中在广州、香港等大城市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党员“分批集中，加以短期训练”，在坚定其革命信心，并作充分“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后，“根据各地需要分配回去部队工作”。为此，中共广东区党委又连续在香港举办了五期干部党员训练班，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广东区党委关于恢复与发展敌后武装游击斗争的指示精神，以及游击战争的战术和群众工作的路线与方法等，统一思想与认识，坚定信念。参加训练班毕业的干部党员，陆续被派回广东各地，领导并参加华南各地武装游击斗争的恢复与发展，成为华南各地武装游击战争的骨干。

事实上，由于广东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依靠全国局势变化，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地制定了恢复广东武装游击斗争的策略与办法，经过广东全党各地干部党员的努力，到1947年5月前后，除琼崖岛以外，东江纵队此前主要的活动区域粤赣湘边、粤中等地的敌后武装游击斗争基本得到了初步的恢复与发展。因电台丢失，东纵主力北撤后长期与中共中央、广东区党委失去联系的潮梅闽西南等地党组织，亦与驻香港的中共广东区党委机关恢复了通讯联系，并在粤东等地为未来敌后游击斗争的重新恢复与发展作了初步准备。至于一直与中共中央、广东区党委通信顺畅，东纵主力北撤后坚持游击武装斗争未停止，有一定基础条件的南路等地的中共党地方组织，更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有三个主力团，五千余人枪的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可见这一时期，在内外条件变化的大背景下，广东地方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因地制宜，调整方针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武装游击斗争在广东各地逐步得以恢复，考虑到中共广东区党委既要领导各地农村的“敌后武装游击斗争”，且作为离解放区与中共中央“最远”的“蒋管区党组织”，地处与英美各国及其他各种政治势力打交道最频繁的香港“第一线”，又要因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有和平斗争，更有两面斗争；有公开党，有秘密党，更有兄弟党；有公开刊物，有秘密刊物，更有中间性刊物；有下层群众团体，有上层统战团体，更有广泛的华侨团体”，“不但对南洋、两广方面，对欧美联络方面亦日渐重要”。中共广东区党委的原有“组织形式”已不再能够适应新的工作形势，“领导机构需要适当调整”。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中共广东区党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分别任命方方、尹林平为正副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同时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发生必要联系，并受后者指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下辖分管香港与南洋等地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工委）、分管华南各城市地下工作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又称港粤城委）以及分管农村游击武装斗争工作的各地区党委，统一领导华南与南洋等地的“公开与秘密工作”。此后，东江纵队主力北撤以来，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分散隐蔽”“各自发展”的局面，得以重新调整与规划，这为此后广东各地中共党组织以及敌后军事游击武装斗争工作的发展与扩张，尤其为敌后大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率领下，越过陇海路，“千里转战”大别山。

各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壮大发展

1947 年夏，由于解放军主力在华北等地经过一年左右的内线作战，开始在国内战场上取得主动优势。鉴于广东各地武装游击斗争经过 1946 年底 1947 年初以来半年左右的恢复与发展，已初步取得一定的成效。为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新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一方面对华南等地的敌后游击武装斗争作了整体上的部署，要求广东各地中共党组织应在群众基础较好、地势合适、且有一定组织军事力量以及“上层关系”的地区，“展开群众性的广泛游击战”，“建立边界游击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在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以及闽粤赣边革命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游击战略”单位，并正式提出广东各地党组织应“依据自己现有武装力量，组织力量，半年内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创造主力及比较大的据点，以准备迎接与配合明年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上述计划与部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要求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应依靠本身力量于本年度建立三四个成块的根据地，组织起民众成为坚强的游击队伍”。在收到中共中央与叶剑英等人的回复与指示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陆续对广东各地的党组织机构作了调整与充实。香港分局派出一批有较强斗争经验、熟悉当地社会情况的干部分赴广东与各省交界的地区，建立健全当地党的组织领导机构，加强各边区地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扩大发动武装游击斗争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各地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此后广东各地的党组织建设与武装游击斗争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以及闽粤赣边等“游击战略”根据地开始初步成形。

就在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展根据地并扩充敌后游击武装力量之时，1947 年 9 月前后，国内局势再次发生变化。根据中共中央部署，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率领下，越过陇海路，“千里转战”大别山。同时，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陈毅、粟裕等的指挥下，由山东解放区南下豫苏地区，转入大规模的外线反攻。由于国民党在华北、中原等地军事上有陷入危险的可能，为巩固国民党在两广地区的统治，加紧对作为主要战略后方广东等地的经营，1947 年 9 月，蒋介石任命其嫡系亲信宋子文取代粤人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并接替粤系将领张发奎等人，兼任广州行辕主任与广东省保安司令。

同年 10 月，宋子文抵达广州后，为强化对广东等地的统治，他一方面大力推行“黄埔、榆林开港”以及开采粤北煤矿、筹划海南铁砂外运等“经济计划”，力图加强广东与英美各国的经贸关系，以获取更多外部资源，补充国民党发动内战造成的财政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为“安定华南，支持华北、华中”，宋子文又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广东各地中共游击武装的“清剿”方案，决定起用

部分失意政客与军人，扩编广东全省的地方保安部队与警察、自卫队等武装，并加紧对其进行整训。同时，为解决国民党广东地方军政当局派系林立的问题，统一广东全省政军大权，实现其完全剿灭“广东境内共产党”的计划，宋子文又对国民政府在广东设立的各类党政机关等作了相应调整，并按全省原有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了“清剿”区，成立了各地“清剿”司令部，强化并展开了对广东各地中共游击武装的“分区扫荡”与“重点进攻”等行动。

为应对宋子文主政广东后推行的一系列军事“清剿”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宋子文“主粤”后，应尽量对其“阴谋”予以“揭穿”，同时加强对广东等地农村游击武装力量发展与港澳、南洋侨胞“反蒋反美运动”领导的指示，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召开了各地党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分析了刘邓、陈粟大军南下转入外线进攻后的国内形势，并对广东各地游击区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全面布置。此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又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粉碎蒋宋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以下简称《二月指示》），指出为促进与迎接“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使中共广东各地党组织在与宋子文的“竞赛中仍然处于有利的情况”，同时为巩固广东取得既有革命成绩，以“配合南征大军，结束蒋宋在南方的统治”。广东各地党组织除在军事上应“普遍发展”并力求建立游击武装主力外，更应在游击根据地巩固区内大胆吸收贫雇农入党，建立“农会”，并组织民主政权。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二月指示》发出后，无疑对广东各地中共游击武装反对宋子文的“清剿”行动起到了指导作用，也使主要活动于广东各边界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得以将根据地扩展至江西、湖南、广西等邻近省份，并为稍后华南等地中共游击纵队主力等的建立预埋下了伏笔。同时在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与扩张的基础上，各地党组织又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巩固并发展根据政权的指示精神，积极组织建立民主政权，推行“公私两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财经政策。以上措施的实行，基本解决了因国民党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造成的各根据地长期经济困难等问题，这为此后华南地区中共党组织与游击武装力量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华南主力游击纵队的成立

1948 年 9 月，随着解放军主力在全国各地战场上逐步反守为攻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东野、华野、中野解放军主力军在东北、华北等地先后组织了辽沈、平津与淮海三大战役及其他若干重要战役。至 1949 年 1 月前后，人民解放军基本消灭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出现重大转变。1949 年元旦，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 1949 年 1 月初先后向华南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出指示，明确提出了“迎接并配合南下解放大军”“彻底解放全华南、全中国”的“十大行动纲领”，并对今后广东革命的总体发展势态作了重新布置与调整。

为大力发展广东等地的敌后游击战争，

提高中共华南敌后军事游击武装的战斗能力，努力使各地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变，以便更好地配合解放军主力南下作战。根据全国与本地革命形势的变化，结合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特点，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党组织、军事力量与群众基础较好”的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滇桂黔边等游击边区，组建解放军主力游击纵队的计划。此后，中共中央陆续批准了中共香港分局的上述请求，并要求广东各地新成立的“游击纵队”应依照敌情的不同，采取“或分散或集中”灵活多变的形式开展对敌作战。

到1949年1月以后，解放军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滇桂黔边等纵队陆续宣告成立。随后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是南方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大发展的一年”和中共香港分局关于“全面发展，重点巩固”“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南下”的方针，华南各边区主力游击纵队开始主动向国民党发起春季攻势，不但基本打破了国共内战以来国民党对广东各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封锁”“分割”，收复了宋子文“清剿”时期被国民党“进占”的多处地区，拔除了国民党在各边区游击根据地周围设立的诸多据点。各边区主力游击纵队还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初步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并初步形成了广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与此同时，为准备迎接“南下解放大军的到来”，1949年初，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也对穗港澳等地城市的地下党工作进行了部署。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加紧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的意见》，要求香港、广州等地的中共城市地下党组织应将精力“主要放在培养城市干部及研究城市指示，准备大军到达时，能动员五千知识分子下乡，同时培养行署行政干部”，并做好对“广东省级政权机构、银行、贸易公司、侨汇等状况”的研究与了解工作，以积极培养财政、经济方面的干部，为南下解放大军到来后广东党能够顺利配合其接管大中城市与乡村政权预做准备。此后，各地党组织，尤其城市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对上述工作的开展与实施。

就在广东各地中共主力游击纵队的春季攻势取得一定成绩，广东各城市地下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时，1949年4月，国共“北平和谈”宣告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和平条件。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此后，解放军主力发起渡江战役，横渡长江，先后攻占江南的南京、上海等地，并迅速向华南、东南沿海各地挺进。为进一步扩大广东等地的游击区与根据地，建立华南解放的“总基地”，根据形势变化，1949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下辖闽粤赣边、粤赣湘边等五个区党委以及粤中临时区党委等中共地方党组织。同时，分局机关与负责人方方等由香港移至粤东解放区，并将主要工作任务完全转变为领导广东敌后游击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以全力配合“不久将来”全华南的解放。至于此前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与方方等兼管的港澳南洋等工作，则交由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与乔冠华、饶彰风等专职外事干部负责。

1949年5月7日，新成立的中共华南分局向华南各游击纵队与各边区根据地党委发出《对大军渡江后华南工作的布置》的指示，要求华南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应在大军未

到以前，“必须将农村完全解放，控制在我们手内”，使各游击战略根据地，尤其使解放大军南下经过的重要交通节点地区“粤赣湘边”解放区与“闽粤赣边”解放区“联成一片”，以便“到时大军可集结力量解决城市工作及追歼残敌，不必分兵帮助我们下乡，肃清残匪”。与此同时，该指示亦再次对“准备大批城市干部”、训练革命青年“以便大军到达时，交给军管会使用”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与要求，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又分别发起了东江上游地区与潮普惠南平原等战役，并通过各类统战关系策动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等陆续起义。到1949年6月前后，随着中共华南游击纵队在粤东、潮汕等地的“不断胜利”，东江、韩江游击区基本连成一片，达到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制定的造成有利态势以“迎接解放大军”的目标。此外，华南各边区游击根据地与解放区，也陆续建立起了民主政权，并着手加紧对各种接管城市干部的培训与培养。这为华南各游击纵队最终实现“集中主力，向广州、韶州、赣州三线的方向举行进攻，扩大军队及地区，以迎接第四野战军的到来，并准备于十一月、十二月或一月间占领广州”，彻底解放华南，创造了条件。

广东解放与华侨华人

解放战争爆发以来，在远离中共中央，难得解放军主力与其他根据地直接支持与援助的情况下，中共革命在广东，经历了东纵主力北撤后的“分散隐蔽、长期埋伏”，宋子文主粤时期的有计划“清剿”，以及华南敌后游击武装斗争的逐步发展与壮大。到1949年8、9月解放军主力南下两广地区前，不但中共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且其领导下的军事武装人员，亦由解放战争初期的千余人，扩充至八万余人，并建立起了数片大块的战略游击根据地，成为解放全华南地区的重要组成力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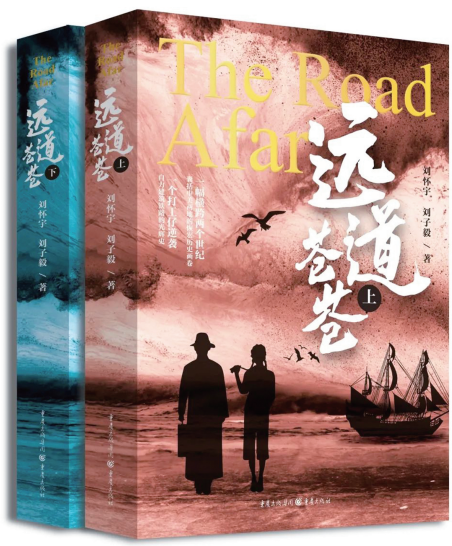
而上述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系受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与国共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尤其受中共革命在华北、东北等地不断高涨而推动所致。但另一方面，这其实亦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能够服从中共中央领导，努力根据中共中央按照时局发展制定的各类南方革命指示与方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本地的革命策略有关。这表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革命在广东的成功，无疑系依靠全国局势与因地制宜两种动因所合力的结果。

除此以外，也可以看到华侨华人在广东解放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首先，就东纵北撤山东的人员中，有许多干部战士为归国华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为保家卫国返回家乡，投身民族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又顾全革命大局，远离他乡继续革命。其次，解放战争时期，华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南洋、美洲等地众多爱国华侨以及港澳等地青年同胞，他们或捐款、捐物，或积极参加华南各地游击武装、地方党组织，为华南以及全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党史特别委托项目）“中共领导的粤港澳三地抗日救亡斗争历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D19TW02-08】

《远道苍苍》：一部非虚构的虚构小说佳作

文 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远道苍苍》
刘怀宇　刘子毅 著
重庆出版社

海外华人作家刘怀宇、刘子毅的长篇历史小说《远道苍苍》于 2021 年 3 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笔者多年追踪阅读和研究海外华人作家的华文文学写作，比较了解海外华文文学包括美华文学、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和名家辈出的情况。正是由于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及其写作的了解，才更加能够体会和发现《远道苍苍》这部长篇小说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远道苍苍》成功重述华人移民的历史和重构海外华人返乡创业的故事，正如小说简介中所说：《远道苍苍》打开了“一幅横跨两个世纪、囊括中美两地的恢宏历史画卷”，作家“以清婉的笔调、悲悯的视角描绘了清末民初的华人企业家陈宜禧的传奇人生，以及与之交汇重叠的中美近代史上各色人等际遇”。

《远道苍苍》打开了“一幅横跨两个世纪、囊括中美两地的恢宏历史画卷”，作家“以清婉的笔调、悲悯的视角描绘了清末民初的华人企业家陈宜禧的传奇人生，以及与之交汇重叠的中美近代史上各色人等际遇”。

父女薪火传承的写作

《远道苍苍》之所以能成为一部非虚构的虚构小说佳作，与这个小说特殊的创作过程不无关系。它是由父亲刘子毅、女儿刘怀宇两代人薪火传承方才完成的著作。阅读小说，感觉分明就是一位（视角和叙述很统一，显然是一位作家的写作，看不出是两位作者）

既有历史视阈又心浸人间爱的暖意的作家，在娓娓叙述那段历史和故事，也能觉出故事叙述中隐隐约约透出的、掩藏不住的刘怀宇细腻和宛致的笔法。

父亲刘子毅，又名刘兵（1932—2015 年），1990 年移民美国前，曾任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广东教育学院学报》主编等职。刘子毅本身就是作家，兼又祖籍广东台山。由此可见，作家对于家乡总是能够有着别人所不能够具有的情怀，和对于故乡物事人情、历史人文细节等方面的了解。

刘怀宇在 2016 年 7 月和 2019 年 5 月两次走访台山，在父亲曾经生活过、再往前追溯则是小说男主人公陈宜禧也曾生活过的台山的田野山庄——这些故乡重游，触手可及的观感，的确可以成为刘怀宇后来面壁码字时的依傍——情感、素材、细节和文学的想象。正是由于有了家乡的可触、可摸、可感，身在家乡台山的刘怀宇才会产生这样的恍若隔世之感：回头望去，大概是在福安里，浩荡谭江边上的福安书室的废墟前，我仿佛听到了“章叔”私塾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我凭空构想的女主人翁“阿芳”（笔者注，沐芳），似乎也从一团模糊的意象中现出秀美的身姿、清亮的眼眸。

重述华人移民历史和重构中国故事

刘怀宇，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英美文学系，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硕士学位和电脑科学硕士学位，曾在美国硅谷任甲骨文公司软件开发经理，现为洛杉矶高科技创投基金合伙人。这样的成长经历和受教育背景，让她在写作上起步即是高点，她能够重述早期中国移民的历史和重构清末民初华人返乡创业的故事，与她自身的这些素质和条件不无关系。

《远道苍苍》分上部、下部，上部重述主人公陈宜禧和族人乡邻一起去金山“淘金”的历史，下部重构功成名就的陈宜禧作为华人企业家回乡，历尽各种阻碍和困难建成新宁铁路的“中国故事”。粤地民众在清末的出洋捞金潮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被作家以散发着南粤特色的乡间小调一样的从容、淡定，自然流淌在笔端，形成《远道苍苍》那虽久远却并不失一份田园乡间小夜曲气息的历史文化记忆。历史要靠具体的人物，阿禧哥、沐芳、明叔、道叔爷、养母、含章叔（沐芳的父亲陈含章）等，这些人物身上所负载的故事，才形成了那段历史。而陈宜禧去西雅图之后的所历，有他的独特性，也部分折射和真实反映着华人在美国的一段屈辱史、艰辛创业史。

非虚构的虚构小说佳作

前面已经提到，《远道苍苍》最为别致之处，其实在于它是一部非虚构的虚构小说佳作。

刘子毅先生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几乎全部都是陈宜禧六十岁后回台山创办新宁铁路的二十五年——由此也可以看出男性写作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写作对象，是有他自己的素材爱好和选择角度的。但光有这些，并不能创作出目前所见这上下两部的《远道苍苍》。刘怀宇在《远道苍苍》后记里，尤其后记的“寻访”一节，详细介绍了她如何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优势资源——通过美国庞大的图书馆联网系统，调阅了那些实物已经不能碰触，只能以缩微胶片形式

让你觉得既分明是在阅读一部情节动人的小说，无时无刻不被小说悠远曲折、深深的故事性所吸引——它攫住你的目光，让你不能不读下去；又仿佛是在读一本关于爱和真诚的书，或是关于爱与温暖的生活和生命的叙事诗。

来展示的珍贵史料原件的图片。

刘怀宇这样形容她调阅史料时的激动心情：“那仍然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图书馆的幻灯机上，翻动一张张泛黄的幻灯片，仿佛是透过岁月的云雾，一段段辨认着那些朦胧的黑墨花体字。而同时，横隔在我和陈老前辈之间一百多年的时光，在一分一秒地融化。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如墨迹般晕开，渗进我所在的时空。”

《远道苍苍》上部，陈宜禧领着华人，在西雅图与白人开展修铁路的竞技比赛。这部分被刘怀宇写得妙趣横生。即便历史上确有类似的事情，作家如果缺失很好的小说艺术虚构的能力，也是很难写得生动感人和引人入胜的。《远道苍苍》下部，整个都可视为是新宁铁路的建成史。清末民初和民国时期的物事人情丝丝缕缕如在眼前，匪事、官宦的倨傲不为欺压商人、派系勾心斗角、商人的诡谲阴毒暗设陷阱，等等，防不胜防，让下部跌宕起伏，悬念不断，大小悬念层叠相扣，读来令人意犹未尽。

非虚构的、历史的真实，与虚构的真实和艺术性的真实，如缠绵深挚生死相依爱人的爱意一般，泯然不分、浑融交织在了一起——这是《远道苍苍》这部小说有所成功有所建树，并且永远都不能、也不会被其他作品、其他小说掩蔽光辉的可贵价值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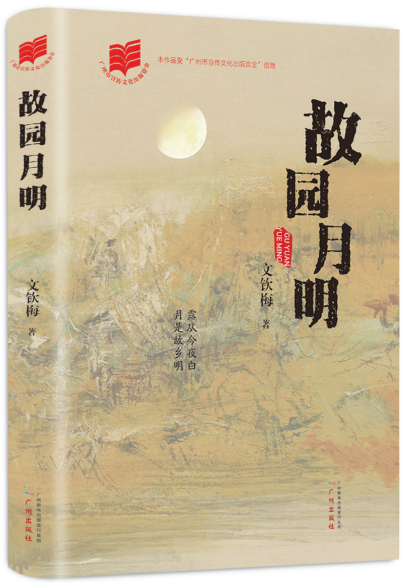
爱与真诚的写作

《远道苍苍》不仅没有历史小说惯常会让人产生的距离感，没有纪实小说报告文学常常罹患的因艺术性不够而或轻或重显出那种生活原生态难祛的粗砺，完全没有显出由于作家化生活的能力不够或者虚构性艺术性、文学想象力的欠缺而让你阅读时感觉时时被文字和叙述推开的那种阅读拒斥感。反而是让你觉得既分明是在阅读一部情节动人的小说，无时无刻不被小说悠远曲折、深深的故事性所吸引——它攫住你的目光，让你不能不读下去；又仿佛是在读一本关于爱和真诚的书，或是关于爱与温暖的生活和生命的叙事诗。

读《远道苍苍》，会不由自主随着小说情节和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愁爱恋一路前行，停不下来；却又不得不靠理性的提醒，强迫自己时或停下来，做了一份密密麻麻、相当细致的阅读笔记。面对这样一部历史厚重感与人心人性温暖爱意同在、兼具和并生的作品，我不得不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写作和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世事人心的千难万险当中，惟有真爱与人心温暖永存。

《故园月明》里的拳拳赤子心

文 李非（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



《故园月明》
文钦梅 著
广州出版社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长期不变的。

四年前的夏天，我应邀在广州做了一场题为《中国台湾问题与祖国统一前景》的讲座，该题正是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同志接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学系教授杨力宇谈话时的要点，演讲中不少谈及杨力宇教授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做的贡献。

这次授课巧遇杨力宇教授外甥女文钦梅女士。讲座结束后，文钦梅告诉我，她打算把杨力宇的曲折人生以及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故事创作成一本书。但她对当前云谲波诡的两岸关系和“一国两制”方针把握不准，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长期不变的。

我在厦门大学从事台湾问题研究近40年，每次谈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总会联想到杨力宇教授，他虽然身在海外，但他对祖国是一往情深的眷念，尤其是受邓小平接见后，他深谙自己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学者的使命，自愿担负起重任，向国际社会宣传“一国两制”的构想，常年来往于北京、台湾、纽约、华盛顿之间，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及在“台湾政界”的同学关系，发表演讲，著书立说，反对“台独”。杨力宇付出的精力和心血，可谓天地

“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杨力宇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对故国的执着情怀，一头扎进书堆，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国际关系，成为一位面壁功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著书向美西方推介中国国家领导人。

可鉴，即使在遭受台独分子的威胁和诽谤时都不改初衷：“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都很爱，我一直希望两岸能实现和平统一。”

虽然如此，但我对杨力宇的成长和家庭背景的了解仅是冰山一角。他 15 岁已离开中国大陆，在外漂泊了七十个春秋，依然保持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其成长的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家庭原因和历史背景。文女士想写这本书，我觉得很有价值，这对研究杨力宇教授和两岸关系无疑是一个鲜活的补充。

如今，文女士完成了该书创作，她恳切邀请我写推荐语。我阅读完书稿后，掩卷沉思，仿佛看到动荡年代大背景下，一个海外赤子成长的艰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杨力宇的爷爷杨朝星是清末年间的绅士，其父亲杨祖诒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官费留学生，在 1928 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后，他满腔愤怒，参与组织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毕业后，毅然放弃日本优渥待遇回国，报效祖国。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他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跟随郭沫若厅长从武汉辗转重庆，在抗战一线对日军开展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满怀喜悦回南京，殊不知，国共和平建国谈判失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中国又进入了战争状态，以蒋介石失败告终，后果波及国民政府无数大小官员。杨祖诒想着，当年自己回国是为了抗日，现在，日本赶走了，国家统一了，难道又要离乡背井？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不愿意去台湾，但他担心自己的身份影响儿子学业前途，便托亲戚带杨力宇去台湾求学，从此，杨力宇一人漂泊在外。“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杨力宇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对故国的执着情怀，一头扎进书堆，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国际关系，成为一位面壁功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著书向美西方介绍中国国家领导人。改革开放后，他一次又一次回国考察，向美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新政策、新面貌，为中美建交铺路搭桥，由于他的大陆和台湾双重背景，被选为卡特总统班底的中国事务顾问。中美建交后，杨力宇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上。1983 年 3 月，杨力宇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大陆和台湾两岸的知名学者出席会议，这个敏感的话题受到美西方国家学者的瞩目，引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重视，三个月后，邓小平会见了杨力宇，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佳话。

杨力宇虽在中国大陆生活时间不长，但他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时刻不忘中国。他毕生都在研究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令人敬佩的。

最后的枕水人家

文 卢锡铭（广东省期刊协会原会长）

去乌镇转了一圈，仿如叩问了岁月流年的一场梦境。乌镇，跟我童年的珠江三角洲水乡小镇有太多的相似，勾起我不少亲切的回忆，但乌镇比起我儿时那水乡小镇，更显几分玲珑，几分清丽，几分委婉，几分古拙，别具另一番画意与诗情。

乌镇，地处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绕镇而过，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之一。“吴疆铁马越界戈，秦时明月汉时风”，一一存放在古镇的记忆中。乌镇，古名乌戍，秦时以车溪为界，西为乌墩，东为青墩。唐咸通十三年（872 年）的《索靖明王庙碑》是乌镇以镇为制最早的记录，从此便与青镇隔东溪（今市河）遥望千年，直至 1950 年 5 月，这隔河相恋的两镇合二为一，正式定名为“乌镇”。

在江浙走了一遭，我发现，水是江南的毓秀所在，水是江南的灵性所钟，乌镇更是如此。她是用水做的，用水造桥，依水建镇，各处石栏拱桥，深宅大院，过街券门，河埠廊坊，临河水阁，驳岸跨步，处处呈现水乡浓浓的生活气息，把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演绎得淋漓尽致。

走进乌镇，你会很明显感到镇上水系呈“十”字形，将乌镇分为东、西、南、北四栅与枢纽——中市。户户凭河而居，粉墙黛瓦，



江南水乡——乌镇

前临街，后枕河，街是石板小街，河是清澈小河，出门过桥，进门涉水。乌镇最独特的建筑是水阁，所谓“枕水人家”指的就是这种建在河面上的“水阳台”。它使民居的一部分延伸到河面，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栋梁，搁上木板，便是“水阁”了，水阁三面墙均有窗，窗台栽满花草，我们凭窗而眺，市河风光尽收眼底。临河而卧，可听水声浅唱低吟。土生土长的茅盾在他的散文《大地山河》中这样描述过故乡的水阁：

……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

茅盾所说的橹声，便是乌篷船的橹声，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就读过周作人写的散文

《乌篷船》，他用书信的形式写他老家绍兴的“乌篷船”，它如诗似画地刻在我的心中，这次来到乌镇所见所闻比周作人笔下所描绘的更为真切。乌篷船，实际上在船中用竹篾搭了一个帐篷，然后抹上一层黑漆，既可挡风亦可遮雨，还可一边品茶一边看周遭的风景，仿如在水上搭了间能移动的小屋，别具一番情致，你亦可躺在船上小憩，枕着悠然的水声入梦。乌镇的乌篷船真多，多得如过江之鲫，在市河上穿梭着，划出一道道皱纹，流溢一首首声韵，成了乌镇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们在埠头上一招手，一艘乌篷船便轻柔柔地贴了过来。船娘是一位穿蓝底白花衣裳的俏姑娘，留着长辫，披着头巾，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就像河水般水灵。她轻摇着橹，唱着吴侬软语的歌谣，小船悠悠划向远方，乌镇的景致也一一扑面而来。首先闯入眼帘的是桥，如果说水是乌镇的血脉，桥则是乌镇的筋骨，据说乌镇历史上桥最多时有 120 多座，而今还有 40 多座古桥。通济桥、红济桥、太平桥、南平桥、人寿桥、永安桥、福兴桥……这些苍老的古桥连接着彼岸此岸，支撑着古镇古拙的风情。

有桥的地方，总是一幅即可捕捉的画景，乌镇最美的古桥风景莫过于“桥中桥”。一是丁字桥。它由通济桥和仁济桥组合而成，一桥南北走向，一桥东西走向，两桥直角相连，无论站在哪座桥边，透过桥孔都可以看到另一座桥，小船划过桥洞，水面两个半圆形的桥孔倒影，会晃晃悠悠地把你包裹起来。二是逢源双桥。这是一座别具风味的古桥，因桥上有一廊栅，所以又称廊桥，桥下有水栅栏，是古时水路的进出关口。传说踏步双桥有男左女右的习俗，走一遍桥，须得走左右两边，因此演绎出



乌镇水乡景色

走此桥便可左右逢源之说。

若是天下起微雨，乌镇则是一桥一桥的花伞，其状如河上架起一道道彩虹，那种斑斓的色彩，那种朦胧的烟雨，那种江南女子轻盈的步履，是画？是诗？是声韵？反正美得令人叫绝！

乌镇乍雨乍晴，雨后一抹斜阳照在市河上，河面上仿如飘下万片枫叶，在碧波中沉浮晃动，这使人想起大诗人白居易《忆江南》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意境。

当乌篷船进入一道水街，只见粉墙黛瓦壁立两岸，偶尔会听见“吱呀”一声，粉墙推出一扇窗户，从窗里露出一张娇俏的脸来，她跟窗台上的杜鹃融为一体，真分不清哪是丽人哪是娇花。几乎每幢人家都有一个埠头，有少女在捣衣，有妇人在洗菜。埠边的木桩系着一叶小舟，随着水波在晃动着。呵，这多么像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啊，不过威尼斯的小船是贡多拉，摇船是意大利小伙子，唱的是高亢意大利民歌，乌镇乘的是乌篷船，摇船的是船娘，唱的是吴侬软语的民谣，相比起来乌镇少了点阳刚色彩，却多了点阴柔之美。

乌篷船进入西栅，我们还可以看到“水上戏台”，这戏台在老街的北侧，建筑在水面上，它跟东栅的古戏台，一个水上，一个陆地，供昔日乌镇和临近一带居民和乡民观戏和娱乐的地方。西栅还有“水上集市”。每天清早，船夫摇着小船，载着新鲜的瓜菜、生猛的河鲜和肥美的家禽，来到四通八达的河道出售，临河的居民只要一声吆喝，船夫就会把船摇到水阁边。

上了岸，我们在古街上溜达，因刚下过雨，青石板小街湿漉漉的。倘若是清晨，那木屐敲打青石板的声韵，一定会清脆地闯进枕水人家那一帘幽梦中。我们可以到老街逛一些“博物馆”或“百年老店”，到东栅老街参观“江南百床馆”“宏源秦染坊”，到西栅老街“老邮局”和“三寸金莲馆”，一睹江南水乡的民俗风情。

乌镇的繁荣靠的也是水，绕镇而过的京杭大运河，是古时航运的大动脉，如同现在的高速公路。乌镇是杭嘉湖水路交通要津，近通周边二省八府七县，远达京杭乃至四海。苏绣、杭锦、濮绸、湖绢、沧州红枣、岭南佳果，百货云集，聚散其间。河埠上船艇穿梭，商客如流。这财路通达三江，这河埠系联五湖，这小镇连着大市场。遥远的水上丝绸之路，这里也是一个起点。

乌镇的土地，也是水冲积而成的，如它的名字一样黑沃，是盛产白菊与丝绸之地，没有沃土就没有桑基，没有桑基就没有丝绸。江南的丝绸，就是靠这些小码头通往四海的。明清时，乌镇东、西、南、北栅连成一片，“民物藩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不仅仅埠头遍布，店铺林立，镇上一度出现多家典当行，据《乌青镇志》中记载，最多时达 13 家，窥一斑而知全豹，由此足见小镇的繁华。她像一颗含着水样光华的明珠，嵌在省城杭州、古城苏州与现代大都市上海之间，玲珑剔透，熠熠生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乌镇以水的灵性润泽了一批英才。自唐至清，乌镇以弹丸之地共出举人 161 名，进士 64 名，钦点翰林 2 名，可谓文风长盛。昭明太子、沈约、裴休、陈与义、鲍延博、夏同善、严辰、茅盾、沈泽民、严独鹤、孔另境或生于乌镇，或游学乌镇，或寓居乌镇，均与乌镇结下不解之缘，使乌镇赢得“郎中码头”之誉，杰人灵地，



烟雨朦胧中的白莲塔

相得益彰。这批人都有脍炙人口的故事，挑晚清和当代的两位代表人物说说吧。晚清是夏同善，当代是茅盾。

夏同善有“翰林第”在乌镇，它位于中市观后街，原是一般民居，夏同善被钦点翰林并获赐“翰林第”以后，经整修已成为一处集传统民居和园林为一体的富有人文气息的景观，我们虽是走马观花，但从中品出清末江南小镇大户人家的生活况味，因江南一带广为流传《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为这“翰林第”平添几许传奇色彩。

夏同善并非乌镇人，但是饮乌镇的水长大。夏同善（1831—1880 年），原是杭州人，幼年丧母，父亲夏建寅续娶乌镇萧氏，夏同善视之如生母。父亲仕途失意，遂弃儒经商，夏同善随母在外婆家，夏从小酷爱读书，竟遍读外祖父所藏经典，与胡雪岩有交往。1855 年，夏同善中举人，次年咸丰六年（1856 年）进士及第，选庶吉士，钦点翰林并赐“翰林第”匾。夏同善因念自己得以读书皆赖萧家，就把御赐的匾额挂在外婆家的大厅上，自此翰林第就成为乌镇最吸引人的古宅名居。

夏同善善写文章，时人誉谓“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甚得慈禧太后赏识，曾命他和翁同龢一起为光绪帝侍读，同治十二年（1873 年）以审理杨（乃武）葛（小白菜）冤案出名。该案省、府、县三级七审，屈判成冤案，次年杨乃武姐姐赴京告状，活动浙江籍京官帮助申冤，夏同善等 28 名官员联函奏请刑部复审，获慈禧恩准，三年后“杨葛冤案”真相大白，参与该案数十名贪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事被后人编成评弹，广为传颂，夏家名声得以远播。在乌镇观前街和新华路交界处，有一座清代古宅，便是茅盾的故居，门楣高悬陈云题写的“茅盾故居”匾。故居前后有两幢房屋，屋边有一小庭院，内栽棕榈、天竺、冬青、扁柏和果藤，给人一种四季常青之感。其书房窗明几净，虽处市中，却是闹中取静环境幽雅的地方。故居是茅盾曾祖父 1885 年在汉口经商时寄钱回家所购，茅盾的童年在此度过，13 岁踏上到湖州读中学之路，1913 年茅盾考到北京大学预科，1916 年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 年开始文艺创作，中篇小说《幻灭》是他的处女作。据说茅盾回乡时，用刚收到《子夜》的稿费，翻建了部分居室，他亲自画出草图，请人督造，庭中棕榈和天竺就是当年茅盾所栽。茅盾少年所读的立志书院在茅盾故居东侧，是邑绅严辰于 1865 年创建，现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半身雕像放在厅的中央，故居共有珍藏品 276 件，现已移到立志书院展出。庭中分布梅兰菊竹，颇具书香品位。大门的门楣上嵌着“立志”两

字，两旁的柱联分明是院名的注解：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

茅盾（1896—1981 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很早参加革命，1927 年大革命失败，被迫隐居上海，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幻灭》，许多报社都不敢登他的文章，于是他用“矛盾”笔名投稿。稿子最后交给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叶圣陶认为小说很好，但觉得这个笔名是个哲学名词，且在当时用这尖锐的笔名不好，就自作主张改作“茅盾”，以后茅盾就一直用此笔名。《幻灭》发表之后，与之相继问世的《动摇》《追求》合名为《蚀》三部曲，引起强烈的反响。1933 年的长篇小说《子夜》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在《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乌镇的影子，读到乌镇的方言，闻到乌镇的气息。

茅盾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正如著名作家张光年所说：“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完美结合。”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 年 7 月蒋介石对革命进行镇压，茅盾在赴南昌参加起义的途中受阻，潜回上海后和党在组织上失去联系，但他对革命从没动摇过。20 世纪 30 年代他参加并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抗日战争爆发，他又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反内战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当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和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后又当了全国政协的副主席，1981 年 3 月 27 日，逝于北京。3 月 31 日，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生前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 1921 年算起。茅盾的儿子韦韬回忆，他父亲从 1928 年脱党后，因多种原因，曾四次与恢复党籍失之交臂，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件事的努力，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是茅盾一生都在追求的荣耀。

茅盾陵园就设在乌镇西栅的灵水居内，临水依丘，墓地建在东侧山丘上，故乡的山山水水一目了然，雪松和翠柏掩映墓中。整个陵园用“子”字形布局，取于先生代表作《子夜》之意，笔画简洁，曲折流畅，泾渭分明，四通八达，独辟蹊径的创意运用，于美感中见寓意。

站在茅盾墓的雕像前，我默默地致哀，心中泛起了阵阵的波澜。茅盾是一代文学巨匠，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座绕不过的丰碑。他一生投身革命，党籍却被吊起半个多世纪，可他直至临终也没放弃对恢复党籍的追求，我一方面叹服茅盾是个“不忘初心”的光辉典范，另一方面亦深感宦海的深不可测。此外，我也为茅盾后来基于种种缠扰，再也没出什么力作而陷入深深的沉思。当然振兴中国文学创作的意愿，茅盾是矢志不渝的，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生前的遗愿，将其捐出的 25 万元稿费，设立了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每次颁奖都在乌镇举行，每至颁奖期间，乌镇更是客似云来，成了文学界的一大殿堂。我想假若茅盾泉下有知，也许会发出一丝会心的微笑吧。

江南忆，最忆是乌镇，她是江南雨后的一条小巷；她是江南梦回的一叶小舟；她是江南浅唱的一支小曲；她是江南最后的枕水人家。打点行囊吧，让你行惯了钢筋水泥的脚步，去叩问岁月的青石板，去乌镇的烟雨中圆一个似水流年的梦境；枕着水声入梦吧，它比枕着涛声入梦更有另一番意蕴，更有另一种安宁。

福建百年鱼牙行简史

文 王心悦

福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省份，被《中国地理》誉为“山海相撞的奇迹，众神狂欢的地带”。福建物产资源丰富，尤以海产闻名。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漳浦郡进贡鲛鱼皮”；明嘉靖《惠安县志》记载，“凡鱼大者薨小者宜腊，贾人常裹而市之，或由海道以达三山（福州）、延（平）建（宁）诸郡”。明清时代，福建的水产品远销兴起。对内从沿海向内地运销，对外远销到东南亚诸国。到了民国时期，海味品经三都澳、福州和厦门海关出口，对外贸易额已达 677 万国币。随着海产利润的增长，鱼牙行应运而生。

1949 年前福建鱼牙行小史

鱼牙行，即鱼行，或称为经纪行，专门为海边鱼主代卖鲜鱼而赚取佣金，自己不购鱼出卖，是地地道道的“九八行”（福州土话，意为“拥有土特产货源的客户在福州寻找代理的商行”）。明末清初，厦门就有鱼行的设立。民国年间，福建鱼牙行遍布全省渔业港口，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统计，全省鱼牙行共有 221 家，从业人员达一千多人。其中以福州、厦门两城最多，分别为 56 家和 35 家。鱼牙行按照贩卖商品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鲜鱼牙、咸鱼牙和贝壳海产品牙。较为有名的鱼牙行有福州的隆盛、荣茂、荣兴，厦门的和发、金记、同利、裕兴、隆盛等。每家的资本额不一，有的四五万元，有的就千元而已。

福州、厦门沦陷后，日本人在厦门设立了“全闽水产株式会社”，由日本人明神孝秋和富田负责，地址设在民生路一带。日本意图用这个公司垄断福建的水产贸易。原鱼牙行被强行改为仲卖行，因此萧条一时。渔民只能到日本人开设的鱼市场参加竞买，而后转卖给水产零售商及鱼贩。日本人在水产贸易的过程中收取手续费、佣金、代劳金及水产会会费等达到交易额的 47%。另一方面，“全闽水产株式会社”还通过代办渔具及日用品操纵价格，使渔民入不敷出。当时有的渔船转为内港运输，以维持生活。一些渔船通过渔民协会向德国大使馆纳款购买德国的旗号，开往外海继续生产，但在日本飞机、军舰的骚扰下，也无法进行作业。大部分渔民被迫弃舟维生，沦为日本人的劳工。据国民党福建省社会处调查，全省渔民在战时减少 111196 人，渔船渔筏损失 9501 只，渔产锐减，生产和生活都极为困难。抗战胜利后，鱼牙行迅速复苏，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946—1948 年），仅福州一地鱼牙行就达到 93 家。

鱼牙行之生存模式

既是“九八行”，鱼牙行主要靠抽取佣

金盈利。佣金高低不一，例如对崇武的鱼主，按售货金额抽取 6%，对惠安小咋村的鱼主则抽取 7%，对内港鱼则上升到 8%。佣金是根据什么来衡量呢？第一，根据鲜鱼消失重量的多少。一般来说，鱼挑到鱼行马上过重，接下去算账就是根据这个重量。但鱼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因为水分的流失等原因，重量减少。因此鱼牙行商必须把这一部分折损算入佣金中。有的鱼的重量易流逝，就要打折扣计算，如鳗鱼、狗母鱼等按九三折计算，即每百斤扣七斤；花鱼、坂鱼等不易消失重量的则不扣。第二，根据收回账的容易程度。鱼行常有放贷在外，对象不一，有沿海鱼主、渔民、鲜鱼摊贩、菜馆或其他买客赊欠。对于流动摊贩和买客常有收不回的呆账，因此佣金当然就要比一般高了。这便是鱼行的赚钱门道。鱼牙行鼎盛之时，甚至成为一个县货币金融牌价的操纵者。民间文书契约上就有“以鱼牙银价为准”的约字契据，可见其经济实力强大。

若是想找鱼牙行做生意，只要寻着那鱼腥海味而去便能瞧见。大部分的鱼行只需有一间店铺、一杆秤、一把算盘，再加笔墨纸砚便能开张。以泉州源和鱼行为例，有职工十一二人，四个人负责掌秤、掌账；四个人站店口，负责和顾客打交道；还有打杂的三人，各司其职。上午便是正常的收鱼和卖鱼工作。鲜鱼一到，鱼行掌秤的人必然第一个上前，边秤边喊：“记净（音，闽南方言）了，某鱼几十斤几两。”掌账者立刻按市价算好应得货款，提笔登账算好货款，并付给现金。下午鱼牙行伙计会在近收市时出发讨账，分四个方向：东北（东街、北门），新西（新门、浮桥、西门），水南（水门、南门），街学（土门街、府学口）。鱼牙行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待遇不错，民间有谚：“三十六行，比不上鱼牙行。”

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本行业的利益，自民国起，鱼牙行就有公会组织，最早是“水产公会”，后改称“鱼行公会”，1935 年改称“鱼行业同业公会”，1946 年再次更名为“鱼牙经纪商同业公会”。公会在维护鱼牙行同业利益的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林祥彩曾回忆公会与地方政府抗衡并取得胜利的两件事：一是十九路军主政闽南期间，福建省税务部门要增加咸鲜鱼行税收，鱼牙行不同意。双方争执，军警开枪打伤了工人。最后在鱼牙行资方和公会的协调下，政府加税宣告失败。二是 1938 年左右，福建地方政府





① 灯光围网船
② 新中国成立前福建常见渔船
③ 大围缯船

勒令福州中亭街各咸鲜鱼牙行迁址江滨码头建店营业。各鱼牙认为中亭街地理位置优越，贸然迁店，劳资双方将蒙受不少损失。因此员工团结一致拒不迁移，并由公帮推出代表进行交涉。当地政府用欺骗手段将代表扣押于警察局，被羁押的代表始终不屈服，后经华侨公会出面调解，始释放代表。鱼牙行仍旧在中亭街继续营业。同时鱼牙行也利用公会组织谋取不当利益。福建省财政厅查缉室就查出多个鱼牙行存在严重的透漏税收，吞匿货价（即欺客中饱）的情况。

鱼牙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承担了福建水产贸易的重要角色。其主要原因在于鱼主缺少销售的渠道，鲜鱼容易臭烂，非迅速脱手不可，因此最便当的就是托付鱼牙行代销了。只需花一笔佣金，问题就都解决了。

鱼牙行对渔民的剥削

鱼牙行之繁荣实建立在对渔民的残酷剥削上。旧社会福州有句民谣：“中亭街海洋大盗（指鱼牙行），下道街歪门邪道（指果子牙）”，即指鱼牙行的残酷剥削堪比海盗。

鱼牙行的剥削方式多样，包括佣金、高利贷、暗重、压价、造假账、扣斤底重、强买强卖等。佣金即上述鱼牙行的抽成。高利贷，渔民如果因为生产、生活遇到困难，向鱼牙行借高利贷，有借黄金一两，月息一钱的，如不能按时归还便会利滚利，难以翻身。有的渔船由于产量低，实在还不起款，便把船劈成碎柴火烧，只留船龙骨放在沙滩上，而后向鱼牙行报说船破无法生产，以求免去归还欠债。但即使逃过这一关，如要恢复生产，还得向鱼牙行贷款，再次受其剥削。有诗为证：“大乍山，大乍山，破船破网搁沙滩。十间住房九间破，三顿只吃臭薯干。”暗重，即大秤入，小秤出。压价就是鱼牙行老板或“掌盘使”（即经理），通过掌握市场情况，利用客户货物假开盘，搞吞吐，以巧取豪夺。行情看高则大量吸进，若行情看低，即及时出售，从中获利。水产价格起伏甚至能达到“鱼金鱼土”的程度。造假账则指的是鱼牙行欺骗渔民文化程度低，伪造账本。扣斤底重，即交售鱼货时鱼牙行有权扣除斤两，一百斤只算九十六斤，一百斤出头只算一百斤，两数一律不算。

除此之外，鱼牙行还会以请神谢神的名义，向渔民收取费用。福建民间宗教气息浓厚，渔民虽不在路上定居，却修建了众多的寺庙，如福海宫、园山宫、龙王宫、龙球殿、田头妈宫、金王爷宫、钓糟王宫、钩钓王宫、会福宫、大人宫、永福宫、太平殿等。建在港口的金王爷宫被尊称为“海口宫”，渔船出海必须先抽签获准，并在神符上盖好大印才能起帆。这些费用均由渔民承担，由当地有权力的绅士和殷实的巨商联系鱼牙行，进行抽分。

旧社会的渔民除了面对鱼牙行的剥削，还要承受船主、高利贷、渔具出租者、鱼捐税、渔霸敲诈勒索等的层层剥削，真正到手的钱财不过寥寥。家住福建三都北沃的老渔民“老来福”（连联屿）回忆民国三十四年腊月发生了一场大饥荒，两个孩子病倒了。他想用捕来的鱼换一点番薯米，救孩子的命。但是被垄断当地鱼市的鱼牙商发觉了。鱼被没收了，还被打了一顿，罚跪一晚上，最后两个孩子也病死了。他迫不得已卖掉了第三个孩子，才和妻子一起活下来。福建渔区广泛传唱着反映渔民悲惨生活的歌谣：“丰收返来喜盈盈，一担魟鱼值七千，鱼行老板合

利盛，大银排得满桌顶，拿到船上无一半，分到手头更伤心。”还有不少“捕不到鱼苦，鱼多不如土”、“捕鱼人家世世穷”的民谚。

新中国成立后对鱼牙行的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水产贸易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改造“鱼牙行”，发动渔民和水产运销户参加水产运销互助合作组织，建立国营鱼市场。以福州市为例，1952 年 2 月，福州市水产市场把中亭街三个私营鱼牙行改造为经销店。1956 年 1 月，开始把市区内专业从事经营水产品的小商贩（共 753 人）全部收入国营水产公司（季节性的小商贩除外），组成国营水产零售商店。改造持续了八个月的时间，时人称之为“一步登天”。后又陆续吸收水产小商小贩 172 名，按当时“给退路”的政策，有 44 名“政治可靠，业务技术有特长，工作一贯积极肯干，有工作需要”的鱼牙行从业人员留在国营公司，114 名派去组织国营公司下属的 17 个集体所有制合作商店，只有 14 名被退回农村。新职工的收入分为固定工资、基本工资加奖励、死分活评，共负或各负盈亏等五种。政府有关部门正式发放水产行业商贩证书。其余分散在广大乡村和渔区的小商小贩，在自愿原则下走互助合作道路，组织成立经销、代销和合作小组，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逐步过渡为集体商业。至此，鱼牙行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鱼牙行的改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福建渔业的近代化。渔业是一种对时限要求很高的产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将货物运输到市场。鱼牙行操控下的福建水产品交易，从渔民到近海各码头鱼牙到市区内的鱼牙行，最后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四道环节。转手次数多造成了海产品质的流失，同时因为手续费的问题，增加了渔民的成本，降低了生产销售的效率。改造之后的渔业，海产由渔民直接送往购销站，之后即进入市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运输环节中的浪费。其次，渔业尤其是远洋渔业对于技术的要求极高。1949 年以前渔业捕捞使用最多的是杂用船和围网渔船。这些绝大部分是木质船，存在动力不足、无法远航等问题。对渔业进行改造后，渔船的材质、动力、捕捞机械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1954 年福建省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为 2 艘，载重吨位 157 吨，功率为 205.8/280 千瓦。到了 1960 年机动渔船数达到 170 艘，载重吨位 5712 吨，功率为 8523.1/11596 千瓦。六年的时间里，船数达原来的 84 倍，载重吨位达 36 倍，功率达 41 倍。同时，大量引进钢质渔船。1960 年 3 月福建省渔捞公司成立，共有 4 艘 113 型钢质渔船。1961—1963 年，福建省渔捞公司又从国家水产部接收了 8 艘 801 型钢质混合式拖网渔船。在捕捞机械方面，改进和引进了大围增立式绞钢机、灯光围网起网机械等，还增加了助渔导航仪器等。这种整体的技术和体量上的更新换代，是个体或者私营经济所难以完成的。客观来说，对福建渔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其现代化的进程。

鱼牙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对促进海产物资交流和繁荣渔业交易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其繁荣是建立在利用暴力、欺诈等手段垄断市场，剥削普通渔民之上的。回顾鱼牙行的百年发展史，难免感慨其兴盛，惋惜其衰败。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历史实践启示我们要使得渔业得到长足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提高。

香山人的世博缘

文 丘树宏（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021 年是世界博览会走过的第 170 个年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延期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隆重开幕。170 年前，即 1851 年，万国工业博览会成为全世界第一场世界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博会），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在第一届世博会中，有一位中国人“闪亮”登场，收获了大会的金银牌。这个人就是广东香山（今珠海）人徐荣村。

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兼实业家郑观应是香山县人，早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受李鸿章委托，他先后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



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

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开滦煤矿粤局总办等职。1894 年，他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书中“赛会”一章中，郑观应具体叙述了从英国伦敦开始的万国世博会，到后来的巴黎、维也纳、费城、东京世博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博会，并阐述了举办世博会的重要性，认为世博会可以使“民之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而“利国利民”。由此，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因为“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

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第一次参加世博会、第一次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这两个世博会的中国“第一人”，竟然都是“香山”人。

香山，习惯上都认为是现在的中山市。而历史上的香山县，始建于 1152 年，其范围包括现在的中山、珠海和澳门。1925 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

香山确实是一方非同一般的水土，源远流长的珠江和广淼浩瀚的南海在这里汇集交接，大陆文化和蓝色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养育出了一种兼具收敛和开放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在 300 年前左右，这里走出了两支“人马”：一支溯珠江而上，到了上海、天津、唐山等地参与当地的开埠发展；另一支则顺南海远渡重洋，到欧美游埠求学，或迁移南洋投资创业。中国第一个留学欧洲的学生就是 1645 年去英国的香山县人郑玛诺；第一个留美的学生是 1847 年进入耶鲁大学的香山县人容闳。容闳首倡出国留学，促成了清朝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后来多数成为推动近现代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香山人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出现了以唐廷枢等为首的中国第一批洋买办，而以“四大百货”为代表的“香山商帮”则开创了中国的百货业。当然，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香山名人中，有一代伟人孙中山、维新派启蒙思想家郑观应、中共早期领导人杨殷和苏兆征等。

1851 年，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这个消息传到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朝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而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或对外界一无所知，或一屑不顾，但正在上海经营荣记丝号的徐荣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迅速精选了 12 包“荣记湖丝”从上海紧急运往伦敦参加博览会。一开



徐荣村（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荣记湖丝”获得的奖牌（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始，由于样品包装粗糙而受冷遇，但最终评委还是发现来自原产地的“荣记湖丝”非同小可，一致认为“上海荣记的丝绸样品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的优秀品质”。于是，“荣记湖丝”一举获得金奖、银奖，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颁奖并许诺“荣记湖丝”可以进入英国市场。就这样，徐荣村以个人名义参加了第一届世博会，被誉为“世博会中国第一人”。

150 多年后，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徐荣村曾参与世博会的事迹发挥了十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任何一届世博会一样，上海参加的第 41 届世博会主办权的竞争也空前激烈。在 2002 年底投票前的冲刺关头，徐荣村的后人徐希曾提供了徐荣村参展伦敦世博会并获奖的实证，经过上海市图书馆学者查找资料并经巴黎世博局考证后予以确认。这既让中国人欢呼雀跃，也让世博局的官员震惊不已，最终将主办权的票投给了上海。

2010 年 5 月 1 日，第 41 届世博会终于在中国的上海举行了，这时离郑观应的预言已经过去了 128 年。

香山人与世博会的缘分因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而延续着美妙的故事。在 2010 年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中山市积极争取到了 1500 多平方米的展区，并以“慈善·博爱——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通过动态和静态结合现代手段充分展示中山市一项坚持了 20 多年的全民慈善行动——“慈善万人行”，还展示出中山独特的民俗和人文，香山与上海、与世博会的历史渊源。与此相呼应，中山市更启动了“中山人在上海”大型人文项目，与上海的有关方面合作，从新闻、文学、社科包括影视等方面全方位追踪、探究和展示香山与上海、与世博会的渊源。于是，中山有更多尘封的故事被挖掘出来，有更多惊人的美丽重见天日，有更多感人的情谊续写出奇迹和辉煌。